



北京文博

样
初
题

2009.2 (总 56 期)

● 文物工作

- 后奥运时期首都文博工作的发展分析与探讨 孔繁峙 (6)
- 关于后奥运时期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考 范学新 (15)

● “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 专栏

- 改革开放 30 年北京博物馆法规建设回顾 韩 更 (19)
- 改革开放 30 年北京地区博物馆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综述 范 军 (22)
- 改革开放 30 年北京地区文物流通市场的发展与现状 张 展 (27)

● 博物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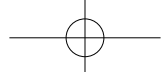
- 回首奥运大展 打造精品展陈 李学军 (31)
- 博物馆教育实践中的“馆校合作”模式初探 黄 燕 (36)

● 考古简报

- 丰台西客站南广场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41)
- 北京市延庆县应梦寺遗址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物管理所 (49)
- 北京市密云县石桥小区商住楼工程考古发掘简报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密云县文物管理所 (56)

● 文物研究

- 唐乐邦穗墓志考释 鲁晓帆 (63)
- 对元大都出土八思巴字文物的思考 张秀荣 (69)
- 浅析“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 庾 华 (74)
- 浅析竹刻艺术品鉴赏要点 尚美华 (80)
- 清前期京城钱局的铜料与滇铜的运输 王纪洁 (84)



北京文博

样
初
题

2009.2 (总 56 期)

● 北京史地

- 建国以来北京地区汉代考古成果综述 靳 宝 (87)
盛时圆明园的西洋式装饰和陈设 陈 辉 (92)
清末民国年间的法海寺发展脉络略考 苗天娥 (97)

● 资料信息

- 北京市文物局 2009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尹 君 (102)

封面: 国子监街牌坊

封底: 国子监“圜桥教泽”琉璃牌坊

封二、彩插页: 文物局专家榜

封三: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部分介绍 (九)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 宿 白 副主任: 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 岗 王鸿年 巴爱民 卢迎红 许 伟
刘建业 刘超英 李建平 吴梦麟 宋大川 张若妮 张展(大) 张展(小) 陈 旭 赵其昌
郝志群 姚 安 耿春卫 高小龙 高凯军 郭小凌 崔国民 葛英会 韩 永 韩 扬
舒小峰 温桂华 谭烈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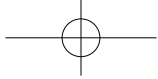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主 编: 陈晓苏 编辑部主任: 韩建识

本期责编: 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 <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 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2, 2009

● **CULTURAL RELICS WORK**

-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s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Work during Post Olympic Era by Kong Fanzhi(6)
- On the Grass-roots Work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during Post Olympic Era by Fan Xuexin(15)

● **COLUMN OF IN MEMEMORY OF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 Retrospec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struction for Museums in Beijing i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Han Geng(19)
- Summary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ork of Museums in Beijing Area i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Fan Jun(22)
-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Circulation Market in Beijing Area i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Zhang Zhan(27)

● **MUSE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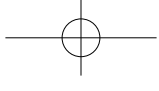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 Look back on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and Create the Exquisite Exhibitions and Displays by Li Xuejun(31)
- Tentative Studies of the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Model in Practice of Museum Education by Huang Yan(36)

● **ARCHAEOLOGICAL REPORT**

- Brief Report on Graves Excavation of South Square of West Railway Station in Fengtai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41)
- Brief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Yingmeng Temple Sites in Yanqing County, Beijing City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Yanqing County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49)
-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Brief Report of Business-living Building Project of Shiqiao Residential Block in Miyun County, Beijing City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Miyun County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56)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 Study of Epitaph of Yue Bangsui of Tang Dynasty by Lu Xiaofan(63)
-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Relics with Phags-pa Script Unearthed in Dadu of Yuan Dynasty by Zhang Xiurong(69)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2, 2009

Analysis of the Bronze Bell Made on Auspicious Day in Midsummer of Ren-Zi Year in the Era of Hongzhi of Ming Dynasty by Yu Hua(74)
Analysis of Appreciation Main Points of Bamboo Carving Arts by Shang Meihua(80)
Copper in the Coins Mint of Beij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Yunnan Copper in Early Qing Dynasty..... by Wang Jijie(84)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Summary of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Han Dynasty in Beijing Area since 1949
..... by Jin Bao(87)
Western Decoration and Lay-out in Yuan Ming Yuan in Its Heyday by Chen Hui(92)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Line of the Fahai Templ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y Miao Tian'e(97)

●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1st Quarter of 2009)
..... by Yin Jun(102)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Hou Renzhi,Li Xueqin,Lv Jimin

Chairman:Su Bai

Vice-chairmen:Kong Fanzhi,Liao Jingwen,Wang Shiren,Cao Zixi,Qi Xin,Ma Xigui

Members:Yu Ping,Wang Dan,Wang Danjiang,Wang Yuwei,Wang Youquan,Wang Gang,Wang Hongnian,Ba Aimin,Lu Yinghong,Xu Wei,Liu Jianye,Liu Chaoying,Li Jianping,Wu Menglin,Song Dachuan,Zhang Ruoni,Zhang Zhan(Elder),Zhang Zhan(Younger),Chen Xu,Zhao Qichang,Xi Zhiqun,Yao An,Geng Chunwei,Gao Xiaolong,Gao Kaijun,Guo Xiaoling,Cui Guomin,Ge Yinghui,Han Yong,Han Yang,Shu Xiaofeng,Wen Guihua,Tan Liefei

Editor-in-chief:Chen Xiao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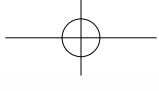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Han Jiansh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Han Jianshi,Chen Qian,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Book and Data Centre,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bjwb1995@yahoo.com.cn



后奥运时期

首都文博工作的

发展分析与探讨

孔繁峙

首都文博行业在北京奥运发展机遇的促进及奥运接待工作的严峻考验下，以出色的文博工作成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行业性的贡献。自迈入 2009 年，首都社会急速进入了后奥运时代赋予的、新的社会大发展的洪流，新一轮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又为首都文博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面对新的发展形势，认真回顾筹建奥运以来全市文博工作及发展状况，科学地研究并提出后奥运时期推进全市文博工作继续发展的思路，是当前首都文博行业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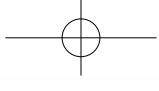
一、奥运会的促进使首都文博工作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

首都文博界在长达八年的奥运筹建期间，文博各项工作赶时乘势，加快发展，特别是在经历了奥运会的“洗礼”后，首都文博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北京奥运会使全市文博工作实现了与首都国际重大活动的紧密融合，提高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从整体上提升了全市文博工作的发展层次，为后奥运时期文博工作拓宽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北京名城历史文化环境中召开的 2008 年奥运会，已成为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

向世界展示的平台，增大了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度，使全世界都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魅力，首都文博工作，随着奥运期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扬而得到展示。

——北京名城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北京历史名城是一座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特色的古都城市，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并取得“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盛会的文化依托。市政府为向北京奥运会提供良好的城市环境并向世界展示北京古都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自 2000 年以来，连续投入巨资，在北京古都城市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历史环境整治和恢复历史名城传统景观的专项工程，先后开展并完成了故宫区域内占用单位、住户的搬迁和筒子河及周边环境的整治、东皇城墙遗址、菖蒲河遗址、御河遗址、明城墙遗址、元土城遗址等大规模的整治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历史城市的传统环境；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市政府及时制定并实施了以整治“两线”环境、恢复“五区”风貌、重现京都“六景”为核心内容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了整治南中轴线环境，重建了永定门城楼、修复了前门大街、景山后街、地安门大街等街区的传统建筑。为继续推进对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工作，在 2004 年北京奥运会筹备的关键时期，市政府研究制定并报



后奥运时期首都文博工作的发展分析与探讨

请国务院批准了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首次提出了北京名城“整体保护”的总体构想，从此，北京名城保护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整体保护”这一规划思想的指导下，市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停止了旧城内对胡同四合院“拆除”式的危房改造方式，市财政每年拨出 10 亿元专款，开展了对历史街区和胡同四合院的维修、保护工程，使整治维修后的历史街区和胡同四合院，延续了北京古都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民族建筑的独特魅力，并在奥运会期间向世界展示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

——全市文物建筑的维修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长期以来，由于全市文物保护经费的严重不足，致使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欠账较多，造成了全市文物建筑因年久失修而普遍破旧衰败，其中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物建筑都面临坍塌的危险。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北京申奥的成功，为全市文物建筑的保护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市政府为彻底改变全市文物保护状况严重滞后的局面并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创造良好的历史文化环境，自 2000 年以来，全市先后启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3.3 亿”文物抢险工程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围绕着市级以上文物建筑多年失修的现状，开展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物抢险修缮工程。经过长达 7 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南起永定门、天坛、先农坛（东墙）、正阳门城楼、箭楼、天安门、故宫（一期）、景山、后门桥至钟鼓楼等中轴线建筑和位于朝阜路上的白塔寺、历代帝王庙、广济寺、大高玄殿、景山、北大红楼、大慈延福宫、孚王府及什刹海、国子监街、皇城等历史街区的多达 139 项文物建筑的修缮工作，初步偿还了全市文物保护的历史欠账，首次实现了全市国家级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无险情；市级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无重大险情的目标，取得了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历史性的重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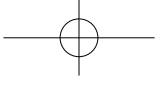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博物馆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近年来，伴随着首都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北京地区博物馆建设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截止到 2009 年 4 月份，北京地区注册登记的博物馆已达 150 座，各类博物馆每年以 500 余个固定陈列和 400 余个临时展览等多种形式和内容，展示着首都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建设成就。尤其是在北京申奥成功以后，全市博物馆充分利用奥运提供的历史机遇，在“人文奥运”理念的推动下，坚持奥运标准、全力以赴谋求发展与提高，博物馆整体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突出体现在：

一是各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工作更多地融汇了首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参与重大国际活动的新观念，特别是突出了奥运文化的国际理念，使博物馆工作的着眼点具有了国际的视野。二是全市博物馆的展览陈列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在首都地区以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科技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级博物馆，已经达到国际一流博物馆的水平。以新首博、天文馆新馆为代表的一批市级博物馆，也初步进入国际博物馆行列。三是博物馆接待服务工作普遍接近和达到国际的工作水准，全市博物馆在奥运筹备工作的推进下，通过不间断的各项业务培训、学习，普遍增强了优化接待服务的理念，强化了服务意识，提高了接待、讲解水平，市级以上重点博物馆配备了双语讲解和对游客的语音导览及残疾人专用车道等设备设施，极大的提高了博物馆宣传、接待的社会效果。

——文博系统专业人员队伍的培养提高和各馆（所）课题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近年来，市属文博单位中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有了显著提升。目前，全市文博系统已初步形成一支以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体的专业队伍，文博单位的业务岗位中由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组成的科研群体在逐年壮大，整体科研能力在不断提高，高素质的专业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初步改变了多年来文博系统人员结构中专业人员过少的问题，各文博单位的专业结构、知识结构以及整体队伍素质有了极大改善。按照市文物局的科研工作计划，文博各单位围绕着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博物馆的建设与开放以及文物的科技保护等研究内容，将科研列为年度的重要任务，每年确定一批学术专著及研究课题，部分馆（所）坚持出版馆刊、文博通讯等科研刊物，文博工作的科研成果，在不断深化我们对首都文博工作规律的认识。

二、在新形势下，对首都文博工作的再认识

在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努力下，北京奥运会已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功地登上了人类奥林匹克运动的大舞台，这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长达八年的奥运筹备期的发展及奥运接待工作的考验，对首都文博行业的发展与促进作用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首都文博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文物工作

1、奥运会后，文博工作在首都社会生活中确立了新的定位，已成为首都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文博行业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的体育舞台，通过大批的历史文物建筑和百余座博物馆的巨大“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东方传统文化特色，从而将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和现代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得以彰显。同时，也使世人进一步感受到民族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和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从而使社会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博工作在当今社会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2、奥运会后，首都文博工作已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一方面，在北京奥运会的推动下，首都文博的各项工作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历史

风暴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危机，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仍在继续，首都经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目前我们仍然无法估量，但社会的各个行业都感受到它的影响，首都文博行业更是有史以来首次受到国际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影响。北京的文物市场在文博行业中最先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自去年9月以来，首都近30年来蒸蒸日上的文物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呈现了一片萧条的景象，其中全市文物拍卖金额第一次出现了大幅下跌，其额度较上半年减少了30%，而且这种状况在今年仍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看到，文博工作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首都文博事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经济的支持，一旦首都经济减缓或下滑，就会直接影



历代帝王庙的景德门

上最好的成绩；另一方面，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以往的工作成绩，将会成为今后工作的起点。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奥运后，提出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建设目标，首都的文博工作将在“人文北京”的建设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

3、国际金融风暴将对首都文博各项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

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在财政资金减少的情况下，就不能向文博行业投入更多的资金，这必将影响到整个文博事业的发展，影响到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进度。

4、文博行业存在的几个与后奥运首都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深刻影响，文博单位普遍缺乏危机感，缺乏抗击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与全市范围内迅猛掀起的



建设发展形势不相适应。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很多文博单位还远未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压力,还没能深刻认识到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将会给文博事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尽管文博事业不是经济行业,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对文博事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但这种影响目前已经使首都文物经营市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势必减少对文博事业的资金投入,这将给文博事业的各项工作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将影响到全市文物保护和修缮工作,影响到博物馆的展览数量,影响到博物馆的外展项目。面对上述影响,文博行业目前过度依赖财政的思想观念,使得我们很多博物馆面对经济危机而束手无策,缺少有力的应对措施,更缺少自身发展的意识。

二是,面对中央提出的“掀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要求,各博物馆普遍缺少参与意识,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提出要掀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高潮;在今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大力发展旅游休闲消费,扩大文化娱乐……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既可以扩展消费领域,也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文化消费的需求和消费领域的扩展,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博物馆行业的继续发展与提高提供了发展机遇,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全市文博系统面对即将来临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局面,还缺乏形势发展的压力,缺乏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服务意识。

三是,全市博物馆的发展管理状况与首都后奥运新的发展标准不相适应。全市博物馆在以最大的努力圆满完成奥运接待工作后的一段时间以来,普遍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一些博物馆工作出现了“滑坡”现象,对馆内的工作要求放松了,要求标准不高了,馆内外的环境卫生、接待服务、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问题,特别是个别的博物馆和开放的文物单位还发生了游人投诉的问题等等,这些现象与当前首都工作发展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四是,文物单位被社会不合理占用问题,与首都“人文北京”建设发展的目标不相适应。北京地区保存至今的大量文物建筑和历史遗迹,向世人再现了古都城市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古代文明。由于历史原因,全市大批的历史建筑和文物

保护单位长期被社会不合理占用,严重影响了全市的文物保护与古都历史价值的展示。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筹建北京奥运期间,市、区政府曾结合危房改造、“3.3亿”和“人文奥运”等文物保护单位工程,先后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一批历史价值高、影响大的文物单位实施了整治和占用搬迁工作,先后完成了故宫外围占用单位住户的搬迁、恭王府邸和历代帝王庙等一批占用单位的搬迁,经整治维修后实现了元土城、明城墙、历代帝王庙、恭王府、先农坛等文物单位的对外开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奥运会期间为古都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但是,在全市文物保护单位中被社会不合理占用的问题,并没有在奥运筹备期间得以彻底解决,仍有很大数量的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因被社会占用而无法修复和开放。如在古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郑王府、孚王府、宁郡王府、淳亲王府等著名的王府和具有同样影响的大高玄殿、皇史宬、段祺瑞执政府等一批重要的历史建筑,都因被社会长期占用而无法开展维修保护以及对社会开放展示。由于目前搬迁费用的不断攀升,致使占用单位住户的搬迁资金过高而无法开展搬迁工作,一批即将进入搬迁程序的文物单位,如皇史宬、大高玄殿等占用单位也因搬迁资金的急速上涨致使搬迁工作“搁浅”,而文物单位的破损程度也因无法维修而在不断加重。毫无疑问,社会长期不合理占用文物单位的问题,不但影响到文物的保护,而且已成为首都开展“人文北京”建设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五是,在城市建设与保护关系的处理上,与北京名城整体保护的原则不相适应。曾延续多年的首都现代化建设与古都名城保护之间的矛盾与争论,随着2004年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而有了最终结果——保护与建设将在不同区域内展开,北京名城也因此开启了整体保护的发展道路。首都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实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性转变,一批现代化的大型城市建设项目已先后调至旧城之外的新城区域;旧城内实施的永定门复建、中轴线整治、明城墙遗迹修复、皇城墙遗址保护和大批四合院胡同的逐步维修等一系列保护工程,标志着北京名城保护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后奥运时期,为应对经济危机而在首都地区开展的大批经济建设项目的逐步实施,使得北京名城保护工作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文物部门积极参与了全市经济发展项目的前期工作,努力协调



文物工作

和化解建设工程与名城保护的矛盾，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年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而于旧城内停建的一批较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又在当前推进经济建设的环境下，以各种方式纷纷提出于旧城内重新开展建设的要求，使北京名城整体保护的布局再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建设与保护的矛盾一旦处理失衡，新的建设项目失去名城保护规划的控制，北京历史名城将在这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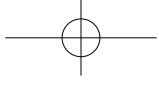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六是，对传统四合院胡同的保护利用方式与首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生活环境不相适应。北京旧城内延续至今的四合院胡同，是最具古都特色的传统建筑，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四合院都已成为建筑破旧、设施落后、居住拥挤、环境恶劣的大杂院，既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又使得具有名城特色的四合院建筑日渐衰败。为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护和延续四合院胡同的传统建筑，自2004年开始，市政府全面停止了旧城内的“拆除院落建楼房”的危改方式，转而对全市的四合院胡同采取了维修、保护、利用的方式，完整保持了原有院落的完整性，四合院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从传统保护和城市生活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原样维修保护的方式显露出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在维修方式上存在着重使用、轻保护的倾向，对一些外观破旧的四合院，往往是采取落架翻新的方法，而不愿采取旧房维修的方式，一些可以采用维修的四合院建筑，却采用了落架翻新的方法，于是出现的一座座“现代四合院”，其原有的历史价值已大打“折扣”；二是因维修计划安排过长，而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全市大面积的四合院胡同的破旧状况得以改观。按照目前市政府每年投入10亿元人民币保护四合院的工作计划，2008年旧城内共维修44条胡同、139个四合院，按此修缮计划，全市近1500条胡同的4万余个四合院需30余年时间才能得到维修和改善，显然，目前对四合院胡同采取的保护维修方式，与首都社会发展需要是不相适应的。

七是，专业人员队伍建设与首都后奥运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首都地区文博系统专业人员队伍已具备相当规模，有力地推动了首都文博工作的发展。从首都文博系统专业人员隶属关系分析，中央在京文博单位的专业人员，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首都文博界占有主体地位，具有“总部人才”的优势，代表了首都文博工作的最高水平，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博物馆、地质博

物馆等，都拥有一支高质量的专业人员队伍，对北京地区文博事业的发展与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和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北京市属和区县所属的文博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与规模都较为薄弱，且又多分散于全市中小型的博物馆、纪念馆、保管所、文物管理单位和经营单位以及研究部门，由于大多专业人员长期处于某一个专题性的文博单位，致使文博单位的专业人才队伍，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着研究领域过窄和专业过于单一的问题，阻碍了人才的全面成长。同时，由于专业人员过于分散，科研课题也多是每个单位“各自为战”，使得文博行业专业人员队伍的整体优势未能得以发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文博系统的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专家级的研究人员的逐年离退，而年轻的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又一时“难以为继”，使得很多文博单位的科研岗位普遍缺少高水平、有影响、知识全面的专家级的研究人员，更缺乏高素质的学科研究带头人。从全市文博队伍的整体发展看，确有一大批专家型的学术带头人正快速的成长中，但还需一定的时日，所以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北京文博系统的专业人才队伍状况，将与北京首都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

八是，文博科研工作与首都文化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文博科研工作是文博工作的基础，对整个文博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首都文博的科研工作，围绕着北京的名城发展史和北京社会发展史，曾取得北京建城起始年代等多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北京城市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中的多项空白，极大的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于北京古都城市和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提升了北京历史名城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国际知名度，同时，全市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也在科研成果的引领下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加强。

近年来，随着全市文物保护力度的加大和“3.3亿”及“人文奥运”两大保护工程的实施，使全市文物保护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特别是后奥运时期首都的文化建设以及“人文北京”的发展目标，都迫切需要文博工作拿出新的认识、新的成果，不断提升北京历史名城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增强首都的影响力。但是，近几年来全市文博科研工作缺少新的重要成果，科研工作的状况与首都当前快速发展的需要有不小的差距，研究工作还存在很多薄弱的方面：有的单位的专业人员终年忙于日常“业务”而忽视研究工作；部分单位的科研工作还出现了重业务研究、轻管理工作研究，重展陈工作研究、轻开放工作研究，重文



后奥运时期首都文博工作的发展分析与探讨

物内涵的研究、轻文物利用的研究等倾向，尤其是对北京名城的历史沿革等重大课题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管理层面，已鲜见研究成果。

上述情况显现出文博工作在首都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所存在的某些不适应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树立新的理念，努力探索后奥运时期推进首都文博工作发展之路

经过长达7年奥运筹备阶段的艰苦努力和参与奥运接待的严峻考验，首都文博行业的工作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市委、市政府紧密结合首都面临新阶段和新任务的实际，在总结奥运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市提出了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新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向，其中“人文北京”的建设思路和要求，已成为首都文博行业在后奥运时期建设发展的新任务和新目标。

经过奥运前期的努力与发展，首都文博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在当前首都发展建设的新形势下，特别是面对“人文北京”新的建设目标，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发展道路上，首都文博行业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可以说，面对首都新的发展未来，全市对文博事业的发展要求以及所应该达到而没有达到的，远远大于我们已经达到的。在新的环境下，文博工作会不断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随着首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广大民众对文博工作也将不断提出新的诉求，首都文博行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发展的紧迫感，需要站在新的起点上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努力探索新的发展途径与举措：

——巩固奥运成果，保持和发展文博行业在奥运期间所达到的工作水平。认真总结文博行业参与奥运的成功做法，调动文博队伍全体同志的工作热情，并在展览、讲解、服务等各项工作中，继续弘扬奥运精神和高昂的工作热情，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一流的文博工作水平。

——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树立发展的新观念。在北京奥运会的推动下，首都文博各项工作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面对后奥运时期，首都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以及社会对文博工作的新要求、广大市民对文博工作的新期待，首都文博行业要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要正确对待奥运期间的工作成绩，文博单位都要从奥运成绩中走出

来，克服自满情绪，消除贪图安逸、不求进取的观念，查找差距，寻找不足，不断树立创新观念和科学发展的理念，要在高起点上推进文博工作的继续发展。

——牢固树立文博工作为首都发展服务的意识，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首都发展的促进作用。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是古都千百年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彰显了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能为首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首都后奥运的建设发展时期，首都文博行业要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使广大民众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建设热情，从而促进首都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首都文博行业要普遍树立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面向首都社会，积极运用和发挥历史文物、传统文化及名城建筑的社会影响力和教育作用，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高质量的文博工作，促进首都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调动社会力量，推进全市文物单位的保护与开放工作。全市在奥运筹备期间实施的“3.3亿”和“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使大批的历史建筑得到不同程度的修缮、保护和开放，扩大和增强了我国历史建筑和古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但首都后奥运的发展，特别是“人文北京”的建设发展目标，又向全市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全市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工作，需要我们在认真落实《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维修中长期规划》、科学安排并完成每年1.5亿元文物修缮专项资金的同时，积极采取新的措施，调动社会各方积极参与文物单位的修缮与保护工作。特别是要结合当前开展的四合院胡同的维修工程，开展一批区级文物单位的维修工作；结合全市的城市环境整治工程，发动中央单位和各使用部门，开展对各自使用的一批国家级文物单位的修缮保护工作，如在今年城市环境整治中，中央有关单位可以开展“会贤堂”的住户搬迁与维修、清海军部、陆军部、蒙藏中学等文物单位的保护维修工作。通过广泛采取中央、市、区县等多层次、多部门的参与措施，以加快全市在后奥运时期文物建筑的修缮工作步伐。

——处理好新形势下首都建设发展与名城保护的关系，实现首都建设与名城保护的和谐发展。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提出名城整体保护的思路以来，市政府确实对北京名城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不断加大保护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文物工作

但与此同时，北京名城保护工作仍然不断受到某些新建工程的冲击。实现名城保护与现代建设的和谐有序发展，仍是当前和今后名城保护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在首都应对全球金融风暴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建设项目，都使得北京名城整体保护的内外环境更为险峻。在当前的新形势下，首都文物部门既要树立全局观念，支持全市的经济建设，又要坚持文物保护的意识，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首先是勇于面对全市建设发展的现实，在此基础上，认真研究名城整体保护下的建设发展，协调好建设工程中的名城保护问题，从全市大局的角度处理好新的建设工程与名城整体保护的关系，在最大程度上坚持和实现名城的整体保护；其次是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全市的经济建设工程，并在建设的规划研究阶段，协调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力争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工程建设。此项工作，可以借鉴在奥运场馆建设中，现代化的“鸟巢”与古都的“北顶娘娘庙”和谐相处的成功范例，在首都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的建设环境下，成功地处理好各项建设工程与名城保护的关系，以实现首都建设与名城保护的和谐发展。

——落实人文理念，提高博物馆工作水平，增强社教效果。面对首都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各博物馆要在巩固奥运接待成果、防止工作回落的基础上，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文北京”建设的目标为指导，按照首都社会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进博物馆各项工作的建设与提高，在奥运工作的起点上，进一步提高博物馆的整体工作水平，加大博物馆展陈开放、接待讲解、社教服务等工作的力度，进一步提高博物馆的开放接待与社会教育工作能力，使博物馆成为新形势下广大民众学习文化、接受熏陶的文化活动场所。

继续做好中央关于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对民众开放的落实工作，将首都地区符合规定、具备条件的博物馆、纪念馆全部实现对公众免费开放。同时，要不断提升免费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讲解服务等各项接待工作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扩大免费接待观众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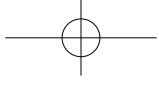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以发展的观念营造管理规范、经营宽松、发展平稳的首都文物市场。十几年来，以旧工艺品和文物经营为主体的北京文物市场，曾不断创造出新的经营业绩，为中国文物在国际价格的提升、促进中国海外文物的“回流”都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去年下半年形成的国际金融风暴，对

首都的文物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市场萧条，经营额大幅下跌，市场经营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文物部门要注意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工作。应该看到，随着国内建设项目的启动和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文物市场也将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逐步重现往日火爆的经营场面。因此，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观念，从服务管理、政策落实上给予支持与扶植，推动文物市场的复苏与发展，应注意依照首都的特色和实际情况，放开和活跃旧工艺品的经营，依法管理文物商品的经营，主动做好拍卖活动的服务与管理，扶植和促进文物拍卖经营活动的回升，以促进首都文物市场的再度繁荣。

——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博专业人员队伍。几十年来，随着首都文博事业的发展，全市文博系统已形成一支担负各个岗位工作的专业人员队伍，保证了文博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近几年来首都文博事业的快速发展，使一大批业务人员在奥运筹备工作中得到了锻炼，专业队伍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目前，很多专业人员的业务知识已超越了文博研究工作初期阶段，逐步向文博工作及学术研究的深层次迈进，并开始步入文博研究工作的理论层面；特别是随着首都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文博行业已成为高学历专业人才汇集之地，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推动下，文博工作的各项研究领域都已形成一定的发展基础并开拓出一片较为宽阔的学术视野。由于新的专业人员每年都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文博队伍中，因此，对专业人员队伍的培养始终是一项“常新”的工作，同时，面对首都文博事业迅猛发展的态势，文博专业队伍的建设与提高，就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遵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文博专业人员队伍要突出抓好三个层次的培养工作：一是对处在出成果阶段的专业人才，要抓好不断“提高”的工作，通过逐步增加课题“压担子”、出成果，逐步向高端层面发展；二是对处于知识积累和业务成长阶段的专业人员，要着重抓好“发展”的工作，通过在文博实践中的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研究能力，逐步向专家层面发展；三是对正处于业务“成长”阶段的新进入文博岗位的年轻业务人员，要着重抓好业务的学习与岗位知识的掌握，通过培训、引导和实践工作的锻炼，以加快专业的成长。

文博专业队伍中各层次人员的快速成长，是



后奥运时期首都文博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后奥运时期文博工作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文博工作在首都“人文北京”的建设发展中要有新的突破。市委、市政府在认真总结奥运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新理念，这是首都后奥运期间发展的新的目标和新的思路。“人文北京”的提出同“人文奥运”相比，是对首都发展认识上的又一次升华与飞跃，是首都发展的一项更为艰巨的战略任务，也是首都文博行业建设发展的新目标。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首都文博行业在奥运前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仅仅是建设“人文北京”这项伟大工程的“开篇序言”，而“人文北京”的建设与实现则任重而道远，因此首都文博系统要认真学习和深刻认识建设“人文北京”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使建设“人文北京”的实践活动成为文博系统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新的思路和行动推动首都人文精神的发展，在首都“人文北京”的建设发展中，彰显古都历史文化的人文特色。

北京的古都城市、历史文物、传统文化以及市井习俗，作为北京城市人文内涵的重要构成，在首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博工作将在“人文北京”的构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首都文博行业要采取积极的举措，在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中不断迈出新的步伐：要在全面发掘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资源、扩大古都名城和历史建筑、民族文化以及扩大博物馆展陈、宣传等各项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二是文博工作在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中要有新的突破。为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掀起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高潮”的建设任务，首都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即将形成社会文化大发展的新局面，作为首都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博工作，将发挥其独特作用。为促进首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首都文博行业要积极投身首都的文化建设，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历史文物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影响及教育作用，加大对古都名城、文物建筑、历史遗迹的保护开放力度，不断扩大全市历史文物的开放场所和增加开放内容；充分利用首都的博物馆资源优势，向社会推出更多的展览及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

素质及首都城市的文明程度，为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是在名城整体保护与首都建设发展的结合上取得新的突破。自2004年北京城市规划修编提出整体保护的发展思路以来，北京名城保护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全市空前加大了对古都城市的整治、恢复、保护的工作力度，取得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的成果；另一方面，某些大型建筑、市政设施、道路拓展等一系列建设工程的不断出现，对名城的整体保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当前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而掀起的建设热潮，如处理不好，都将会对北京名城整体保护工作造成新的冲击。科学有效地处理好建设发展与名城保护的关系是当前文物工作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面对当前的新形势，首先，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科学发展的理论分析和认识当前首都发展的形式，用科学发展的观点协调首都发展与名城保护的关系，处理建设工程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其次，是采取新的举措，坚持名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着重保护好名城的核心区域和古都城市中轴线，保护好最具古都特色的历史街区和四合院、胡同等传统建筑，同时在名城整体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参与首都的经济建设并协调建设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妥善处理名城内地铁工程、道路拓展工程与名城保护的关系，全面执行和落实名城保护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等文物景区周边的建设工程，以实现新形势下的名城整体保护。

四是，在博物馆建设发展的整体水平上取得新的突破。为积极参与和促进“人文北京”目标的建设与发展，适应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形势的需要，首都文博行业要在新的起点上，坚持更高的发展标准，通过北京博物馆学会的组织协调作用，使首都博物馆整体行业在展览内容、陈列方式、展陈手段等方面再上新台阶；在北京名城、文物建筑、历史文化、传统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发掘、展示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各博物馆的社教、讲解工作要在奥运标准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提高；各博物馆的接待服务工作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继续坚持一流的服务水平；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要在不断增加开放数量、扩大开放范围、提高展陈水平、完善服务接待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更大的社会影响。

五是，考古科研工作在北京名城发展史和社



文物工作

会发展史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北京历史名城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传统文化，是“人文北京”建设和首都文化的重要内涵。几十年来，考古科研工作深入揭示古都北京悠久历史和丰富古都历史文化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使我们对远古以来北京城市发展史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内涵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北京作为具有三千多年城市发展史并在世界上有很高知名度的古都名城，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科研成果，还远未能完整地揭示出北京城市的时代发展与城市演变所构成的历史系列以及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在当前开展“人文北京”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考古科研工作应紧密围绕北京名城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开展课题研究，争取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1. 在揭示北京名城历史发展系列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结合新的考古资料，不断丰富和深化对琉璃河商周城址文化内涵的认识；争取对西周蓟国城址、春秋战国蓟城遗址、秦汉幽州城址的考古研究取得突破性发现。

2. 在丰富北京各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北京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曾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文化，并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北京名城历史文化，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又大多被漫长的历史岁月所“淹没”。今后的考古科研工作要结合新的发现不断研究和丰富古都历代文化的内涵，争取在对西周古燕文化、蓟文化和春秋时期燕文化、汉唐时期的幽州文化以及在辽金文化的课题研究中能取得新的成果。

3. 在名城考古科研的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北京地区的考古科研工作，应随着高科技在史学研究中的逐步应用，而向多学科、多领域延伸，以便取得某项考古科研工作的多项研究成果，今后北京的考古科研工作应注意多学科的引进，争取在北京名城历史环境考古、历史植物考古、古代农业考古、历史气候考古、古代动物考古以及古人类考古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能取得新的成果。

六是，在文博安全防范工作取得新的突破。随着国内外治安形式的发展变化，安全保卫已成为文博工作的重要保证。自奥运会以来，境外的恐怖破坏活动和国内的多种不和谐因素，对首都文博单位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故宫汽油事件”和“鼓楼事件”的发生，使首都文博单位的安全形势空前严峻，文博单位面对的不安全因素，

已从当初被盗窃的目标，转变成成为某种社会犯罪的报复目标和破坏目标，文博单位的安全工作也在传统的防火、防盗的基础上，又增加防破坏、防恐怖、防凶杀、防雷电等多种艰巨的安防任务。为保证后奥运时期全市文博工作的顺利发展并推动“人文北京”的建设，北京文博系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研究制定和实施了“文博安全工作长效机制”，全市文博行业的安全防范工作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各文博单位的安防建设需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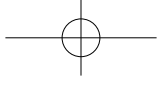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1. 在安保工作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要依靠严密的制度保证文博单位的安全。要将制度建设作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各文博单位都要围绕着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安全需要，建立起一套覆盖各项工作的制度体系，全面覆盖单位的各项工作和各个岗位。

2. 在安全管理机制的形成与有效实施上取得新的突破。要实施更为科学的安全管理方式，将安全工作落实到文博单位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实现“安全责任岗位化”，依工作岗位明确安全责任，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有责任，达到安全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合。

3. 在安全防范措施上实现新的突破。为确保文博单位的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恐怖、防凶杀以及防雷电等防范工作的落实，各文博单位要实施“全方位”的防范措施，都要达到“零死角”的防范效果，以实现文博单位安全万无一失的工作目标。

当前，从全市对首都“人文、科技、绿色”三大理念的发展与提升，从应对经济危机及推动首都的城乡一体、生态文明、城市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全面展开，使我们处处感受到首都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浓厚氛围，看到一条用科学发展观开创的首都发展的新路，同时也更加预感到后奥运时期的首都文博工作标准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风险更严峻。全市文博系统面对首都迅速发展的新形势，要继续坚持奥运工作精神，及时选择和制定正确的文博事业发展的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为此，首都文博行业要以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坚持“人文北京”的发展理念，科学地研究制定首都文博事业发展的思路和任务，以创新文博工作实践，不断拓宽文博工作发展、提高的新路径，为实现“人文北京”的建设目标，全力发挥文博工作的促进作用。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关于后奥运时期 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 思考

范学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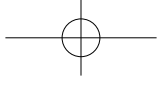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2008 年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 29 届奥运会，实现了百年奥运梦想。奥运会的举办给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文物古迹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文物市场得到了空前繁荣，文化遗产得到全社会的重视。然而，奥运会之后，伴随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工程相继竣工，人们企盼奥运、欢庆奥运的心态逐渐趋于平静，“人文奥运”的理念将会得到怎样的延伸呢？基层的文物保护工作将如何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呢？作为一名普通文博工作者，只想通过自己对后奥运时期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粗浅认识，来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共同思考。

一、“人文奥运”理念给基层的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北京奥组委在申办 2008 年第 29 届奥运会时就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其中以传播现代奥林匹克思想，展示中

华民族灿烂文化，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和市民的良好精神面貌为核心内容的“人文奥运”理念，给文物保护事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首先，一大批文物古迹得到了有效保护。从“3.3 亿文物保护工程”到“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八年来，北京市先后投入 9.3 亿元用于文物古迹的修缮和保护，带动社会资金 60 多亿元，文物修缮项目达 350 多个，修缮面积超过 30 多万平方米，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文物保护经费不足、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的局面。元土城遗址、明城墙遗址、历代帝王庙等一大批文物古迹修缮后，已经对社会开放。在“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的推动下，各区县都加大了文物保护投入力度。就连经济相对落后的延庆县，也从 2006 年开始每年投入 100 万元用于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三年来延庆共争取市县资金 2000 余万元，对 35 处国家级、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抢险修缮，带动地方投入 3000 多万元，文物保护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



其次,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全市博物馆事业发展迅速,博物馆建设势头迅猛,博物馆数量以每年2至4座的速度递增。以首都博物馆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化、国际化的高水平博物馆相继建成和开放,把北京的博物馆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区县也纷纷建设自己的博物馆,以延庆县为例,两年来,先后投资1700余万元对中国长城博物馆进行重新装修布展,投资上千万建成了京郊功能最为完善、建筑面积达6100多平方米的延庆博物馆,使延庆境内博物馆数量增加到8座。

第三,其它各项事业均有长足进步。比如文物法制建设得到了加强,率先在全国颁布《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博物馆条例》、《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一系列地方规章。成立了专职执法队伍,完善了行政许可制度和程序等。同时,地下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2000年至2008年共进行地下文物保护项目500项。仅近年来在延庆南菜园地区就勘探发掘了近千座汉唐至明清的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第四,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不断宣传、文物炒作的不断升温,人们越来越关注文物、越来越关注文物保护工作。发现破坏文物现象及时报案的、长年对文物进行义务保护的、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的群众越来越多。仅在延庆县就涌现出了象全国优秀长城保护员梅景田、文物保护志愿者李凤军等一大批文物保护积极分子。

二、后奥运时期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

1、文物保护政策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是:整治“两线”景观、恢复“五区”风貌、重现京郊“六景”,营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格局。“两线”即中轴线、朝阜路沿线;“五区”指什刹海风貌区、国子监古建筑群游览区、琉璃厂传统文化商业区、皇城景区、古城垣景区。只有“六景”中的长城离北京最远。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都与京城有关,而离北京100公里以外的项目少之又少。毋庸置疑,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文物古迹很多都在京城,这些都是最能体现“人文奥运”精神的文化遗产,应该优先加以保护和修缮。但是北京周边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等远郊区县同样有很多值得保护的文物古迹,也需要进行有

效的保护和修缮。在《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当中提出要配合各区县政府对不少于100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进行重点抢修。在2007年编制的《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利用中长期(2008—2015年)规划》才逐步提出了“完善两线景观、展现皇城格局、维护古都风貌、保护京郊史迹、整治文物环境、实现合理利用”的设想。文物保护政策逐渐开始向郊区县延伸。总之,文物保护政策的重点大部分还都集中在城区,对郊区尤其是远郊区的投入相对较为薄弱。

2、文物保护投入力度在城乡不平衡问题。

因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在文物保护配套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城乡差异。比如到2004年“3.3亿”文物修缮情况总结时就提到各区县投入文物修缮、文物腾退、环境整治配套资金近33亿元,其中四个城区投入占全部配套资金的85%。当时西城区为将159中学迁出历代帝王庙,支出的拆迁费就达1.2亿元,安置建设费有8000万元,而市文物局需要支付的帝王庙修缮费实际上只需1000万元左右。安徽会馆修缮前,宣武区政府拿出了270万元用于拆迁,一期主体工程的修缮花去了近300万元,二期修缮仅拆迁会馆周围的住户就要3000万元。而在当时,西城区就已经决定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本区文保工作,投入资金2亿元,重现历代帝王庙原貌;石景山区拨付1000万元用于区内文物修缮;海淀区已出资2.3亿元,完成圆明园景区内的住户和单位拆迁;丰台区自投资金240万元,完成了药王庙的修缮等等。而当时延庆县财政收入只有3个多亿,连城区的一个办事处的收入都不到。如今,延庆县在财政收入只有6个多亿的情况下每年能拿出100万元用于文物古迹修缮,能出资上千万建成一座现代化博物馆,其本身已经是个创举了。

因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地方政府投入文物保护的资金也不同。经济较发达的城近郊区对文物保护投入的力度大,经济相对落后的远郊区县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就很有限,从而使得各区县文物保护工作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3、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博系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中提到:“十五”期间吸收引进博士6名、硕士12名,研究生学历人员增加到25人;本科学历人员由2000年占全员总数的20.9%增加到32.3%。经过五年的努力,文物局系统干部



关于后奥运时期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考

队伍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然而，这些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都集中在城市，而远郊区县现在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也有几百人，从全市文博工作的大局出发，这些人的专业水平如何提高，专业队伍如何建设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由于区县工作条件差、收入相对较低，留不住高学历的、专业对口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些人即使来了，也可能因进京户口等问题，把区县当跳板。以我们新组建的延庆博物馆为例，在我们近 40 名工作人员中，有初级以上职称的只有 3、4 个人，大学本科学历的也只有 2、3 个人，其中文博专业馆专业的只有 1 人。这在远郊区县情况还应该算是好的。人才队伍建设是决定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人才都集中到城市了，区县的工作也就只能这样缓慢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就会越来越严重。

4、文物保护理念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文物保护理念其实包含着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两个层面对文物遗产保护的认识问题。这也受着经济条件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制约。城区因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从政府到群众对文物保护也会有较高的认识，舍得投入几千万、上亿元的资金修缮文物古迹，打造地区文化品牌。而经济相对不发达、远离大都市的地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局限性，即使政府领导高瞻远瞩，群众也未必全都能理解和接受。当前也确实存在着山区的群众热衷于修“庙”，旅游景区热衷于修“城”的现象。城乡之间，人们对文物保护的含义、价值的认识还存在着较大差异。

三、关于后奥运时期基层文物工作的几点思考

1、后奥运时期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仍然面临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利用中长期（2008—2015 年）规划》中我们了解到，北京市政府决定从 2008 年至 2015 年 8 年间，每年度安排资金 1.2 至 1.5 亿元用于文物保护工作，其中文物建筑修缮资金为每年度 1.1 亿元。外界瞩目的四合院和胡同将成为规划保护的重点。还要将修缮文物与完善消防等安全设施相结合，将消除文物建筑安全隐患与整治文物环境相结合。这对于广大文物工作者来讲，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文物保护修缮工作不但不会在奥运会结束

之后停止，而且保护力度比以前还要大。作为基层单位，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会，提前筹划、合理安排，为本地区争取更多的文物保护项目。

2、在文物修缮方面应当重点向远郊区县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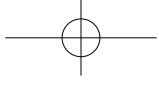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根据《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和《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利用中长期规划》，今后一段时期，会逐渐加大向郊区和农村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要求，加强农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这是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方面。据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北京市约有不可移动文物 3500 余处，其中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568 处，另外还有上千处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这些文物大多分散在北京郊区的广大农村，价值虽然比不上故宫、十三陵，但仍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而且很多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如果不及时进行保护，等将来这些文物古迹坍塌了、消失了再保护，就来不及了。因此，今后的文物保护投入应重点向远郊区倾斜，加大对远郊区县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如果等配套资金到位、进行补助性投入等，结果只能是错过一个又一个保护机会，让文物古迹一天天地损毁下去。

3、文物保护投入应该具有多元性。

如今一提到文物保护，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修城墙、盖庙”。从皇宫到太庙，最后到村里的小庙。由于历史欠账多，这些年国家集中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抢险修缮，而且今后还将持续，这很正常。但是随着文物保护投入的不断增长，将来某一天，也许真的我们会感觉，没什么可修的了。其实不然，文物保护同样也是一个可持续工程。现在，有关部门在文物修缮的同时已经增加了避雷、防火、防盗措施，文物整体环境保护等内容。此外，文物保护还应该包括对那些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石雕石刻文物的保护，对各县文物库房内金属文物的保护，各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护，古建筑内壁画、彩绘的清洗和保护等等，甚至还包括文物保护队伍的建设。我们需要保护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不只是简单的古建修缮。这不仅需要上级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也需要我们基层单位对自身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断提出新的工作亮点。

4、加大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是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根本



文物工作

前提。没有一批专业性强、学有所长的基层文博专业技术人员,我们的事业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各区县从事文博工作的人员变动很大,新老交替,人员更迭。虽然各区县也十分重视本地区文博干部队伍建设,纷纷加大了文博队伍力量。但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人才队伍建设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对于基层单位来讲,一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力争引进一批有专业、有特长、能留住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工作第一线。二是对现有的工作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包括派出学习,到上级部门实践,在本单位承担重要项目等方式,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土专家”。三是在区县也要开展学术研究、课题立项的风气,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自己的专业技术队伍。对于上级主管部门来讲,首先应该把基层专业队伍建设纳入到全市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当中去。因为这是文物工作最边缘的触角,直接反映着全市文物工作的总体水平。其次,要多为基层单位提供培训、学习、挂职、实践的机会,为基层培养专业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巩固现有的人才队伍。再次,就是要多组织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活动,发挥文博专家的“传帮带”作用。同时,还可以让京城各大文博单位与远郊区县的文博单位结对子,对点帮扶,可以让北京城区的文物专家给区县的单位带徒弟,从整体上提高全市的文博工作水平。

5、让更多的人享受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成果。

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我们文物部门自己的事,与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当中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好处。这就涉及到一个文物保护如何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如何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问题。(文物保护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延庆的岔道城保护工作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市文物局投入了近千万元的文物保护经费,对岔道城的城墙进行保护修缮,岔道村自筹资金对城内的城隍庙、守备署等古建筑进行修缮和复建,改造了市政基础设施,并出台政策鼓励村民对城内民房自我改造,基本上再现了明清时期岔道城的历史原貌。现在岔道村民俗旅游非常火爆,村民不出家门就能做生意。仅 2007 年民俗旅游收入就达

130 余万元。

从 2008 年开始北京市首批 33 家博物馆开始免费对社会开放,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好评。延庆博物馆因开馆晚,虽然没有被列入免费开放的名单,但开馆不到两个月就接待了近万人次的免费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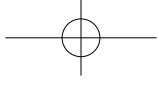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不管是文物古迹保护,还是博物馆开放,都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成果。这也是我们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

6、以文物资源为依托,因地制宜地发展创意文化产业。

让文物直接创造出产值,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合理地应用文物的元素,认清文物的潜在价值,并将它与创意、与产业链接在一起,就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作为基层的文博单位,我们不仅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让更多的人享受文物保护带来的成果,还要深入挖掘辖区内文化遗产的内涵,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打造地区文化品牌。比如北京的当代工业遗址 798 工厂被改造成“艺术沙龙”,上海苏州河工业仓库区被打造成“艺术中心 SOHO 区”,广州江南东路旧仓库被改造成“Park-19”的艺术平台。这些改造和利用当代工业遗址,不仅丰富了城市文化,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台北故宫博物馆提出的“Old is New”理念,就值得博物馆界的朋友们思考。他们受清代康熙皇帝画像启发,开发出了名为“清先生”的一系列别致的生活用餐具,受到当地人的普遍欢迎。那么,我们本地区的文物资源及其蕴藏着的深邃历史文化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发展空间呢?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理解、去发现、去创造。

总之,后奥运时期,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只要我们能够认真地总结近年来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深刻理解国家、北京市和本地区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发展思路,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努力工作,就能够把后奥运时期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为延庆县文化委员会副研究馆员)



改革开放 30年

北京博物馆法规建设回顾

韩
更

改革开放 30 年，北京市博物馆法规规章建设从无到有，从 1993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到 2000 年 9 月 22 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北京的博物馆立法创全国之先，首次以政府规章的形式确立文物行政部门对博物馆的管理，又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规范博物馆活动。北京市博物馆立法，从博物馆的设立，到博物馆的发展与保障，到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博物馆地方法规规章体系，反映了北京市改革开放 30 年来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反映了北京市人大、市政府对博物馆立法的重视程度、在文化立法方面取得的成绩。

改革开放第一个 10 年，正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恢复期，10 年间国家制定的法律及法律决定仅 154 件，行政法规仅 492 件。多数领域都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博物馆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北京市还没有制定地方博物馆法规规章，对博物馆的管理依据主要是国家文物局 1979 年制定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文化部 1985 年制定的《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和 1986 年制定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和文件，反映了当时文物行政部门对博物馆的管理范围、管理权限、博物馆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管理对象具有局限性。对博物馆的管理仅限于国家举办的地方综合性或专门性博物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第一条规定，省、市、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举办的地方综合性或专门性博物馆。

（二）革命纪念馆已列入博物馆范畴内进行管理。如《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各类革命纪念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博物馆具有征集藏品的权利。《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博物馆通过征集收藏文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陈列展览，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第四条规



“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专栏

定,调查征集是革命纪念馆各项业务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充实馆藏文物、资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宣传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四)对博物馆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业务管理上。更像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帮助博物馆建章建制。如《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都是从调查征集、保护收藏、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群众工作、组织机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工作人员、经费等方面规范博物馆内部管理。

(五)对博物馆的藏品管理是按照对文物的管理思路进行的,主要管理对象也是馆藏文物。在这个时期,不能不提一下我国制定的第一部文化领域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文物保护法》专门列了馆藏文物这一章,由此应运而生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文物藏品的管理进行了更专门、更细致的规定。

(六)行政管理手段单一,缺少事后监管和对违法行为必要的处罚。上文提到的3部规定,都没有涉及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内容,文物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也仅针对调拨、借用本行政区域内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的藏品进行审批。

由此可见,当时仅有的几部博物馆管理的规章文件,都是对博物馆的业务进行管理,而没有对博物馆的资质进行管理;对博物馆的藏品管理也仅限于文物藏品。

二

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是我国立法工作飞速发展时期。北京市的立法工作也不例外。随着北京地区博物馆数量的增加、博物馆种类的丰富、博物馆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对博物馆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文物行政部门对博物馆的管理也迫切需要法规规章来保障,这就推进了北京市博物馆立法工作突飞猛进的发展,1993年市政府先后制定了《北京馆藏文物管理规定》和《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两部政府规章,结束了北京市没有博物馆法规规章的历史。

《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是我国第一部博物馆领域的地方政府规章,确立了以下四个主要原则:

(一)北京市对博物馆实行属地管理。无论博物馆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国家级的、市级的、区县级的,还是驻京部队,只要这家博物馆坐落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都必须遵守《北京市博物馆登

记暂行办法》。《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博物馆和具有博物馆功能的纪念馆(以下统称博物馆),均须按照本办法进行登记。

(二)建立博物馆登记制度。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经过市文物局批准,获得博物馆登记证书后的博物馆,才可以对社会开放。从法律上确立市文物局对博物馆资格管理的职能。博物馆设立需要符合法定条件,要有一定数量的藏品、标本,有固定馆址和辅助设施,有相应的研究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具备收藏、研究、展示功能,具备开放条件和安全设施,每周对公众开放3天以上。这些法定条件的设立,明确了博物馆准入门槛,有利于保证博物馆总体质量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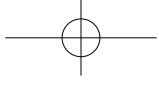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博物馆登记制度还包括:登记证书主要登记内容变更的,应当到市文物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终止开办的,还应当办理注销登记。这里也首次提出了博物馆终止开办的情况,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博物馆不必须是一个永久性机构,博物馆可以终止开办;终止开办,要履行相应的注销手续。

(三)允许公民个人建立博物馆。公民个人建立的博物馆,参照《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有关条款执行。这是在政府规章中首次出现公民个人建立博物馆的表述。公民个人建立博物馆的设立条件、需要履行的法定登记程序与国家设立的、集体设立的博物馆的要求是一样的,没有因为是个人的设立而放宽条件。

(四)确定博物馆的任务和性质,博物馆是以收藏历史和现代人类物质文化标本及自然科学标本、实物为主要任务,并对此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的非营利性机构。凡是登记注册的博物馆,除符合法定条例外,在日常工作中,还必须履行博物馆的义务,不能改变博物馆的性质。

《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改变了以往文物行政部门只对博物馆进行业务管理的局面,将博物馆资质管理权赋予市文物局。并增加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可以予以责令改正、警告、撤消登记的处罚。自此,市文物局对博物馆的行政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北京馆藏文物管理规定》依据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和1987年制定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对馆藏文物的规定,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对馆藏文物的使用、管理做了更为严格和细致的规定。主要内容还是以对文物



的管理为主。2002年《文物保护法》进行修改,2004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公布施行,两部法律法规在内容上都包含对馆藏文物的管理规定,而且规定较为详尽,因此,《北京馆藏文物管理规定》于2004年10月1日起废止执行。

三

改革开放第三个10年,国务院颁发的《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相继出台,开始规范地方立法行为,限制地方立法权限,强调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既要内容合法,又要程序合法。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也由原来的重管理,重处罚,逐渐转变为管理与发展并重,处罚与监督结合。地方立法开始注意听取被管理者的意见,专家参与立法,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在《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施行6年后,经过总结北京市文物局对博物馆的管理经验,北京市出台自己的博物馆地方性法规时机已经成熟。在多次召开博物馆、相关管理部门、专家座谈会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2000年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博物馆地方性法规。2005年文化部部务会审议通过了《博物馆管理办法》,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是在《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内容涵盖了《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并有所扩充,因此,从《北京市博物馆条例》施行之日起,《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废止执行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的制定,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北京博物馆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博物馆行业需要规范,需要健康有序的发展。这是北京博物馆发展的必然产物。《北京市博物馆条例》的主要特点反应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博物馆地方立法中首次出现有关发展与保障的内容。立法的目的从政府对博物馆的单纯管理,到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博物馆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促进博物馆发展方面,首先是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办博物馆;其次是允许博物馆可以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以发展博物馆事业;第三是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博物馆捐赠或者提供资助。在保障博物馆事业发展方面,首先是要求各级政府将博物馆事业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其次,博物馆的主办者应当保障博物馆正常业务活动经费;第三,在宏观上引导博物馆多元化发展,设立专题性博物馆,避免博物馆种类过于单调或者集中。

(二)规范行政部门的职权和自由裁量权。明确提出申请博物馆注册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市文物局接到申请后审查程序、办理期限和回复方式。虽然此时《行政许可法》还没有制定出台,但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中已出现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审批权利的条款,这一立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法规条文中不再都是针对被管理者的内容,而是同时约束管理者,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责。

(三)加强对博物馆的监管力度,资格准入审批不再是管理的唯一手段,规范行为,日常监管,对违法行为处以必要的处罚成为与审批并重的管理方式。

(四)进一步提出博物馆是社会公益性机构,博物馆运行期间,应当更好地完成其承担的社会任务。如:博物馆应当提高展览水平,举办临时展览、巡回展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陈列展览以原物、真迹为主,使用复制品、仿制品和替代品的应当予以注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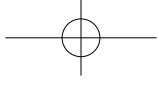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博物馆条例》已经提出博物馆免费问题,虽然免费范围只对青少年学生,对其他特殊人群优惠开放,力度没有现在大,但足见立法机关早在2000年就已经开始考虑免费这一问题了,这也是体现博物馆社会公益性机构的一个方面。

此外,《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规定,如鉴于藏品的数量和体系是博物馆成立的必要条件,对非文物藏品的处理需要向市文物局备案。以博物馆名义征集、采集的藏品必须在藏品总帐中登记。在博物馆的设立条例中增加了对馆长的要求等。

《博物馆管理办法》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的博物馆法,从管理者的角度,首次对博物馆做出了具体的定义,对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也下了定义。还对博物馆的设立、年检、终止和日常的管理与服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博物馆管理办法》的施行,也将推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的修改工作尽快提到日程。

回顾3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相信随着博物馆立法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博物馆事业必将更加健康、有序、蓬勃的发展。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



改革开放 30 年

北京地区博物馆对外 交流与合作工作综述

范 军

改革开放 30 年，北京的博物馆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全市博物馆的数量从 1976 年以前的 15 座骤增至目前的 140 余座。博物馆已经成为提升北京城市形象、展示城市独特魅力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发展北京文化旅游产业、衡量城市开放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获得了快速发展。30 年来，对外交流活动呈现了从单个、单一、分散到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资源整合的发展过程。

一、北京博物馆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历程

（一）1978—1989 年，从无到有的恢复时期

1978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成立，标志着文博工作走上了正轨，博物馆加快了建设步伐，获得迅速发展。到 80 年代末，北京地区已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和具有博物馆性质的文物单位 62 座。

这一时期文物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首要工作，是为了规范管理而建章立制。1978 年至 1982 年，国家文物局先后发布了《关于外国人拍摄一级品文物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通知》、《博物馆涉外工作的通知》、《关于文物事业涉外工作的几点意

见》等涉外法规性文件，特别是在 1982 年的《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进出境、特别是文物出境展览做出了详细规定，为博物馆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提供了法规依据。1984 年，市文物局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北京的具体情况，制定发布了《关于文物部门归口管理同港澳台地区进行交流工作的审批制度》，规定同港澳台地区进行交流工作由市文物局统一归口管理。1988 年，在市文物局办公室设置了外事职能部门“对外联络处”，同年制定了《关于涉外工作的暂行规定》，对全市文物外事工作的范围、管理程序、出国团组的申报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1983 年，中国博物馆学会作为中国国家委员会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随着国家和北京市对外开放领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作为政府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地区博物馆开始了以对外文物展览为起点的对外交流与合作。1985 年，市文物局组织了《北京历史文物展》随“北京经济贸易展览会”代表团赴美展览，展品悠久的历史、精美的造型艺术、高度的科技和工艺水平展示了北京的历史风貌与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为整个展会增添了隆重雅致的气氛。1987 年起，《徐悲鸿绘画展》先后赴加拿大、香港、苏联、罗马尼亚和马来西亚展出，受到了所在国观众的热烈欢迎。1988 年，为纪念



中日友好条约缔结 10 周年，首都博物馆与日中友协在日本东京都共同举办了《北京历史文化展》。同年，《中国书法名品展》在东京、大阪展出。1989 年春节，《老北京春节风俗展》在新加坡展出。

可以看到，出国文物展览是这一时期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博物馆的对外交流尚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少、规模小、形式单一。出国文物展览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我们打开了窗口，积累了宝贵的涉外交流经验，搭建了人员交往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1990—1999 年，蓬勃发展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先后于 1985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9 年加入《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3 年加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1997 年加入《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与国际文博界的交流日趋广泛和实际。同时，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也得到加强和完善。1993 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关于加强文物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意见》、《文物出国（境）展览暂行管理办法》及《文物出国（境）展览细则》。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北京市文物局先后于 1995 年制定了《北京地区利用文物开展外展的规定》，1996 年制定了《文物外事“九五”规划实施方案》，1997 年制定了《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出国（境）展览的暂行规定》，为其后几年北京的文物外事工作发展提供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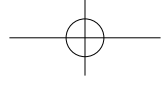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北京文博界的开放意识明显加强，博物馆的对外交流活动进入活跃期。以文物外展为龙头，各种交流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交往的国家和地区近 20 个。

首先是文物外展日趋活跃、数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十年中，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各类外展超过 20 项，观众人数近 50 万。其中，1990 年徐悲鸿纪念馆在新加坡举办的《徐悲鸿艺术五十年回顾展》引起了轰动，被当地报界称为在新加坡刮起了“徐悲鸿旋风”。同年，首都博物馆组织《中国历代古钱币展》赴美国洛杉矶巴沙迪娜市展出，360 枚价值连城的中国古币首次在美展出，吸引了 3 万人次参观，美国各界认为这个展览是到洛市举办的最具价值、最受欢迎的外国展览之一。1991 年，《中国茶文化展》在新加坡展出，展销相结合，寓茶展于新春游乐之中，以独特的开放展览形式吸引了超过 3 万新加坡观众，被当

地媒体评为“最佳贺岁节目”。1993 年，北京艺术博物馆在新加坡文物馆举办《中国当代水墨画展》，展出了包括应诗流、康淑贞、赵建成等当代中青年画家具有创意的绘画作品 120 幅，三天时间内近 5000 人参观了展览并给予了较高评价。通过这个展览，北京艺术博物馆与新加坡文物馆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就互换展览、开展文物鉴赏及文化交流活动签署了备忘录。1994—1995 年，应日本长江株式会社的邀请，首都博物馆组织《爱新觉罗家族文物展》赴日本进行巡回展览，首博特邀爱新觉罗家族重要成员、溥杰的四弟溥仁先生参加展览交流活动，日本众多媒体对展览做了广泛宣传，日均观众量达 1500—2000 人次。还有些观众带来家里收藏的中国文物，请首博的专家帮助鉴定。这次展览深入到日本民间，与老朋友加深了友谊，也结交了新朋友，影响深远。

十年间，各博物馆与台湾地区的展览交流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1994 年，徐悲鸿纪念馆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徐悲鸿绘画艺术展》，在当时创造了三个第一：一是“千岛湖事件”后大陆第一个入台的项目，对打开两岸僵局起了积极作用；二是创台北历史博物馆建馆以来展览参观人数最多的一个，26 天内参观人数达 66000 多人次；三是门票收入达 132 万新台币，创最高记录。1995 年，由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共同举办的《历代紫砂瑰宝展》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台湾众多媒体对大陆国家级博物馆联袂首次在台办展给予了大量报道，日均参观人数达 2—3 千，通过以壶传情的方式加大了大陆在台湾的影响。1999 年，首都博物馆在台湾北港朝天宫举办《首都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艺术展》，为期 3 个月，把祖国大陆丰富的佛教文化带到台湾中南部地区，也向当地同胞展现了北京博物馆的风采。

与此同时，一些有特色的国外展览开始进入北京观众的视野。如：1996 年炎黄艺术馆举办的《比利时现代艺术展》、《佐藤敬一郎陶瓷作品展》，徐悲鸿纪念馆举办的《比利时阿拉男爵素描展》、《海峡两岸画家书画联展》。1998 年，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画如其文》艺术展，首都博物馆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合作举办了《马可·波罗文物遗迹展》，辽金城垣博物馆举办了日本学者阿南史代和德国摄影家刘小岛的《沿千年古道而行——京城辽金佛教遗迹摄影展》。这些引进展都受到了北京观众的喜爱和



好评。

以展览交流为契机,各博物馆也纷纷根据自身的特长和需要开展了多种内容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项目。北京文博交流馆于1994年和1997年组织京音乐团分别赴台湾和菲律宾演出,古老的京音乐以其庄严典雅的旋律、意境悠远的曲调深得台湾同胞和菲律宾各界人士的推崇和喜爱。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白塔寺、大钟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卡通博物馆等纷纷到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宣传、展示、推介自己,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境外旅游者带来的参观收入不断增加。对外开放还为博物馆带来了可贵的捐资、捐赠合作项目。1995年,美国百茂投资管理公司索思曼先生捐赠15万美元成立“索思曼中华文物保护中心”,用于对北京地区的馆藏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1997年,日本老舍研究会将日本的中国文学爱好者们用4年时间募集的11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75.3万元)捐赠给老舍故居,全部用于老舍故居的修缮和开放。1998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获得了美国世界文化遗址保护基金会、美国运通公司3万美元的捐赠项目,用于修缮先农坛具服殿;之后几年,先农坛神厨井亭和大门、庆成宫后殿等先后被列入该基金会的年度保护项目名单,从而获得美国运通公司、美国FLORA家族基金会总计22万美元捐款,用于建筑维修和古建彩画保护课题的研究。

回顾这十年的发展,出国(境)文物展览在博物馆的对外交流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发展迅速、成绩显著。文物展览的举办,很好地带动了中外博物馆之间的学术交流。博物馆专业人员通过参与展览的组织、筹备,专业素质和水平得到了提升。展览期间通过组织讲座、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拓展了展览的广度和深度,为专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创造了条件。另外,初涉市场经济的各博物馆在对外交流中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纷纷尝试通过对外商业展览、引进外展、以展带销、经贸项目合作、争取捐款捐助等方式为博物馆增加收入,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博物馆经费的不足。

(三) 2000—2008年,抓奥运之机,实现历史性发展和提高

“人文奥运”的目标为北京的博物馆事业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使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建国以来北京地区第二次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高潮。

博物馆的对外交流工作抓住机遇,积极整合资源、开拓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国际间的文博交流活动,特别是加强与世界一流博物馆及各种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充分整合博物馆资源,精品展览频频走向国门,以东方古都的魅力展现北京形象。

2000年,由市文物局牵头,经过精心策划推出的《北京古代艺术珍宝展》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佳士得公司总部展出,成功地在纽约主流社会掀起一片北京热潮。展览汇集了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和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文物精品,是北京博物馆界在对外交流中整合资源、走精品战略的一次初步尝试。

2000年10月—2001年2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与湖北省博物馆合作,在法国巴黎音乐城隆重推出《龙之声——中国钟铃艺术展》。此展览作为2000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季”的重要活动之一,取得了极大成功,共接待欧洲各国观众近6万人,法国总统希拉克也亲临展览。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为配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好地宣传和展示北京的形象,由北京市政府主办、市文物局承办的《帝王之都——北京古代文物珍宝展》在希腊国家美术馆展出。这是首次在希腊举办的中国文物展览,汇集了百余件北京文物珍品,吸引了16万人次的各国观众,同时举办了40次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展览成为在希腊奥运会期间充分宣传北京历史文化、让世界各国观众了解北京的一个展示平台。

2005年7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香港海防博物馆举办《八年抗战》大型展览,使香港观众充分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增强对祖国的荣誉感和凝聚力。

2007年—2008年,首都博物馆在墨西哥蒙特雷市举办了《中国古代观音菩萨造像艺术展》。该展览是中国作为主宾国在墨西哥塞万提斯艺术节期间举办的最重要活动之一,同时也是蒙特雷市举办的“2007年世界文化论坛”期间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受到极高评价。

此外,2002年首都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长城文化展》,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银装盛彩——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展览》,2004年以来保利艺术馆多次赴香港举办的《海外回流文物展》,2005年北京文博交流馆与中国新闻社巴黎分社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巴黎——北京名门之秀摄影展》,2005年以来老舍纪念馆联合北京六家名人



故居相继在韩国、日本等地举办的《中华名人展》等展览及相关学术交流活动都各具特色，各展所长，有些已形成了品牌效益。

2、引进优秀国外展览，给国内观众带来种类繁多的艺术享受，凸显北京作为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多元性。

2006年，作为“中印友好年”的重要文化交流项目，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和印度考古局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共同承办的《西天诸神——古代印度瑰宝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展出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8世纪印度古代雕塑作品，包括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等起源于印度的宗教雕塑艺术作品，使观众感受到古老而辉煌的异域文明的非凡成就，领略了印度人民的勤劳与智慧。2007年，由首都博物馆与法国卢浮宫主办的《卢浮宫珍藏展——古典希腊艺术》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共展出130件大理石雕塑、陶器、金器等精美艺术品，集中展现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文明走向巅峰时期的“希腊古典时代”，吸引了数十万观众前去参观。2005年，《法国钟铃艺术暨法国历史展》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举行，展出97件（套）以钟铃为主的文物展品以及文献资料、历史照片、电影资料等，法国国宝级文物巴士底狱钟和大钟寺的明代永乐大钟同时在北京敲响。相继举办的《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展》、《阿拉伯艺术节展览》、《墨西哥古文明展》、《马普切：智利的起源》展、《庞贝末日》展、《意大利国宝——美杜莎胸像雕塑展》、《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铜器文物精品展》等，将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精髓在北京集中展现。

除了古代文物展，各博物馆还引进了世界近、当代不同流派的艺术经典。2002年，“双艺合璧——瑞士摄影家鲜伊代克镜头中的大师贾科梅梯”巡回展在正阳门举办，使观众通过观察著名艺术家贾科梅梯的作品和生活，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两个门类（雕塑、摄影）及其主要流派有所了解。2007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余震：英国当代艺术展1990—2006》，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英国当代艺术的重要阶段——“艺术爆炸”时期成长起来的12位声名显赫的艺术家的主要作品。此外，俄罗斯《太阳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辉煌》艺术展、《摄影的诞生——一项法国的发明》和《维利·罗尼眼中的巴黎》摄影展、《高迪的世界——建筑、几何和设计》展、《意大利世界遗产体验展》、

《伟大的文明》、《现代希腊艺术的经典回忆》、《百年奥运海报展》、《公平的竞争——古希腊竞技精神展》等，都给国内观众带来了空前丰富的艺术享受。

3、学习借鉴与开拓创新，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地开展交流与合作，为北京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服务。

2007年，市文物局与法国欧洲文化行动协会合作开展培训项目，在京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博物馆管理与展览组织高级研修班”，由法国博物馆界的权威专家授课，我市20多家博物馆的40余名馆级领导和业务骨干参加了培训。法国专家从博物馆管理、展览策划组织、纪念品开发销售等方面做了专题讲授和实地讲评，并与学员们充分交流意见。培训在北京博物馆界取得了热烈的反响，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今后的此类合作开了一个好头。

作为北京市新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建筑之一，首都博物馆新馆为了达到建设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现代博物馆的目标，从场馆设计、建设阶段就实行国际招、投标。从2004年起，选派馆领导参加美国梅隆基金会博物馆馆长项目培训，选派业务干部赴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和文化博物馆进行业务培训，与大英博物馆就博物馆人员培训和引进展览达成合作意向。2006年首博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后，积极发挥其对外交流的带头作用，与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墨西哥人类学历史博物馆等合作，引进了一批高水平的国外展览。通过与国际知名博物馆的交流合作、举办“国际博物馆论坛”、“中日韩首都博物馆学术研讨会”等活动，提高了首都博物馆的知名度，香港、台湾、日本等地华人华侨纷纷向其捐赠文物。同时多次承担政府重要外事活动，如2006年外交部外国记者新年招待会、文化部阿拉伯艺术节、市政府2006年驻华使节新年招待会等，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首都博物馆开馆一年间，吸引参观人数达77万余人次，接待国家级等重要贵宾91批次，国家及市领导到首都博物馆出席外事活动或陪同参观40批次。举办学术研讨会、讲座17场，国内外著名学者走进首都博物馆报告厅做学术报告，听众达2000余人次。配合高水平的展览和研讨会，先后出版、发表专刊和图录26种。首都博物馆不仅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硬件设施，而且其功能正在迅速提升，高水平的外展、外事活动大大提升了



“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专栏

其国际知名度，首都博物馆已经成为北京市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对北京的文博事业发展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利用自身优势，主动开展与国外钟铃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与欧洲钟铃艺术学会合作举办中国古钟展览，互赠友谊钟。近年来，分别与意大利、日本、韩国的古钟专家开展中外古钟文化的合作研究，并积极促进成立“亚洲古钟文化研究学会”。此外，北京艺术博物馆与土耳其托布卡比宫博物馆开展的对海外元青花瓷器的研究与合作，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展陈技术合作，徐悲鸿纪念馆引进的油画修复技术，老舍纪念馆与日本老舍研究会合作开展的老舍作品学术研究工作，白塔寺开展的中尼文化交流活动，智化寺京音乐赴香港进行交流和展演活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文研所等单位举办的“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为提高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国际合作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合作也开展的丰富多彩。四地之间的互办展览、人员往来、捐资捐赠、项目合作等交流十分频繁，特别是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成就展》在首都博物馆的成功举办，加深了两地博物馆界互信、互助的友好情谊。2009年底，《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成就展》又将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2007年，北京地区博物馆界首次组团赴香港参加“5·18国际博物馆日”纪念活动，建立了“京、穗、港、澳”四地联合举办“5·18国际博物馆日”纪念活动的互动机制。

二、对外交流与合作在北京博物馆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博物馆的对外交流与博物馆的建设发展齐头并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就像一块试金石，对我们的工作水平、工作成绩给予了客观的检验和评价。

在奥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北京的博物馆以多种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展览吸引了大量中外观众。仅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市文物局所属17家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12,819人，其中外宾6,882人。接待包括：萨摩亚元首、东帝汶总统

及夫人、瑞士联邦主席及夫人、拉脱维亚总统、新加坡总统、毛里求斯总统、塞浦路斯总统夫人、比利时副首相、汤加王储、库克群岛女王代表、泰国公主诗琳通、佛得角总统夫人、塞浦路斯前总统夫人、伊朗副总统、拉脱维亚总理、尼泊尔国家总理和夫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古妮拉·林伯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匈牙利国防部长、哥伦比亚文化部部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奥运之父”顾拜旦后人、尼泊尔奥委会主席、西班牙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馆长、香港企业界代表李嘉诚等奥运重要宾客50批次。宾客们都认为，北京的博物馆特别是首都博物馆，无论是展览，还是接待服务，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北京众多的博物馆和内容异彩纷呈的展览，为奥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和运动员提供了充分的艺术享受，为奥运会增添了浓重的人文色彩。

得益于筹办北京奥运会所提供的广阔国际舞台，各博物馆的涉外馆际交流规模逐步扩大，内容愈加丰富，资源得到整合，对外交流与合作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全方位发展态势。出国（境）文物展览数量和质量得到提升，来京文物展览数量迅速增多，已经成为首都文化外交中的亮点，为展现古都悠久历史，为北京向兼容并蓄的现代国际化都市迈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交流活动不仅使我们及时了解到国际博物馆的最新理念，并且树立了北京博物馆的崭新形象，赢得了赞誉和尊重，为推动北京的博物馆更快地向现代博物馆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取得的基本经验

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对于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我们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经验和启示：

1.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对外交流工作才能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2. 必须树立大局意识，以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服务于首都对外形象和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对外交流工作才能不出偏差，有所作为。
3. 必须坚持依靠政府领导、政策扶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对外交流工作才能形成合力，再创辉煌。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



改革开放 30 年

北京地区文物流通市场的发展与现状

张 展

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民间文物收藏基础雄厚，文物流通市场发达。目前，北京市文物商品的交易量和经营额都为全国各省市之首，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交易中心。文物流通市场，已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北京经济新的增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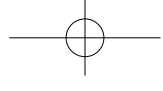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一、北京地区文物流通市场的历史背景及发展经过

北京地区文物流通市场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一是具有文物拍卖资质的文物拍卖企业，二是文物商店，三是“旧货市场”。

（一）北京地区文物拍卖企业的历史背景及发展经过

改革开放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物流通模式（文物商店、文物监管旧货市场）已经不再适应改革开放后群众的社会需求。1988 年，北京市出现了第一家文物艺术品拍卖经营单位，也举办了一些小型的文物拍卖活动。当时拍卖的物

品均为文物监管物品，并只限于国内买家。1992 年，为配合“中国黄金旅游年”，曾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文物国际拍卖会，买家主要为境外收藏家和游客。这是北京乃至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首次国际性拍卖。其后在北京及其它省市，文物艺术品市场雨后春笋般的迅速涌现。1993 年，国家文物局在京、沪、粤三省市试点文物艺术品拍卖。1994 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实行“直管专营”政策，即由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资格，除此之外的任何单位均不得从事文物艺术品拍卖活动，并首批在全国认定 6 家文物拍卖企业，其中北京有“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即今中贸盛佳）、“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4 家。1996 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关于加强文物拍卖标的鉴定管理的通知》，结合当时的国家政策法规，参照国际惯例，规范文物拍卖标的鉴定管理。1996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2002 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实施条例》颁布实施，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做出了较为详尽的管理规定。十余年来，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队伍迅



“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专栏

速发展扩大,拍卖年经营额连年上升。2004年,北京地区共有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29家,2007年达到81家。在举办拍卖活动的场次上,2000年为70场,2007年为183场。近年来在文物艺术品拍卖活动中,海外回流文物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占总拍品数量的20%以上。总之,无论在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的数量上,还是在拍卖场次上均呈整体上扬趋势,都达到了历年最高。由此可见,北京作为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在国际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业中,北京已经成为继美国纽约、中国香港之后的第三个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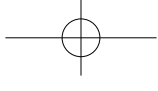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二) 北京地区文物商店的历史背景及发展经过

北京地区的文物商店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将解放前的私营店铺转变为公私合营或合作的基础上,在60年代初成立的,由外贸、商业、文化、海关、公安等部门对其进行联合管理。当时的政策制定更偏重于出口创汇。这时的文物商店性质应属于纯商业。1960年,文化部、商业部、外贸部联合颁发了《改变文物商店的性质和管理体制的方案》,将文物商店的纯商业性质变为企业化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其主要任务是为大量兴建的博物馆征集展品。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开始将公私合营的文物商店变更为或新成立为国营的文物商店。1974年,外贸部、商业部、文化部、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执行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文物商店的体制。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发了《文物商店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各地新设立文物商店时必须报请国家文物局或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明确规定国营文物商店在内部的经营机制上,销售、收购、保管三个部门必须分设。当时的文物商店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符合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物商店的这种“体制”和“管理机制”成为阻碍国营文物商店自身发展的主要原因。计划经济时代的文物经营高度垄断,使文物的自身价值难以体现。国营文物商店特定时代的低收高出,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使散落于民间的传世文物持有者不再将文物低价出售给国营文物商店,而更多的进入了处于上升阶段的文物拍卖市场。2002年,经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到2007年底,北京地区依法批准成立了近50家民营文物商店。

(三) “旧货市场”的历史背景及发展经过

改革开放后,文物商业经营的“三统一”模式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变化,加之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一些自发的、小规模旧货摊贩出现了。他们混杂于农贸市场中,出售的物品多为古旧民间日用品和中低档工艺品。70年代末期则出现了专门的旧货市场。这期间他们经营的物品不乏高档次的文物。历代钱币、官窑瓷器、古旧家具、铜器牙雕等应有尽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业人员队伍逐渐壮大,市场规模发展迅速。这种路边市场严重影响交通、严重扰民、秩序混乱、环境脏差,经营者来自各地,多无执照,市闭人散,倒卖出土文物、偷盗文物、制假贩假现象间或有之。最初,政府的行政命令在处理此类问题上显得苍白无力,行政命令与商业手段严重冲突。在此种局面下,北京市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经过多次调研,在1989年率先开创全国第一家由工商部门管理、文物部门监管的“旧货市场”,将散落在全市经营文物旧货的商贩集中在监管市场中,允许经营1911年以后的文物监管物品,并严格禁止交易国家不允许经营的文物(出土文物、田野石刻等)。1992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工商局、海关总署、公安部四部委经过全面调研,并参考了北京市的做法,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基本上肯定了北京市的方法,明确规定了旧货市场中销售文物的范围,强调了此类市场应由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实行监管,又特别强调“在市场中购买的文物需要出境时,必须办理出境手续”。此文件的下发,打破了文物商业经营国家垄断的现状,首次公开允许民间在一定范围内经营文物。之后,原本混乱的局面逐渐趋于规范。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北京地区先后批准了此类旧货市场12家并延续至今。自1997年始,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商委、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旅游局、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等部门主办、北京古玩商会承办的“北京中国古玩博览会”延续至今,每期届时3天,2005年以来每期4天。参加博览会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文物商店及文物市场。当然,博览会中也有新工艺品的制造、销售厂商。销售额呈每年递增的趋势,2006年的销售额达到5.3亿元。近两年来,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古玩艺术品博览会由以前的每两年一届发展到每年一届,参展商家的层次不断提高,展品的水平逐渐精致。不仅如此,北京的文物商家每年还组团参加外省市的此类博览会,相互学习和交流。



二、北京地区文物流通市场的主要成绩

北京的文物流通市场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成绩突出。无论是文物拍卖,还是文物商店乃至文物市场(此前的文物监管旧货市场),在全国多属于领先地位。

(一) 北京地区文物拍卖企业的主要成绩

自1993年始至今,北京的文物拍卖业走过了15年,队伍逐渐壮大、运作更加规范、成绩日益突出。仅以2005年为例,北京翰海的“明永乐青花折枝八方烛台”拍出了2035万元,创出了当年内地瓷器拍卖最高纪录。“明代铜药师佛坐像”拍出1100万元,创当年铜器拍卖最高纪录。中国嘉德所拍《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拍出1012万元,黄宾虹的《山川卧游图》拍出638万元。中国保利所拍徐悲鸿《珍妮小姐画像》拍出2200万元,黄胄的《丰收图》拍出1595万元,吴冠中的《鸚鵡天堂》拍出3025万元。诚轩公司所拍李可染《烟江夕照图》拍出1540万元。九歌拍卖公司所拍王琿《仿唐宋元诸贤横景六幅》拍出3520万元。这一年,北京的文物拍卖企业有12家拍卖成交额达到亿元,大部分拍品来自国内,海外回流文物有所增加,其中有的公司海外回流文物占拍品总量的80%以上。

(二) 北京地区文物商店的主要成绩

近年来,北京地区的文物商店不仅在数量上逐渐增加,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现在的文物商店整体水平在提高,仅以北京古玩城为例,古玩城内集中了北京地区经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的文物商店30家,占北京地区文物商店的一半以上。这里的文物商店经营的文物种类繁多,店面整洁、环境优雅。

文物商店取得的成绩,不仅指档次的提升,而且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做出了贡献。首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文物已经不再只是用来出口创汇,而成为百姓收藏中所追求的重要器物。其次,文物商店为繁荣市场、为文物收藏爱好者提供交易场所。再次,文物商店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对不同等级文物的需求。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文物商店的存在不可或缺。同时,它的存在也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

(三) “旧货市场”的主要成绩

2002年前《文物法》没有修改时,旧货市场

允许经营1911年以后的文物监管物品,由工商部门管理,文物主管部门负责监管。2002年,修改后的《文物法》规定只有取得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文物商店及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可以经营文物,以前的旧货市场已经不在经营文物范围之列。但是,“旧货市场”是历史形成的,也符合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北京市至今未对“旧货市场”进行取缔。

自1989年北京批准第一家文物监管旧货市场到2008年的20年间,北京地区的文物监管市场取得的成绩是众人皆知的。首先,解决了自发的旧货市场中倒卖出土及国家明令禁止买卖文物的问题。街头市场倒卖文物,环境脏差的现象不再出现,换来的是集中在市场经营,工商部门进行管理,文物主管部门进行监管。其次,对旧货市场的管理过程中可以发现国家明令禁止交易的文物或国家遗失的文物,进行干预或追索。再次,满足了各阶层人士对不同等级文物及旧货的收藏需要。最后,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

三、北京地区文物流通市场存在的问题

北京地区文物流通市场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文物艺术品交易业作为政府支持与扶植的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我们也应看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在文物流通市场快速发展中,问题也是存在的,在某些方面还比较严重。

(一) 文物拍卖企业存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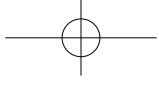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北京地区的文物拍卖企业在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1) 文物拍卖企业数量增长过快、发展过热;
- (2) 文物拍卖企业进入拍卖市场有明确进口而没有明确的出口;
- (3) 个别文物拍卖企业举办拍卖活动不规范,违规操作;
- (4) 文物拍卖企业中卖资质的问题已属常态。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是文物拍卖许可证是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的,作为地方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权利发放与收回。还有一些问题是国家文物法规中没有涉及到的,而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又没有相应的文件加以规定,因而无法采取措施。

(二) 文物商店存在的问题

- (1) 国营文物商店在文物放开国内经营后,



“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专栏

收购文物很难，好一点的文物几乎都上到拍卖会，国营文物商店职工较多，因而难以维持生计；

(2) 民营文物商店在每年的工商年检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注册资金不足、没有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很不规范；

(3) 国营文物商店每年的税收执行 2% 的税率，而民营文物商店未执行此标准，国营文物商店和民营文物商店税收政策不一致。

(三) “旧货市场”存在的问题

文物监管旧货市场存在的问题最多，解决起来难度也最大。

(1)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改后明确规定可以经营文物的只有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文物商店及文物拍卖企业。“旧货市场”属于不允许经营文物的场所。而当初为了解决马路市场等问题，经四部委批准的十余家文物监管旧货市场还能否继续存在？类似于潘家园市场、北京古玩城等现在属于北京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植对象，现存的情况与《文物法》的要求存在矛盾，今后如何解决？

(2) 除原有的文物监管旧货市场外，近些年来未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又相继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古玩城如成田古玩城、天雅古玩城等，这些所谓的古玩城只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后就经营文物了，这种势头继续下去有悖于文物法规的准则。

四、对文物流通市场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 对北京地区的文物拍卖企业中存在的问题

(1) 关于文物拍卖企业有进口没有出口的问题。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只有文物拍卖企业设立审批的标准而没有行政处罚标准。因此，应与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制定此方面的标准。如果本地区可以制定此方面政策的话，我们建议应该设定“文物拍卖企业 3 年内不举办任何拍卖活动的应建议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收回文物拍卖许可证”。当然还应该设定有其它的出口。如：现有文物拍卖企业专家数量达不到要求时暂停举办活动，暂时收回拍卖许可证；如果两年内专家数量仍达不到要求，要停止该企业的拍卖资质并收回拍卖许可证。再如：文物拍卖企业违规操作，文物主管部门要做违规记录，企业 3 次违规后要取消拍卖资质并收回拍卖许可证。

(2) 关于企业拍卖资质的问题。建议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尽快出台“关于联合拍卖的有关意见”的文件，规范联合拍卖的做法。应采取就低不就高的方法，联合拍卖活动中如果是一类企业与二、三类企业联合拍卖，只允许按照二、三类的资质范围审批拍品。此举可以解决卖资质的问题。

(二) 对于北京地区文物商店存在问题

(1) 关于民营文物商店年底工商验资不达标的问题。此问题应由工商部门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分别就不同情况协商解决。我们认为对于民营文物商店，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对于存在的问题应该主动协助加以解决。工商部门负责协助、督促规范企业应做的资产负债、损益等表格。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工商部门年底验资时协助工商部门对文物商店的库存文物估价，以解决验资不达标的问题。我们认为文物商店的库存文物应该属于注册资金的范畴。

(2) 对于文物商店的税收问题。建议税务部门应对国营文物商店与民营文物商店采取统一的税收政策。

(三) 关于对北京地区文物监管旧货市场存在问题

(1) 鉴于此类市场不属于经营文物的范畴，因此不论是文物主管部门，还是工商部门都不得再行批准成立。工商部门必须严格把关，凡市场带有古玩字样的都不得同意设立。应该把工艺品市场与古玩市场区别开来，以便于今后的管理与执法。

(2) 对于已经成立并经营的市场，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部门共同对其进行审核，按文物商店的登记审批标准，将合格的“旧货市场”批准为文物商店经营场所，由“旧货市场”经营管理主体负责日常依法监督管理，将经营文物的商户都集中到经批准的古玩市场中。这既解决了现有“旧货市场”违反法律规定的尴尬局面，也保证了“旧货市场”今后合法生存和健康发展。

北京的文物流通市场，是北京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文物局作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不断加强对市场的调查和研究，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为其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处长)



李学军

为在 2008 年北京奥运期间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成就，北京市在奥运会期间集中全国各省市、地区的文物精华，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北京文物精品展》、《中国记忆——5000 年文明瑰宝展》、《长江文明展》等五项大型精品文物展。以上各项展览汇集国宝级文物重器之多、参展文物等级之高、类型之丰富是空前的，堪称我国博物馆界一项空前的盛举，也是全国博物馆界向北京奥运献上的一份厚礼，对于体现“人文奥运”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展览一经推出，社会反响强烈，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回顾与总结此次大展的成功经验并从中获得启示和借鉴，对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展览陈列水平、充分发挥社会文化功能、打造并推出更多精品陈列满足社会需求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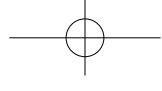
一、展览项目策划与提出的社会背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既是体育的盛会，也是文化的盛会。为实现“人文奥运”的文化理念，利

用奥运契机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古都北京的神韵，市文物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 2007 年即提出了“以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大型文物精品展览为主干，以北京各博物馆现有展览及藏品资源为依托，以引进国内外精品展览为补充，采取自主筹办、联合举办、统一宣传的模式，在北京奥运期间实现博物馆‘双两百’展览展示工程”的工作原则。其中，《中国记忆——5000 年文明瑰宝展》、《长江文明展》、《北京文物精品展》、《紫禁城内外的竞技游戏展》、《公平的竞争——古希腊竞技精神》五项展览成为了诸多展览项目的骨干。

二、五大展览盛况空前，观众反响强烈

经过近两年的紧张筹备，伴随着奥运盛会的临近，在 7 月 23 日至 31 日这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五大历史文化展相继在首博拉开帷幕，近千件精品文物集中亮相京城，带给国内外观众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参观人数连



五大展览相继推出，观众排队入场

创新高，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博物馆作为“人文奥运”理念的重要实践者，真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北京文物精品展》作为相对固定的基本陈列，汇聚了 285 组（件）代表性文物展品，通过瓷器、佛教造像、玉器、金银器、竹木牙雕、书画艺术和古典家具七大主题，折射出北京历史的风采。展品除首博自有的精品外，还包括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及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福建等省多家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如克盃、克罍、堇鼎、伯矩鬲、珊瑚红地珐琅彩花鸟瓶、青花凤首扁壶、唐《八十七神仙卷》、宋徽宗《雪江归棹图》、辽代陈国公主墓鎏花银靴、明十三陵累丝龙纹金盖金托盘玉碗等。开幕当日不到 9 点已有许多观众在北门外排队等候，日接待观众 5749 人，第二天观众达 6778 人，免费预约服务热线也随之爆满，随后的第一个休息日观众量即猛增至 12192 人，接连刷新免费开放以来日最高接待量纪录。

《中国记忆——5000 年文明瑰宝展》作为奥运期间最为重要的全国性大型精品文物临展，由北京市政府、北京奥组委、国家文物局及 25 个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共同作为主办单位。展览分为曙光初照、礼乐安邦、盛世华美、古典终极四个部分，共展出 26 个省市 55 家文博单位的 169 件（套）国宝级文物重器，涵盖青铜、陶瓷、玉器、书法、绘画等多个类别，突出表现了中华文明所创造的空前的文化财富和历史遗产。人面鱼纹彩陶盆、商后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饰、秦始皇兵马俑、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 T 形帛画、西汉金缕玉衣、东汉铜摇钱树、击鼓说唱俑、错银牛形铜灯、东晋《洛神赋图》卷、唐绢本王羲

之《兰亭序》等国宝文物汇聚一堂，生动地勾勒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轮廓，虽不能说绝后，但确是一次空前的展览力作。开馆不到 10 分钟，大厅售票台前就排满了观众，当日接待购票观众 4693 人，随后的第一个休息日购票观众即猛增至 8199 人。每日排队等候进入展厅的观众队伍都长达数百米，直至停止售票。观众在一件件精美的国宝级展品前长时间驻足观看，流连忘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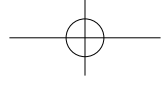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长江文明展》由北京市政府、北京奥组委、国家文物局及 11 个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共同作为主办单位，全方位展示长江的地理

环境、自然风光以及长江先民们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集中展出长江流域各省市 15 家文博单位精品文物 143 件（套），具有代表性的商代云雷纹建鼓、商代戴金面罩铜人头像、战国乳钉纹虎耳铜方鼎、战国铜编钟、西汉鎏金骑士四牛盖铜贮贝器等精品文物云集于此，巴蜀的神秘、古滇的自然、荆楚的博大、吴越的隽秀，无不呈现出天人合一、淳朴盎然、融会贯通与刚毅自强，散发着一股多元文化交织融合所形成的独特魅力，迸发出一种精神与力量碰撞下的民族激情。

作为对社会实行免费开放后博物馆筹展模式的一种探索，由北京市文物局牵头，联合全国 20 余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近 70 家文博单位联手推出的《中国记忆——5000 年文明瑰宝展》、《长江文明》等展览项目，因其定位准确、主题鲜明、策划精心、组织周密、特别是国宝文物的精美绝伦，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开展以来日均接待观众 9381 人，其中每天购票参观“瑰宝展”的观众达 5600 人。展期跨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及中秋、国庆双节，共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 70 余万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博物馆的重大展览在国家重大活动中独特的影响力和无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三、总结展览成功经验、力争打造精品展陈、带动文博事业健康发展

展览能够获得社会公众及各省市文博单位的广泛赞誉，回首展览的策划、组织、筹办、展出、宣传等工作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可为今后工作提



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抓住时机、选准主题、精心策划”是展览成功举办的基础

北京奥运会是向全世界展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绝佳时机，奥运期间需要能够全面展示中华文明成就、展示我国最高等级文物艺术品的精品陈列，以突出“人文奥运”的理念。为此，市文物局对全市博物馆的展览计划及场地情况进行了多次调查摸底，对各馆所报的展览选题进行了反复筛选，考虑到国家博物馆正在筹建的实际情况，市文物局认为，首都博物馆理应承担起在奥运期间代行国家博物馆的职能。这是奥运会给与我们的机遇，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表现出文博行业在“人文奥运”中的作用。经市文物局多次研讨，将原计划的《汉代文明大展》与《灿烂的青铜文明展》合并为一个展现中华文明的综合展，首先确定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这一主题，将展览定位在充分体现中华文明源流特点的、全国各地最具代表性的高等级文物藏品的集中展示。同时首次推出了以区域文化为主线的《长江文明展》作为其姊妹篇，既展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又体现中国大一统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的特色，并根据社会大众及接待外宾的需要，从展示手法上着力突出其不同的艺术特色。

2、充分发挥北京地缘优势，整合全国文博界藏品资源

此次展览最大的优势即在于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巨大的观众群体、2008年奥运会的地缘优势，以及新首都博物馆国际水准的软硬件设施，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珍贵藏品资源优势，两大优势的完美结合发挥出了更大的社会效益。

来自不同省市精美绝伦的文物珍品不仅让人目眩神迷，也最能唤醒那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展览的最大亮点首先是国宝荟萃，文物展品精彩纷呈，尤其是《北京文物精品展》与《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大部分展品为各省市选送的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其中很多是首次赴京亮相。其次是展览的设计、组织、策划严谨细致，

五个展览分别由多家博物馆的上百位专家、学者撰写、论证展览大纲，市文物局广泛联系各省市文化、文物厅、局共同谋划、组织、实施。为与展览配套，还分别编印了精美的图录和宣传品。开展后外省的部分专家还结合展览举办了专题讲座。

3、发挥合力，上下联动、区域联动为展览成功奠定了基础

两项特展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奥组委、北京市政府及各相关省、市、自治区政府共同主办，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展览的规格，在北京奥运期间集中展示各地文物，也为宣传展示各省区的文物资源及其文化特色提供了舞台。各省区政府从讲政治的高度和服从大局的角度，去认识此次展览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协调，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协调文物工作的难度。体现了全国对北京奥运的支持，为展览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市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重庆市文物局及各相关省、市、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协办，为展览成功提供了保障。鉴于湖南省博物馆、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有着策划大型展览的成功经验，市文物局责成首都博物馆与其联合组成筹展工作组，共同策划、共同研讨、分头落实、密切合作，在各相关文物收藏单位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共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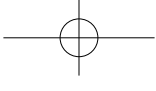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4、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确保文物安全有序及展览的顺利举办

由于上述展览需借用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珍贵文物数百件，文物等级之高、工作任务量大、周期之长、手续

之繁杂都是空前的。为确保借展文物的安全，以首都博物馆保管部为主的专业人员，制定并严格执行了一系列内容严谨的工作方案和制度，对借展文物的协商联络、借展协议的制定与修改、文物的运输与交接、入库管理与上展、展具展柜的制作验收、展览期间展厅环境监控、文物撤展送还等各个环节，都制定有严格规范的工作程序及相应的安保措施，并据此开展了大量细致周密的筹展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严把安全关，以超常的责任心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精美的文物吸引观众



5、多层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使奥运特展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得到提升

在严格保障展览质量的前提下，市文物局高度重视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宣传推广展览。早在办展之初，就开始设计宣传方案。展览开幕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并在会后设立专人负责媒体接待，积极配合、支持媒体的采访活动，各个展览的参展人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尽可能地接受媒体的采访。截止7月31日，首都博物馆已接待媒体68家约百余人次采访，发送稿件70多篇，安排馆领导接受采访5场，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新华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在内的中央级媒体13家。展览开幕后，市文物局在注重电视、电台、报刊等传统媒体宣传的同时，利用移动电视、地铁杂志、各大网站为代表的新媒体对博物馆的五大展览进行了详尽报道。考虑到北京市民的需求，利用《北京晚报》专版的形式，以“国宝特刊”为题，出版了多达16版的展览特刊对展览进行重点报道。展览接近尾声时，针对不同群体，再次在《环球时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多波次的宣传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为了与展览配套，博物馆还分别编印精美图录和宣传品，并组织专家举办专题讲座，更加激发了观众的参观热情。

奥运期间，首博的媒体宣传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体的数量，还是报导的频率，都创下了开馆以来的纪录。据不完全统计，奥运期间首都博物馆共接待媒体317家，境外媒体13家，其中，不乏从全国各地专程过来采访北京奥

运文化活动的省级媒体，如成都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内蒙古晨报》、湖南卫视等。而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级媒体也都不止一次地对展览进行实时重点的报道。五大展览还受到了港澳台乃至全世界媒体的关注，香港TVB新闻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半岛电视台、美国国家广播电台、法国《世界报》、斯洛文尼亚国家电视台等近10家境外媒体都对展览进行了相关报道，扩大了展览的影响力。

除媒体宣传外，我们还充分利用博物馆自身的网络优势开展宣传活动，收到极好的效果。为宣传奥运特展，首博网站新增栏目47个，发布文章页面约1000篇，发布视频节目27个，更新flash节目10个。奥运期间展览受到了中外观众的高度关注，奥运期间点击量总和77714283次，点击量单日最高2935636次。

6、提供可靠的文物展出环境及优质的服务，注重参展文物的安全与科学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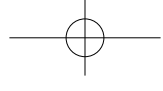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作为展览的承办单位，如此众多的国宝聚集在首博，保证参展文物安全是首要任务。由于许多国宝级文物对展览环境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对展出环境的温湿度要求极高，因此此次展览中使用的展柜普遍采用了恒温恒湿装置和严密的安保防范设施。为了保证这些文物的安全展出，首都博物馆还专门从德国进口了汉氏展柜，同时，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实时监测展出文物的温湿度情况，每天两次记录温湿度数据。保管部的工作人员每天检查巡视展柜内文物的情况；为了与展厅设计风格协调，展工部的工作人员用竹帘将干燥

剂包裹，既照顾展柜内的湿度要求，又不影响美观。来自湖南的对龙对凤纹绢面锦袍、T形帛画等丝织品见光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每天第一位观众来到展柜前，工作人员才将覆布取下，最后一位观众离开，工作人员就立即用布将其覆盖。为防止观众拥挤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首博工作人员坚持每天逐一检查展柜的牢固程度。细致周密的展厅文物保护工作确保了文物的安全展出和展览的顺利举办。

7、坚持政府主导投入、



盛况空前的5000年文明瑰宝展



支持重点项目的办展方向

自2006年以来,为迎接奥运会,市文物局即以“双两百展览展示工程”申报项目预算资金,并开始从各文博单位策划的展览项目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项目予以资金支持。同时,投入资金3400万元用于《北京文物精品展》,投资约800万元用于打造《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和《长江文明展》两项精品陈列。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市文物局严格执行国家各项财务管理及招投标规定,确保了展览资金的合理使用。

在8月8日至9月17日奥运会举办期间,首都博物馆接待国内外观众共计287154人,与2007年同期相比,上升了152.48%。其中外宾4131人,奥运宾客6133人。“十一”黄金周期间接待了国内外观众共计90107人次,10月5日接待14671人,创下了首博开馆以来单日接待的新纪录。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市民献上了一份文化盛宴,受到了中外观众的高度赞扬。

8、上下一心、全体动员维护展览现场观众秩序

由于展览期间观众流量大增,电话预约处电话爆满,现场咨询量也直线增长,为确保展厅观众及文物安全,首都博物馆紧急启动了开放区域安全保障应急预案,一线开放部门全员上岗,二线部门也抽调人员协助维持参观秩序。开放区域为了确保安全接待和优质服务,全员上岗,所有员工缩短休息时间,加大巡视疏导力度,全力以赴,保证安全接待。馆领导在大堂坐镇指挥,随时协调解决现场所出现的问题。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等局领导也亲临第一线,了解观众参观、安全保障及服务接待等情况,部分机关干部也加入到维持展厅参观秩序的行列。由于现场观众过多,为使观众在良好的环境下欣赏文物,博物馆各保障部门根据展厅客流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疏导,有序安排观众参观,并对排长队等待的观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及疏导工作。全馆职工、局领导、机关干部及驻地公安、武警相互配合,维护展厅参观秩序,这不仅确保了展览安全,更服从了“平安奥运”的大局。

9、加大讲解服务工作力度

为使观众对展出文物能有进一步的了解,首都博物馆克服人员紧张的困难,为观众安排了整点讲解服务,观众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一一观看,既欣赏到了精美的文物,又了解了这些文物的有关历史和故事,观众们普遍表示:学到了很多知识,真是受益匪浅,希望整点讲解服务能够保持下去,这样参观就会变得更加有乐趣。同时,博物馆还

完善了免费饮水、自助餐、语音导览、纪念品销售等服务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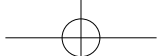
志愿者是北京奥运会的一大亮点。首博在保持原有百余位社会志愿者的基础之上,又特别甄选了上百位学生团队志愿者。此次与首博合作的是清华大学紫荆志愿者协会研究生服务团、北京城市学院旅游专业和英语专业。这些志愿讲解员无偿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投身到奥运展览义务讲解服务中来,宣传北京乃至全国的历史文化,架起沟通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桥梁。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养育了十三亿勤劳的人民,造就了今日的繁荣昌盛。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对世界是一个奇迹,那么当你揭开这个奇迹的面纱,就会看到,这一奇迹实际上是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历久弥新,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实现着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并推动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奥运会召开之时,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国家文物局、北京奥组委、各相关省市区市人民政府及全国文博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五大展览得以成功举办。五项历史文化大展,集北京优势,合全国之力,展示崛起的大国之风范,弘扬奥林匹克之精神。全国文博界同仁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五千年”的承诺,为奥运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全国文博界通过相互间的密切协作,共同揭开了以大策划、大投入、大协调、大宣传为突出特点的大展览时代的序幕。

回顾以上展览,从选题、策划到布展施工,直至每日接待万人以上的观众,每个环节都是在探索中走过的:如此大规模的调集文物,如此多的参展单位联合作战,前所未有的观众流量,奥运期间和黄金周的安全压力等等,都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但经此一役,开阔了我们的办展思路,锻炼了队伍,为今后联合举办文物精品大展、特展积累了实战经验。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文化文物市场必将空前活跃。200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为纪念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我市文博界在借鉴2008年奥运展览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适时推出更多的精品文物陈列,其中《元青花艺术展》、《见证历史辉煌——考古与发现》、《多彩中华展》、《早期中国》等大型展览正在积极酝酿和筹备之中,相信会带给广大观众更多的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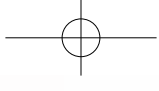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研究馆员)



博物馆教育实践中的 「馆校合作」模式初探

黄燕

在 2007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届北京校外教育论坛上，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冯光生副馆长介绍了该馆与北京二中开展的“馆校合作”教学活动，将之称为“博物馆与学校在相互需求基础上形成的特色教育模式”^①，媒体也多称之为新型的教育模式。根据研究显示，1895 年，由英国的托马斯·霍斯福 (Thomas Horsfall) 先生与曼切斯特艺廊委员会共同推动下，将学校教育法加以修正，允许学生前往博物馆参观，并计入有效的课时，这一创举正式开启了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关系^②。1960 年在美国的 4000 多所博物馆中，约 90% 针对学校提供服务；1975 年美国文化教育合作机构的研究报告指出：90% 的博物馆提供学校教育活动，70% 的博物馆的学校教育活动为例行活动；1990 年初，学者的研究指出：90% 的博物馆与当地学区有一定程度的关系；1992 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卓越与平等》(Excellence and Equity) 一书指出：近半数的博物



馆提供到校教学、教材外借与导览服务，而中小小学生人数两倍于博物馆其他服务对象。同年的美国博物馆协会年会中，更明确指出“博物馆应加强对各级学校的服务，以体认博物馆教育孩童学生的责任，并促进博物馆与学校间良好的伙伴关系”，博物馆与学校之间形成了制度化的共生关系^③。可见“馆校合作”的模式在国外博物馆界已行之有年，但在我国尚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博物馆教学成果的编撰往往局限于活动案例的总结，而忽视了对项目进行理论性的解读，缺乏在整理素材的基础上对项目的统筹管理，及对参与者的反馈信息、持续性的保障条件、工作人员的能力要求等问题的思考。因此，梳理“馆校合作”模式的概念和类型，分析一些博物馆在这方面的尝试，对于促进该类项目的开展和逐步完善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馆校合作”模式概念与实施目标

博物馆与学校的伙伴关系渊源已久，从博物馆开始发展其公共教育职能之初，青少年学生就是博物馆最关注的群体。除了常规的展览项目，博物馆还举办各种科普讲座、夏令营、知识竞赛等为他们提供服务。博物馆与学校具有开展合作的良好基础。本文所探讨的“馆校合作”，是指博物馆在深入研究馆内资源与学校教育的结合点基础上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而与学校共同制定长期互动的教学活动计划，是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结合的新模式。在理想的馆校合作关系中，博物馆教育不再单纯地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而是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与学校共同推动教育计划的实施。

“馆校合作”的目标是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博物馆和学校的双赢。通过开展“馆校合作”模式教学，博物馆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得到自我提升，实现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良性发展。同时，“馆校合作”为学校实施课程改革、编写校本教材提供了珍贵的资源，为学生开展校外学习、提升综合素养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二、“馆校合作”模式的主要类型和发展趋势

台湾地区学者刘婉珍将“馆校合作”的成熟

形态按主导方的不同分为了六种模式：即提供者与接受者模式、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学校主导的互动模式、社区博物馆学校、博物馆附属学校、中介者互动模式^④，我国博物馆目前开展的“馆校合作”项目主要表现出其中前两种模式的特征。

1、提供者与接受者模式

在此模式中，由博物馆单方面规划设计活动供学校师生使用，参加博物馆教育活动与课程的学校师生完全没有参与规划过程，只是被动的接受与使用，与博物馆并无真正双向互动沟通^⑤。此类活动在我国很多博物馆中广泛开展，如：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探索角”、首都博物馆的“七彩坊”、“博物馆探秘”项目、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模拟考古”项目、上海博物馆“艺术作坊”项目等，皆属此类。

此类教育项目往往以本馆的藏品优势为基础开发，内容涉及到自然、历史、艺术等领域，并且按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感知能力进行相应的学习引导，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这种模式中，博物馆与学校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接触，而是直接与学校的核心群体学生对话，让学生在校外接受文化教育，对学校教育起到了补充作用。但是，实施这种模式时，参与者的到来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双方没有形成一种稳定和规律的合作关系，如果活动内容能与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生联系，则对学生来说也许更有意义。因此，虽然这种单向的合作方式仍是目前我国博物馆开展青少年教育时最普遍的模式，但各博物馆也已开始进行一些与学校发生实质性合作的探索。

2、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

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指博物馆主动邀请学校教师共同参与活动规划，在真正的双向沟通交流后，学校与博物馆成为成败与共的成长伙伴。博物馆为最初的主导者，但第二阶段则是博物馆与学校的双向沟通互动，共同规划推展教育^⑥。

案例一：“中学生历史教学实践课”项目

2004年3月，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与北京市教育学院丰台分院联合推出了“中学生历史教学实践课”项目，该项目配合学校开展实践教学的需要，以汉代的历史文化为主线进行历史教学活动，至2004年10月底，共接待了丰台区16所中学3000多名初中学生参与，至今仍是我馆的教育品牌项目之一。

表一：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中学生历史教学实践课”主要内容

步骤	活动内容及目的	准备资源	教授者
教学准备	与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进行沟通，介绍项目设想，取得校方的支持，结合馆校双方实际情况确立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计划书 2、教案	
	编写活动教案。		
博物馆教学	发放《参观手册》，其内容包括汉代的历史概况、知识问卷和思考问题等，使学生在教学前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博物馆参观手册	校方教师
	参观广阳王地宫复原及出土文物展，通过考古遗址和文物来讲述汉代的社 会状况。	博物馆基本陈列	馆方社教人员
	历史短剧演出。选取两汉历史典故改编成小剧本，提前将剧本发给学生排 练，活动当日演出。 通过亲身体验，对汉代的历史风貌建立起感性而直观的认识。	1、剧本 2、演出服装、道具	馆方社教人员 校方教师
	书写竹简。通过多媒体演示、讲授、互动操作等方式，了解书写工具的变 迁与进步。	1、幻灯片 2、竹简、笔墨、削刀	馆方社教人员
	投壶礼仪。了解汉代服饰、汉代的坐卧家具等方面的知识。	1、投壶用具 2、漆榻	馆方社教人员
	模拟考古。掌握考古学基本知识，识别历代典型文物，增加文物知识，培 养文物保护意识。	1、考古工具 2、仿制文物	馆方社教人员
延续环节	组织活动摄影作品、征文评比活动。提高师生的参与积极性，了解他们对 活动的感受和反馈意见，帮助博物馆工作人员改进项目设计。		
	馆校双方交流会。活动告一段落后及时与学校行政决策人员及历史教师进 行沟通，汇报项目成效，了解教师建议，推动合作计划的持续进行。		

表一所示的教学活动是博物馆主动发展馆校关系、整合现有资源并开发新项目的一次教学实践过程。根据参与教师和学生的反馈，该活动在为历史教学扩展校外平台、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健康情绪以及个性化发展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活动结束后丰台二中等中小学将大葆台博物馆定为校外教育基地，博物馆与学校的关系得到增进，发展长期的合作关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参与教学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为适应新的教学特点，积极丰富自身知识储备，更新教学观念，研究新的教学模式，实现了自我学习和提升的过程^⑦。

案例二：“走进先农坛”学科综合研讨活动
2005年1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和北京育才学校小学部合作开展了“走进先农坛”主题研讨活动。该活动是博物馆与学校在已有多次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如何将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更加紧密结合而进行的尝试，目的是创办出具有丰富知识性和延续性的博物馆社教活动项目。活动过程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师相互配合，将先农坛的文化资源纳入到教学之中，学生们根据教师的指导和博物馆的实物资源，完成了多学科的课堂学习和校外实践，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⑧。

表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走进先农坛学科综合研讨活动”内容

步骤	活动内容及目的	准备资源	教授者
教学准备	馆方社教人员为校方教师开设先农坛历史文化讲座并进行座谈，让教师了解先农坛的历史及文化内涵，开阔教学思路和视野，制定教学内容。	1、讲稿 2、多媒体设备	馆方社教人员
博物馆教学	学校师生到博物馆参观，寻找相应的教学素材。随后在博物馆内现场教学，如斗拱拼装、素描写生等，完成美术、科学等科目的课堂学习内容。	1、斗拱模型 2、古建筑附属雕刻作品	馆方社教人员 校方教师



博物馆教育实践中的“馆校合作”模式初探

步骤	活动内容及目的	准备资源	教授者
学校教学	1、劳技课中，教师介绍先农坛的文化背景，引导学生以泥塑和纸模的形式来重现先农坛祭祀活动的场面和人物。 2、社会课中，教师向学生介绍先农坛的文化、建筑及文物保护的知识，带领学生到博物馆拍摄照片，制作演示文稿、电子小报及社会科学调查表等。以此将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引入课堂教学中，丰富教学内容，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实践调查的能力。	1、泥塑材料 2、纸模材料 3、资料图片	校方教师
延续环节	1、2005 年 6 月，馆校双方在博物馆举行市级现场研讨展示活动，由学生讲述收获、展示作品，展示校本课程建设的初步成果 ^⑨ 。 2、2008 年 6 月，馆校双方在博物馆内共同召开学科综合研讨汇报展示会，开设公开课演示学科综合情况；学生展示作品，汇报活动感受。将活动的成效向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发布 ^⑩ 。		

表二所示的教学过程可以看出，“馆校合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博物馆、学校双方紧密沟通配合，共同推动了教学计划的实施。博物馆社教人员和学校教师在活动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引导角色。而学校教师的参与，不但保证了教学内容与学校教育的充分结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教育规律和教学方法上的薄弱。“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的要素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卓有成效。

3、“馆校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

在“馆校合作”模式的类型中，“提供者”与“接受者”模式虽然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是我国博物馆参与学校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因其形式上具有一定的被动性，难以与学校教育进行真正深入的互动与交流。而“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通过博物馆与学校的密切配合，保证了博物馆教育资源的优化使用，并真正融入学校教育，在教学过程中馆校双方都收益良多。在当前课程改革创新兴起，社会资源与学校资源结合呼声高涨的背景下，“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正逐渐成为“馆校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除前文中已提及的教学活动外，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生物课开在自然博物馆”^⑪、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开展的馆校合作教学活动^⑫等都是博物馆主导的“馆校合作”模式的成功典范。

三、关于“馆校合作”模式的进一步探讨

“馆校合作”模式在博物馆教育实践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下面以“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为中心，就“馆校合作”模式实行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1、博物馆教案的编写

博物馆主导的“馆校合作”模式中，博物馆编写的教案包括教学者、教学目标、教学主题、教学时间、教学地点、教学内容、学生人数、安全制度等内容。其中教学内容是教案的主要元素，编写时有两点值得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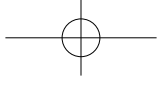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1）教案的编写应以博物馆的资源为主要素材，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的优势。“博物馆为观众服务，首先要考虑博物馆教育的特征之一，是以真实物品为活动基础的文化机构，不能被视为学校教育的翻版或教科书的图解，而应当被看作人类知识的一种独特传播方式。”^⑬在“馆校合作”教学的过程中，青少年不仅是在实践课堂知识，也是在博物馆这一文明荟萃的场所之中获得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愉悦，提高综合素养，这也更接近于博物馆发展教育职能的初衷。

（2）活动项目的设计符合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特点，注意活动的互动性（或参与性）和趣味性。以“中学生历史实践课”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历史短剧演出”环节为例，选取中学历史课本中出现过的人和事为题材编写剧本，台词风趣、内容浅显，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排练、表演，增加了学生对历史人物的感性认识和对历史探究的兴趣。

可见，知识性、互动性和趣味性，是博物馆教案编写时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2、博物馆对学校教师的培训

博物馆主导的“馆校合作”模式中，教育实践的成功，离不开学校教师的参与。教师参与到教学计划中，一方面能弥补博物馆方工作人员在教育方法上的薄弱，同时保障了教学活动与学校教育的关联性，更能体现“馆校合作”的内涵。因此，博物馆在主导并策划“馆校合作”教学时，有必要将对教师的培训纳入计划之中。博物馆进行教师培训的方式，除了在每次教学活动前熟悉



展览、开设相关讲座等即时的方式外,为学校教师定期举办研习会则是一种更具远见卓识的做法。在这方面,上海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上海博物馆于2005年起在博物馆创办“教师研习会”^①,以系列讲座、研讨、参观、教学实践、专题文化考察等方式,向教师提供了解和学习文博知识的机会,并为教师利用博物馆资源创造了条件。研习会的目的在于使教育工作者更好地了解博物馆,加强学校与博物馆的沟通,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2005年至2007年,教师们根据研习所得创作出以文博资源为基础的学业成果,如“中国古代钱币的拓展型学习”、“《商周文明》教案设计”、“历史寻踪之明清家具”、“中国古代书法欣赏——互动教育活动设计”、“中国古代绘画校本课程”、“博物馆资源和二期课改语文学科的整合”等。“教师研习会”加强了教师文博知识的积淀,教师的研习心得毋庸置疑也将渗透到教学过程之中。同时,通过研习活动与教师的频繁接触,使得博物馆能准确及时地了解学校教育的动态和需求,调整自己的教育规划与之契合。

此外,台湾地区的博物馆界在教师研习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经验,可供同行借鉴。举办教师研习会,为“博物馆主导的互动模式”教育实践储备了人才资源,拓宽了教育信息通道,值得推广。

3、“馆校合作”教学保障

作为延伸环节,教学评价和宣传推广为“馆校合作”教学持续进行提供了保障,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策划整个项目时不可忽视的一节。

(1)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指以客观资料为基础,对学生的掌握程度和心理结构的形成情况与教学目标的差异进行判断,同时分析教学成效,对今后的教学工作提出明确的改进措施。在博物馆主导的“馆校合作”模式教育实践中,教学评价的调查对象包括参与活动的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评价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教学征文、与教师座谈交流等,通过这些形式,收集参与者的反馈信息,帮助博物馆方完善教学设计、教学过程、配套措施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改进教学计划。

(2) 宣传推广

博物馆主导的“馆校合作”模式教育实践的宣传推广按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类:

①面向教育界人士。通过举办教学成果展览、教学汇报会、教学观摩会等方式,将合作教学的成果反馈给教育界的行政管理部门、校方主管等,为“馆校合作”教学获得行政方的理解和支持,

对于教学活动的推广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②面向社会公众。通过新闻报道等方式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建立博物馆的社会公益形象,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都将有所裨益。

教育评价和宣传推广活动,将会促进“馆校合作”的互动,在博物馆与学校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深化博物馆的教育实践。

结 语

“馆校合作”模式有助于博物馆与学校建立稳固而有意义的互动关系,博物馆主导的“馆校合作”教育实践正逐渐成为博物馆教育的一种潮流。根据各个博物馆的特质以及学校的需求,积极探索、策划符合本馆实际情况的“馆校合作”模式,是优化博物馆教育职能、实现博物馆互动式教育理念的有效手段之一。

①苏婷:《校外场馆如何参与新课改》,《中国教育报》2008年2月29日。

②王启祥:《博物馆教育的演进与研究》,《科技博物》第4卷第4期,2000年,第5-19页。

③廖敦如:《学校与社区博物馆合作之统整课程设计与实施》,《台东大学教育学报》第15卷第1期,2004年,第211-244页。

④、⑤、⑥刘婉珍:《美术馆教育理念与实务》,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1月,第204-222页。

⑦苏艳:《〈中学历史〉实践课呼唤讲解员角色更新》,《北京文博》2005年第2期。

⑧张蓉华、张敏:《博物馆文化资源与学校教育资源相结合的新探索》,《北京文博》2005年第3期。

⑨陈巍:《怎样展示效果好》,来源:课程网, www.kecheng.net。(作者为北京育才学校副校长)。

⑩《古建馆与育才学校共同召开〈走进先农坛〉学科综合研讨汇报展示会》,来源:北京文博网站“文博信息”栏目, www.bjww.gov.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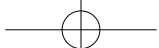
⑪杨景成:《生物课开在自然博物馆——博物馆校外教育新模式探索》,在2007年第二届北京校外教育论坛上的演讲。来源:北京校外教育网, www.bjxwjy.org.cn。

⑫崔波:《世界艺术馆启动馆校合作教学活动》,《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23日。

⑬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7页。

⑭上海博物馆网站, www.shanghaimuseum.net。

(作者为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助理馆员)



丰台西客站南广场

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西客站南广场墓葬区位于北京市火车西站南广场东侧（图一）。地理坐标为北纬 $39^{\circ}53'28''$ ，东经 $116^{\circ}19'04''$ ，海拔 45 米。为配合西客站南广场地下车库及商业工程建设，做好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2007 年 10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工程占地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明清时期墓葬 16 座（图二），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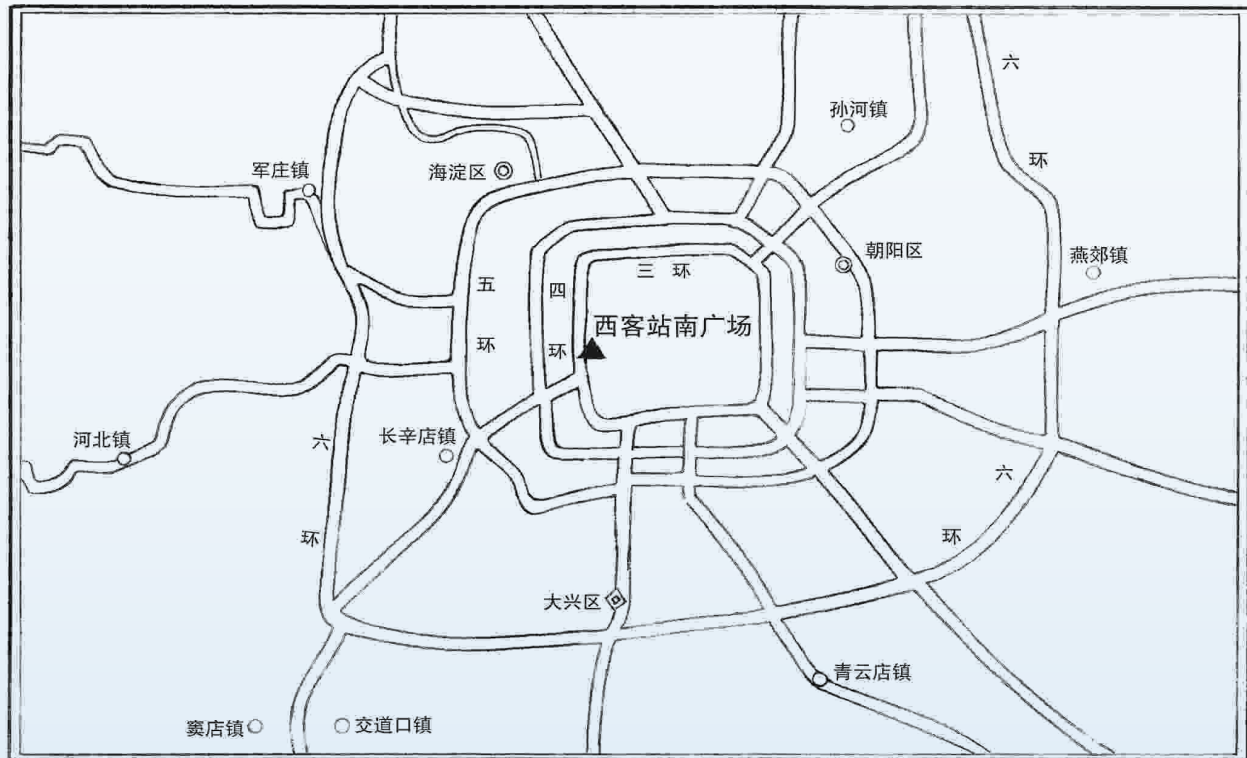
一、墓葬形制

本次发掘清理的 16 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圜墓，按时代分为明代墓葬、清代墓葬两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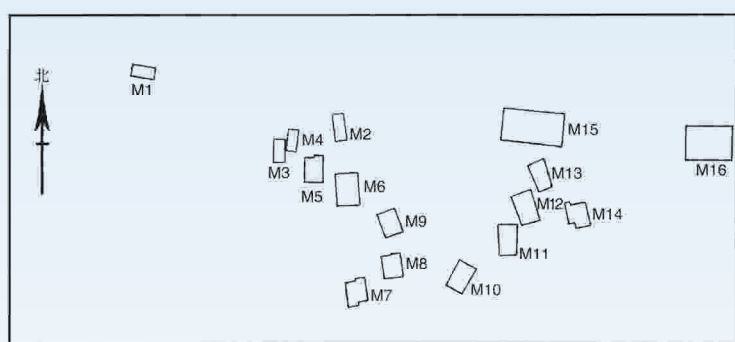
（一）明代墓葬 2 座，编号分别为 M15、

M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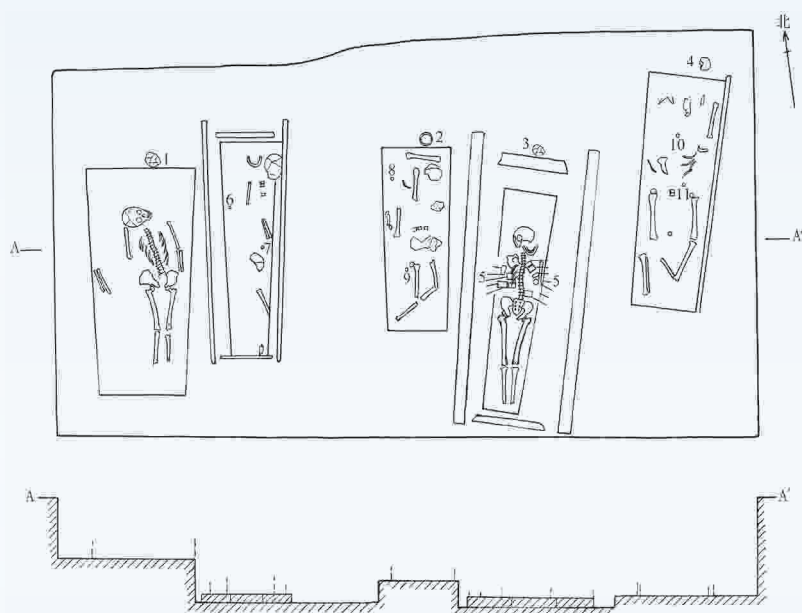
M15 位于发掘区中北部，竖穴土圜墓，近长方形，南北向，方向 6° 。墓口距地表深 0.8 米，墓底距地表深 1.7 米。东西长 5.7 米，南北宽 3 ~ 3.75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墓内置五棺，葬具为木棺及内外椁。五棺东西排列，由西向东叙述：西棺（1），棺木已朽，长 1.9 米，宽 0.7 ~ 0.9 米，残高 0.1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西棺（2），一棺一椁。棺木已腐朽，残留棺痕长 1.73 米，宽 0.3 ~ 0.45 米，残高 0.08 米；外椁已腐朽，椁长 1.98 米，宽 0.54 ~ 0.7 米，高 0.66 米，厚 0.04 ~ 0.08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西，仰身直肢。



图一 西客站南广场墓葬区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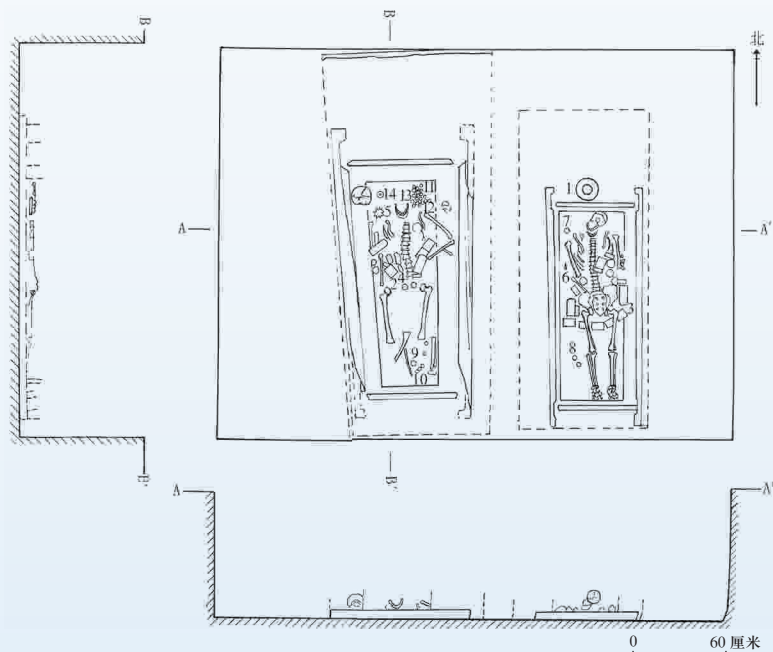


图二 西客站南广场墓葬分布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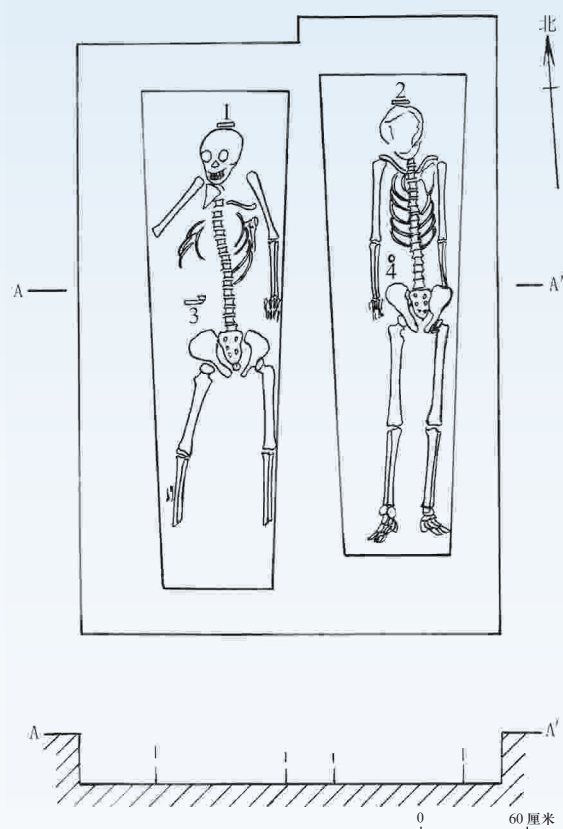
图三 M15 平、剖面图

1、2. 釉陶罐 3、4. 瓷罐 5. 玉带 6~11. 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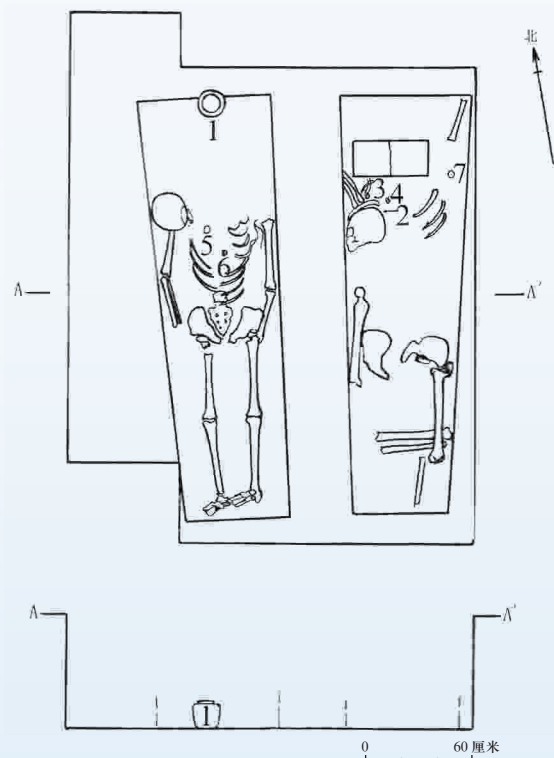
图四 M16 平、剖面图

1. 瓷罐 2、3. 玉带 4. 玉带钩 5. 玉饰 6. 木饰 7~14. 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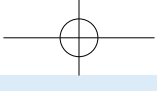
图五 M5 平、剖面图

1、2. 银扁方 3. 铜烟斗 4. 铜钱



图六 M14 平、剖面图

1. 瓷罐 2. 银簪 3、4. 银耳环 5~7. 铜钱



中棺棺木已腐朽,长1.5米,宽0.48~0.58米,高0.18米,厚0.05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东棺(1),一棺一椁。棺木已腐朽,残留棺痕长1.85米,宽0.38米,残高0.05米;外椁已腐朽,椁长2.38米,宽0.96~1.05米,高0.76米,厚0.06~0.08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向北,面向西,仰身直肢。东棺(2),棺木长2米,宽0.56~0.68米,高0.32米,厚0.04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陶罐、瓷罐、玉带、铜钱等(图三)。

M16 位于发掘区的东端,西邻M15。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方向360°。墓口距地表深1.3米,基底距地表深2.32米。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双棺合葬,东西并排,头北足南,仰身直肢。葬具为木棺及内外椁。西棺外椁已腐朽,残留椁痕迹长3.15米,宽1.1~1.38米,残高0.8米;西棺内椁长2.4米,宽0.9~1.16米,残高0.8米。椁盖残损严重,残厚0.18~0.2米,侧板残厚0.06~0.08米,挡板残厚0.04~0.05米。底板残厚0.07米。西棺已腐朽,残留棺痕迹长1.7米,宽0.5~0.57米,残高0.06米。东棺外椁已腐朽,残留椁痕迹长2.6米,宽1.08~1.1米,残高0.62米。东棺内椁长1.94米,宽0.76~0.8米,残高0.62米,椁盖残厚0.1米,侧板残厚0.04~0.05米,挡板残厚0.03~0.04米,底板残厚0.04米。东棺已腐朽,残留棺痕迹长1.57米,宽0.5~0.52米。东西两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西棺为男性,东棺为女性。内填花土,土质较松。随葬品有青花瓷罐、玉带、玉带钩、玉饰、木饰、铜钱等(图四)。

(二) 清代墓葬 14座,编号分别为M1~M14。

依据内葬人数多寡,可分为单人葬墓、双人合葬墓及迁葬墓。其中,单人葬墓3座,编号分别为M1、M2、M4。双人合葬墓4座,编号分别为M5~M7、M14。迁葬墓7座,编号分别为M3、M8~M13。以下择其典型加以介绍。

M5 位于发掘区中西部,西邻M4,东邻M6。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方向4°。墓口距地表深0.6米,基底距地表深0.8米。南北长2.4~2.5米,宽1.7米。内填花土,土质疏松。双人合葬,棺木已朽;东棺痕长1.94米,宽0.44~0.6米;西棺痕长2.02米,宽0.44~0.6米。骨架保存较差,头北足南,面向上,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银扁方、铜烟斗、铜钱等(图五)。

M14 位于发掘区中东部,竖穴土坑墓,南北

向,方向350°。墓口距地表深0.7米,基底距地表深1.2米。南北长1.98~2.1米,东西宽1.8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墓葬内置双棺,已朽,东棺痕长1.84米,宽0.44~0.58米;西棺痕长1.88米,宽0.48~0.6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随葬品有瓷罐、银簪、银耳环、铜簪、铜钱等(图六)。

二、随葬器物

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银器、玉器、木器、铜器等,分别介绍如下。

1. 陶器 4件,均为罐,分为二型。

A型 2件。泥质灰陶。侈口,折沿,尖唇,束颈,溜肩,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外敞,平底。

M8:1,口径10.6厘米,底径9.2厘米,高12.8厘米(图七,1)。M8:2,口径11.6厘米,底径8.8厘米,高12.8厘米(图七,2)。

B型 2件。釉陶罐。侈口,圆唇,束颈,斜肩,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平底。

M15:1,口沿至上腹部施酱黄釉,釉色不均,部分已剥落,局部有流釉,下腹部及底部未施釉。口径9.8厘米,底径6.7厘米,高11厘米(图七,3)。M15:2,口沿至上腹部施浅绿釉,下腹部及底部未施釉。口径10厘米,底径7.6厘米,高12.1厘米(图七,4)。

2. 瓷器 7件,均为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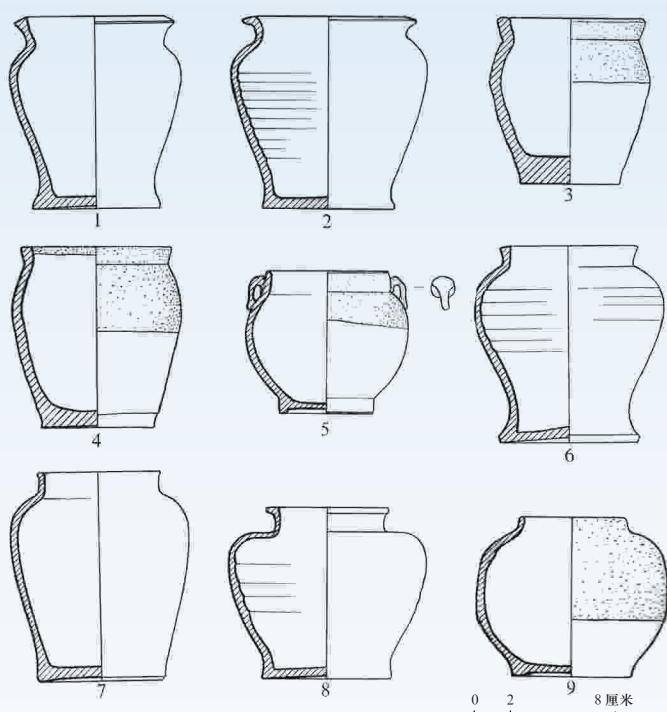
M2:1,敛口,平沿,方圆唇,微束颈,溜肩,颈及肩部左右两侧置双耳,圆鼓腹,圈足。外壁颈部及肩部施酱釉,口沿、腹部及底部未施釉;内壁施酱釉。口径8.3厘米,底径6.2厘米,高9.5厘米(图七,5)。

M9:1,直口,沿微折,尖唇,束颈,圆肩,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外展,平底。体施薄层浅绿釉,釉不及底,部分已剥落。口径9.2厘米,底径9.3厘米,高13.1厘米(图七,6)。

M11:1,直口,平沿,方圆唇,直颈微束,溜肩,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平底。通体施白釉,泛青,口沿施酱釉。口径8.1厘米,底径8.6厘米,高14厘米(图七,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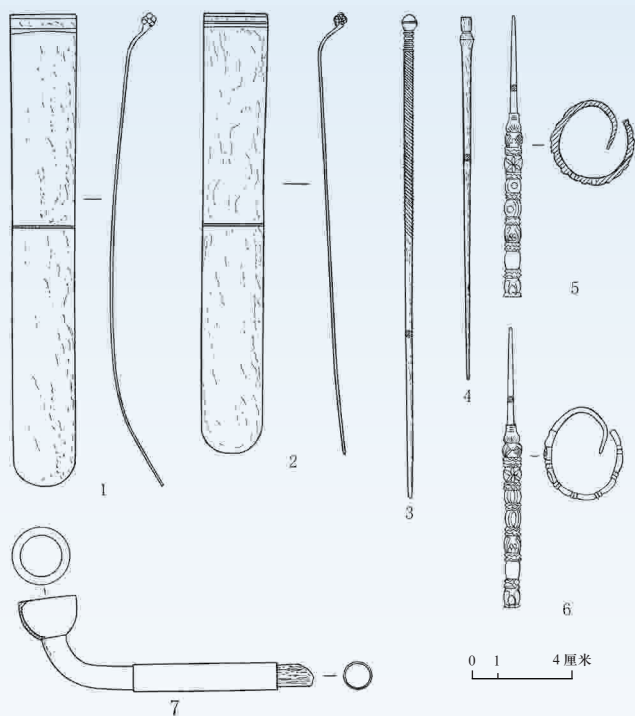
M14:1,侈口,平沿,方圆唇,微束颈,平肩,上腹外鼓,下腹弧收外敞,平底。通体施薄层浅绿色釉,部分已剥落。口径8.1厘米,底径8.7厘米,高11.4厘米(图七,8)。

M15:3,敛口,斜颈,圆肩,圆鼓腹,圈足,平底。颈部至上腹部施黑釉,口沿、下腹部及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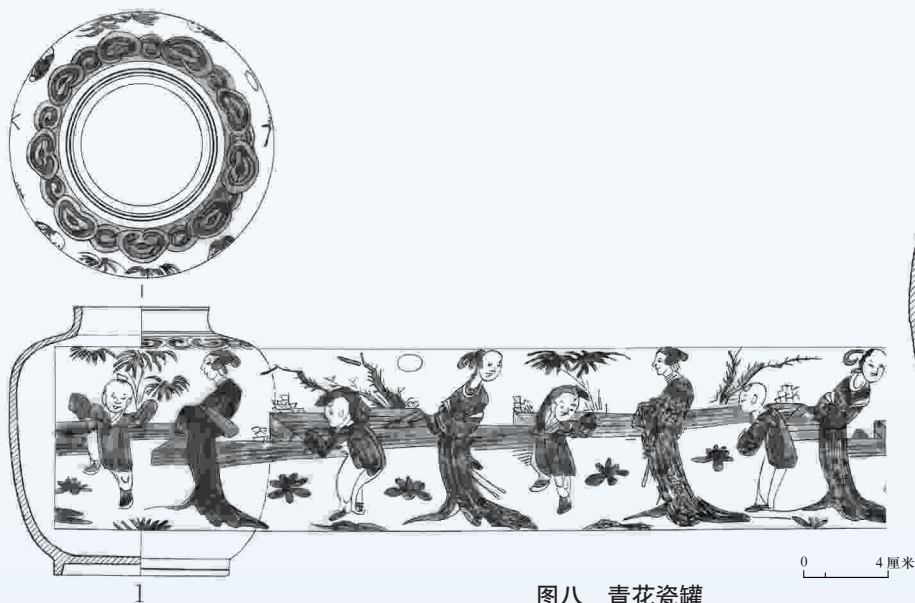
图七 陶、瓷罐

1、2. 陶罐 (M8:1、M8:2) 3、4. 釉陶罐 (M15:1、M15:2)
5-9. 瓷罐 (M2:1、M9:1、M11:1、M14:1、M15:3)



图九 银、铜器

1、2. 银扁方 (M5:1、M5:2) 3、4. 银簪 (M12:1、M14:2)
5、6. 银耳环 (M14:3、M14:4) 7. 铜烟斗 (M5:3)



图八 青花瓷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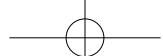
1.M15:4 2.M16:1

部未施釉。口径 7.2 厘米，底径 8 厘米，高 10.6 厘米 (图七，9)。

M15:4, 青花瓷罐。通体施白釉，泛青。侈口，方圆唇，微束颈，圆肩，圆弧腹，圈足。颈部至肩部为一组云朵图案，腹部由上、中、下三组图案组成。上为一组院落、树木；中间为一组母子图案，少儿正在习武，母亲一旁观看：①少儿头向正面，双臂张开，右腿抬起，母亲双臂抱拢，侧面向左，面对少儿；②少儿侧面向左，屈身，右臂举过头顶，

左臂伸开，双腿微屈，母亲双臂抱拢，正面微向右；③少儿头向正面，右臂举过头顶，左臂伸开，双腿直立，母亲双臂抱拢，侧面向左，面对少儿；④少儿侧面向左，屈身，双臂合拢，双腿合并，母亲双臂抱拢，正面微向右。下为一组花草、土堆、石等图案。无盖。口径 6.15 厘米，腹径 12.25 厘米，底径 8 厘米，高 12.4 厘米 (图八，1)。

M16:1, 青花瓷罐。通体施白釉，泛青。直口，平沿，方圆唇，直颈，圆肩，圆鼓腹，圈足。



颈部饰云雷纹,器身饰凤凰和缠枝花卉纹,无盖。口径 7.6 厘米,底径 9.6 厘米,高 18.6 厘米(图八,2)。

3. 银器 6 件,有扁方、簪、耳环。

银扁方 2 件。簪首卷曲,簪体扁平,末端为圆弧状。M5:1,长 16.5 厘米(图九,1)。M5:2,长 15.4 厘米(图九,2)。

银簪 2 件。M12:1,簪首为耳挖,颈部稍细,有五道凹弦纹。簪体细直,呈圆锥形,上部有数道斜凸弦纹。长 17 厘米(图九,3)。M14:2,簪首残,下有一道凸棱,簪体为圆锥形。长 12.8 厘米(图九:4)。

银耳环 2 件。通体造型呈“C”形,环身分节,上浮雕以花卉、圆圈等图案,一端呈尖锐状,一端作扁圆形。M14:3,长 9.85 厘米(图九,5)。M14:4,长 9.85 厘米(图九,6)。

4. 玉器 有玉带、玉带钩、玉饰。

玉带 1 副。M15:5,色呈青白,玉质柔和细腻,温润晶莹,抛光润滑平整,有几块带有黄色的沁斑。由十九块带板组成,其中长方形八块,长 6.4 ~ 7 厘米,宽 5.6 厘米;长条形四块,宽 1.9 厘米,两块长 5.9 厘米,两块长 5.4 厘米;桃形五块,高 5.25 厘米,宽 5.5 厘米;圭形獭尾两块,长 9 厘米,宽 5.85 厘米。采用减地透雕方法雕琢出麒麟纹样,留有边框。麒麟作奔跑状,头部高高昂起,双目圆睁,两须弯曲,角立于脑后;体为鹿身,鱼鳞皮,带有双翅;四肢健硕,马蹄;牛尾上扬。在麒麟主体纹样之外还雕有云纹。背面带有对钻的 2 ~ 5 个穿鼻,供穿丝以连缀于丝带之上。麒麟,亦作“麒麟”,俗称“四不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神的坐骑,与龙、凤、龟共称为“四灵”。从其外部形状上看,鹿身,牛尾,马蹄(史籍中有说为“狼蹄”),鱼鳞皮,一角,角端有肉,黄色。被称为圣兽王,是吉祥神兽,主太平、长寿^①。整幅玉带制作工艺精湛,极富动感(图一〇)。

玉带 2 副。M16:2,色呈青白。由二十块带板组成,其中长方形八块,长 5.85 ~ 8.45 厘米,宽 4.8 ~ 5.1 厘米;长条形四块,宽 1.75 厘米,两块长 5.1 厘米,两块长 4.95 厘米;桃形六块,高 4.2 厘米,宽 4.6 厘米;圭形獭尾两块,长 14.8 厘米,宽 5.05 厘米。采用减地透雕方法雕琢出云龙纹样,留有边框。龙首昂起,张口瞪目,两角呈“八”字形,立于脑后;身躯修长,弯曲转折,在云中盘旋游动;龙爪飞舞,刚劲有力。龙的神态形象生动,威武凶猛。在云龙主体纹样之外还雕有鸟、花朵等纹样。背面带有对钻的 2 ~ 5 个穿

鼻,供穿丝以连缀于丝带之上。龙纹是中国古代玉带饰使用较多的装饰纹样。整副玉带刻画生动,纹饰层次丰富(图一一)。M16:3,色呈青白,局部有土蚀之后留下的黄色斑。由二十块带板组成,其中长方形八块,长 6.6 ~ 7.35 厘米,宽 5.05 厘米;长条形四块,长 5.05 厘米,两块宽 2.3 厘米,两块宽 2.05 厘米;桃形六块,高 4.7 厘米,宽 5.2 厘米;圭形獭尾两块,长 14.45 厘米,宽 5.1 厘米。采用减地浅浮雕方法雕琢出松、鹿、灵芝、云、山、花朵等纹样,留有边框。一棵松树下几只鹿或立或卧,或低头或昂首,有的嘴里衔着灵芝,与云、山、花朵浑然一体,相映成趣。背面带有对钻的 2 ~ 5 个穿鼻,供穿丝以连缀于丝带之上。松树象征着君子品行高洁。鹿本身便是兽中驯良者,有力、善跑,大有益于人;在民间,鹿还以长寿仙兽的形象出现,在多种场合用以表达祝寿、祈寿的主题。此外,鹿还与“禄”谐音,象征福气、奉禄^②。灵芝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一种仙境中的植物,被赋予仙物的色彩,象征长生长寿^③。整副玉带图案线条婉转流畅,松、鹿、灵芝构成一画,寓意深刻(图一二)。

玉带钩 1 套。M16:4,钩身透雕成展翅飞舞的蝙蝠,钩首分别作花朵形环及螭形首,环首相扣。长 5.35 厘米,最大宽 2.2 厘米,厚 0.5 厘米(图一三,2)。

玉饰 1 件。M16:5,整体呈花朵形,正面中间六个圆形凸钮组成花蕊,外有一周放射状椭圆形花纹,周边八组桃形体内饰卷云纹。背面正中有两个椭圆形孔,孔外为一圆环,上饰螺旋纹,周边八组桃形体内饰卷云纹。最大径 6.9 厘米,厚 0.85 厘米(图一三,1)。

5. 木饰 1 件。M16:6,残碎严重,无法复原。

6. 铜烟斗 1 件。M5:3,整体为铜质,由烟锅、烟杆组成。烟锅平面呈圆形,烟杆为圆柱状,中间为通烟的孔道。烟杆分为两段,之间用藤木相连接,藤木大部分已朽。烟嘴缺失。烟锅直径 2.05 厘米,烟杆残长 8.5 厘米,通长 10.7 厘米(图九,7)。

7. 铜钱 有崇宁通宝、崇宁重宝、洪武通宝、万历通宝、天启通宝、崇祯通宝、康熙通宝、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光绪通宝、同治重宝、光绪重宝等。以下以 M15 及其它墓葬出土铜钱为例加以介绍。

崇宁重宝 2 枚。标本 M15:6,大平钱,圆形,方穿,窄郭,钱面文为“崇宁重宝”,上下右左对读。直径 3.57 厘米,穿径 0.75 厘米,厚 0.15 厘米。

洪武通宝 4 枚。标本 M15:7,大平钱,圆形,



图一〇 M15 出土玉带 (M15: 5)

方穿，宽郭，钱面文为“洪武通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右有一字，字迹不清。直径 3.05 厘米，穿径 0.62 厘米，厚 0.17 厘米。

万历通宝 13 枚。标本 M15: 8，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万历通宝”，上下右左对读。直径 2.65 厘米，穿径 0.49 厘米，厚 0.1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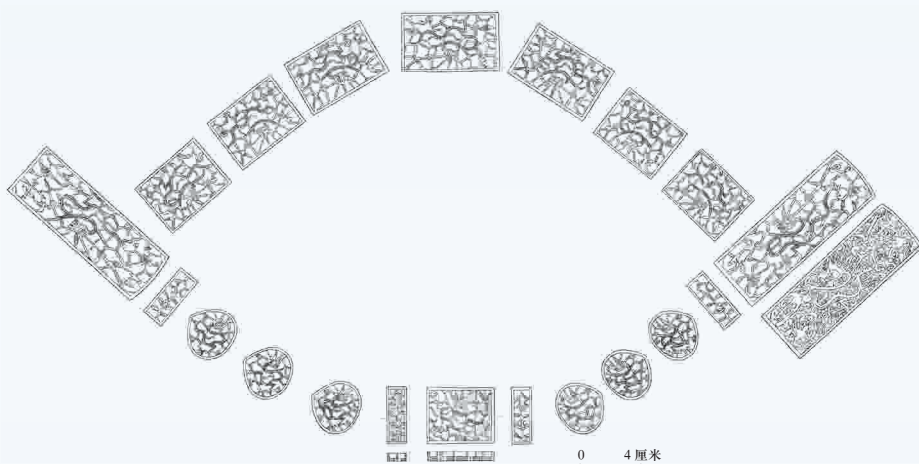
天启通宝 12 枚。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天启通宝”，上下右左对读。标本 M15: 9，背穿上为一“户”字。直径 2.63 厘米，穿径 0.55 厘米，厚 0.12 厘米。标本 M15: 10，背穿上为一“工”字。直径 2.63

厘米，穿径 0.49 厘米，厚 0.14 厘米。

崇祯通宝 11 枚。标本 M15: 11，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崇祯通宝”，上下右左对读。直径 2.68 厘米，穿径 0.55 厘米，厚 0.1 厘米。

康熙通宝 2 枚。标本 M2: 2，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康熙通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73 厘米，穿径 0.64 厘米，厚 0.13 厘米。

乾隆通宝 4 枚。标本 M1: 2，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乾隆通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54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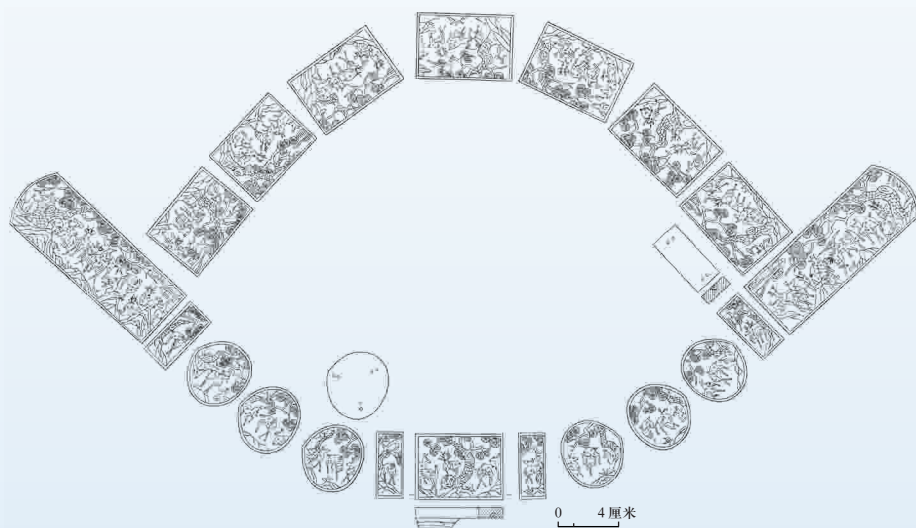
图一一 M16 出土玉带 (M16: 2)

穿径 0.57 厘米，厚 0.12 厘米。

道光通宝 4 枚。标本 M5: 4，残，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道光通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55 厘米，穿径 0.48 厘米，厚 0.18 厘米。

咸丰通宝 1 枚。M12: 4，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咸丰通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3 厘米，穿径 0.51 厘米，厚 0.1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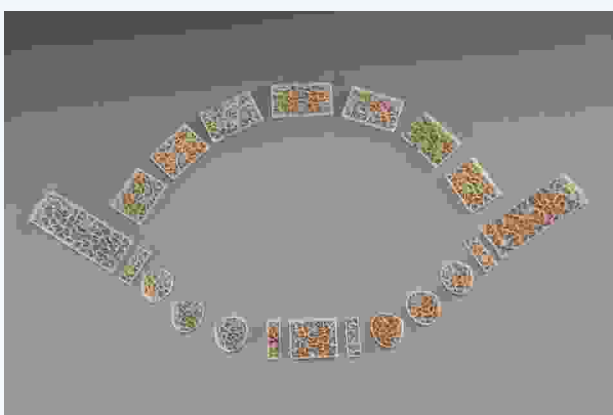
光绪通宝 2 枚。M12: 5，小平钱，圆形，方穿，宽郭，钱面文为“光绪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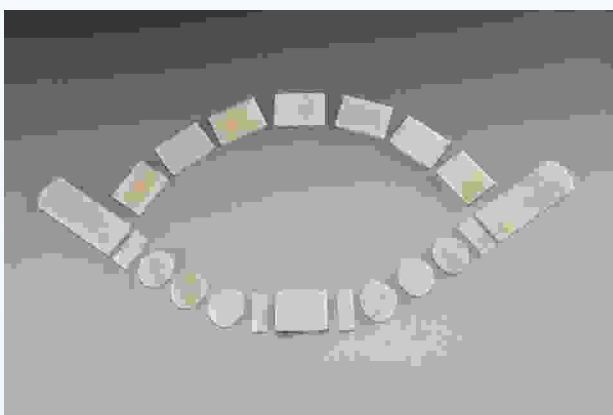
图一二 M16 出土玉带 (M16: 3)



M15 出土玉带 (M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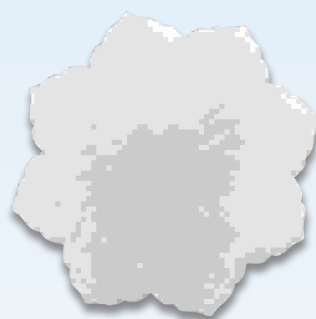
M16 出土玉带 (M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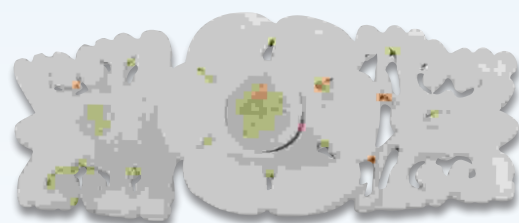
M16 出土玉带 (M16:3)



银耳环 (M14:3、M14:4)



玉饰 (M16:5)



玉带钩 (M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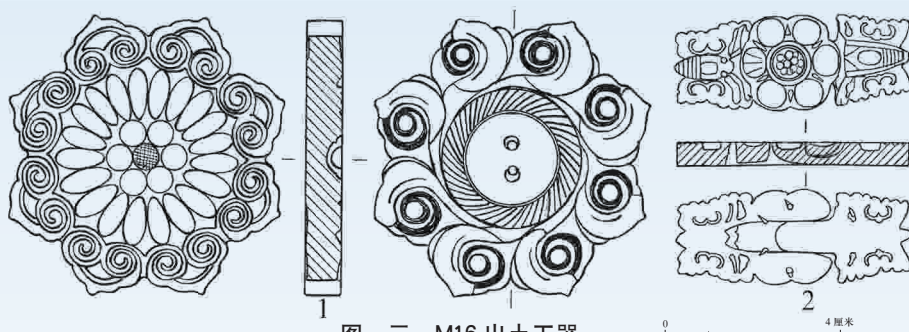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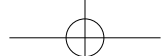
青花瓷罐 (M15:4)



青花瓷罐 (M16:1)



瓷罐 (M11:1)



图一三 M16 出土玉器
1. 玉饰 (M16:5) 2. 玉带钩 (M16:4)

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4 厘米，穿径 0.56 厘米，厚 0.12 厘米。

同治重宝 3 枚。M14:5, 小平钱, 圆形, 方穿, 宽郭, 钱面文为“同治重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上下为“当十”，左右为满文。直径 2.59 厘米，穿径 0.54 厘米，厚 0.11 厘米。

光绪重宝 1 枚。M14:7, 大平钱, 圆形, 方穿, 宽郭, 钱面文为“光绪重宝”，上下右左对读，背穿上下为“当十”，左右为满文。直径 3.03 厘米，穿径 0.67 厘米，厚 0.19 厘米。

8. 青砖 1 块。M14:8, 长方形, 中间有一道凹槽, 素面。长 28 厘米, 宽 14 厘米, 厚 5.2 厘米。

三、结 语

此次发掘的墓葬从形制及出土器物方面推断, 应属于明清时期的墓葬。

明代墓葬葬具为木棺及内外椁, M15 为五人合葬墓, 从埋葬特点来看, 应为先后埋葬在一起的。此前, 在两座墓葬的正北因施工发现了一座墓葬, 从墓中出土的墓志碑文可知, 墓主人为明代万历皇帝舅父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贵^①, 那么此次清理的这两座墓葬和李文贵墓是否有关系呢, 如果有关系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首先, 从墓葬排列来说, M15、M16 两座墓葬与李文贵墓皆为正南北向, 三墓相邻, 李文贵墓居北, 两座墓葬紧邻其南且并相排列。由此, 三座墓葬之间应有一定的关系, 可能为家族墓葬。其次, 从随葬器物来看, M15、M16 均出土有玉带, “由于玉带与古代礼仪制度紧密相连,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所以凡出土玉带的墓葬多等级较高, 墓主身份有皇帝、亲王和王妃、够品级的官员及命妇等”^②。另据《明会典》记载, 革带中以玉带最为珍贵, 只有皇帝、皇后、妃嫔、皇太子、亲王、郡主、公、侯、驸马、伯及文武一品官才有使用^③。两座墓葬虽未见墓碑或墓志铭, 墓主人的具体情况无从推断, 但从所

出玉带及同出器物如玉佩饰、青花瓷罐等可知, 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应是很高的。再次, 结合史料分析, 李文贵家族世系及姻亲, 简报^④已作考证, 不再叙述。据《明史》^⑤载, 李文贵下有二子, 长子诚镒, 次子诚懿, 二人均官居要职。诚镒官至左都督,

娶妻兵部尚书张瓚女; 诚懿官千户, 娶妻都督同知陈胤征女。因两墓未出任何文字方面的记载, 二人生平在此不作详细考证, 仅结合此前考证及史料记载推测此二人可能为墓葬主人。综合以上分析, M15、M16 墓主人可能即为李文贵之二子——诚镒、诚懿。

所清理的清代墓葬, 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均为中小型墓葬, 墓主人身份不高, 应为当时平民阶层的墓葬。随葬器物中, 瓷罐、釉陶罐、铜簪等器物是北京地区明清时期墓葬中常见器物, 瓷罐 M9:1 与五棵松篮球馆 M38:1、奥运村 M25:1 和 M32:1 形制相同, 釉陶罐 M15:1 与五棵松篮球馆 M44:1、国家体育馆 M7:1 形制相同。银扁方 M5:1、M5:2 与五棵松篮球馆 M22:3 和 M36:4、国家体育馆 M17:1^⑥形制相同。

此批明清墓葬, 特别是两座明墓的发掘, 为研究当时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及明代的家族墓葬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①②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年。

③④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 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④⑦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丰台区明李文贵墓》, 《文物》2008 年 9 期。

⑤ 虞海燕:《论考古出土的明代玉带之形制工艺》, 《北京文博》2008 年 1 期。

⑥ 《明史·职官志》, 中华书局, 197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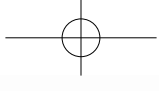
⑦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发掘: 张智勇

执笔: 张智勇 刘凤亮

绘图: 刘缀生

摄影: 张智勇 韩宜林



北京市延庆县应梦寺遗址 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物管理所

一、前言

应梦寺遗址位于延庆县张山营镇靳家堡北山顶，距延庆县城约 18 公里，为延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地点 GPS 数据为北纬 $40^{\circ}19'$ ，东经 $115^{\circ}33'$ ，海拔 1005 米。遗址点距山脚的垂直高差约为 515 米。

该遗址多年破落，地表现状为荒草和灌木，可散见柱础石等建筑构件。为配合应梦寺复建工程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10 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延庆县文物管理所对应梦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应梦寺为倚山建寺，其正殿区、一重院落区呈北高南低状。清理的范围东西长约 51 米，南北宽约 41 米（正殿区宽 21 米，一重院落区宽 20 米）（图一），总发掘面积约 2100 平方米。其中发掘的正殿部分约 1070 平方米，一重院落部分约 950 平方米，台阶清理面积约 80 平方米。

二、遗迹

此次发掘共清理出建筑遗址 9 处，其中正殿区有大殿 3 座、鼓楼 1 座、房址 4 座，一重院落有天王殿 1 座。另有钟楼等遗迹已被破坏殆尽。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等各类建筑构件。下面以天王殿、主殿、西殿为例加以说明。

09YY 天王殿：该殿位于庙址的一重院落，北距大殿 1 月台 12.8 米。方向 180° ，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由台阶、月台和正殿三部分组成（图二；图版一）。

台阶：位于殿前平台的中南部，坡长 3 米，东西宽 3.5 米。残存四步台阶，由下向上依次为，第一步台阶宽 0.66 米，高 0.2 米；第二步台阶宽 0.7 米，高 0.2 米；第三步台阶宽 0.8 米，高 0.25 米；第四步台阶宽 0.8 米，高 0.25 米。个别台阶上残存少量石块，由此推测，该台阶应该为石块砌制。台阶的北端与殿前平台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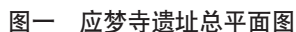
殿前平台：位于正殿的南部，清理出东西长 9.8 米，南北宽 3.09 米。台面平整，台体四周用石块围砌，台体表面距地表高 0.9 米，北端与正殿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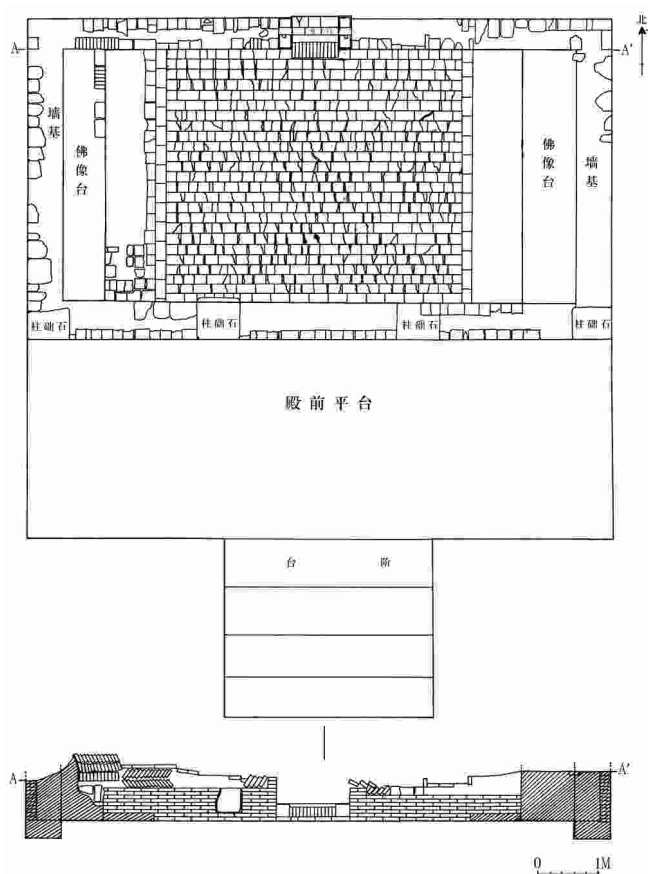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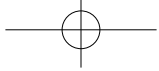
正殿：位于殿前平台的北部，北墙距大殿 1 月台 12.8 米，呈东西向，进深 5.35 米，面阔三间，宽 9.8 米。根据发掘清理情况，北墙宽 0.5 米，南墙宽 0.65 米，东、西墙宽 0.6 米。该殿内无夹墙，四壁基础用石块错缝而砌，石缝中夹泥巴。东、西和南三面仅残存墙基，北墙残存有少许墙体，残存高 0.6 ~ 1.1 米。墙体底部用五层平砖顺向错缝平砌，顺砖中间砌残砖块及石块，平砖上部用石块或残砖夹泥巴砌制，残砖砌法为斜立平砌呈人字形，墙体的内、外两面均抹有泥巴。

墙体中部有一门，门宽 1.2 米，门两侧各有一长 0.5 米，宽 0.22 米，厚 0.22 米的门墩。两



南基础宽 0.5 米，残存高 0.06 ~ 0.75 米。在南基础中部和东西两侧分别设置有四个柱础石，呈椭圆形，直径 0.58 米。东部两柱石间距 3.5 米，西部两柱石间距 3.5 米，中间两柱石间距 3.2 米，用青砖及青砖残块夹白灰错缝平砌。





图二 09YY 天王殿平、剖面图

殿内北部为砖雕须弥座式佛台，佛台平面呈长方形，长9.3米，宽2.3米，高0.8米。圭脚厚0.12米，下枋厚0.06米，下枋厚0.06米，束腰厚0.34米，上枋厚0.06米，上枋厚0.06米。

在佛台的中部及东、西两侧分别有一佛座，中部佛座已破坏至底，东、西两侧佛座保存较完整。东侧佛座呈长方形，东西长1.5米，南北宽1.18米，高0.55米，用青砖错缝平砌而成，距东基础1米。该佛座的南部有一石质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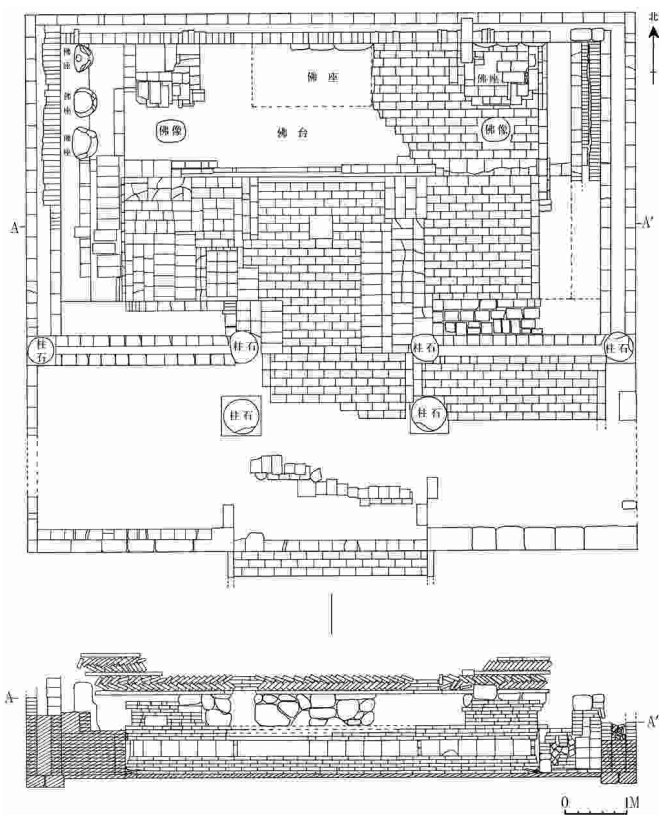
图版二 主殿残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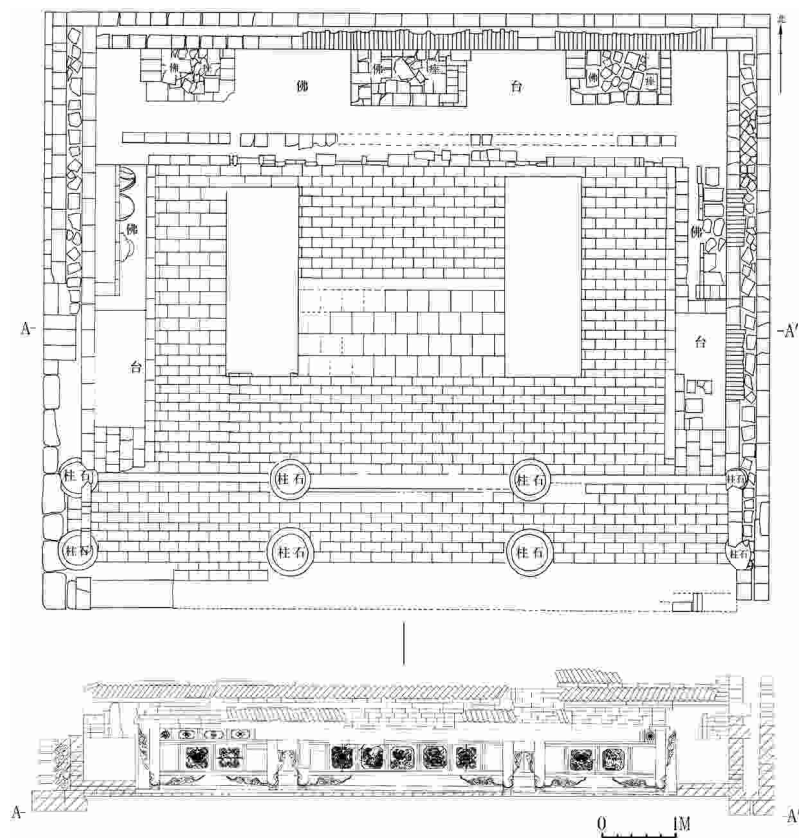
图版一 天王殿（北至南）

像，高0.9米，盘腿于莲花座，双手交叉（图版三）。西侧佛座呈长方形，东西残长1.3米，南北宽1.1米，残高0.5米，用青砖错缝平砌而成，距西基础1.1米。该佛座的南部有一石质残缺无头佛像，残高0.7米，盘腿于莲花座，双手交叉。中部佛座呈长方形，东西长2.05米，南北宽1.1米，仅残留底部痕迹。

在该大殿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一佛台，东部佛台呈‘J’形，北部上部已破坏，中部已破坏至底，南北长5米，东西宽0.5～2.9米，高于北部佛台0.3米，用青砖夹泥土错缝平砌。西部佛台，呈‘L’形，南北长5米，东西宽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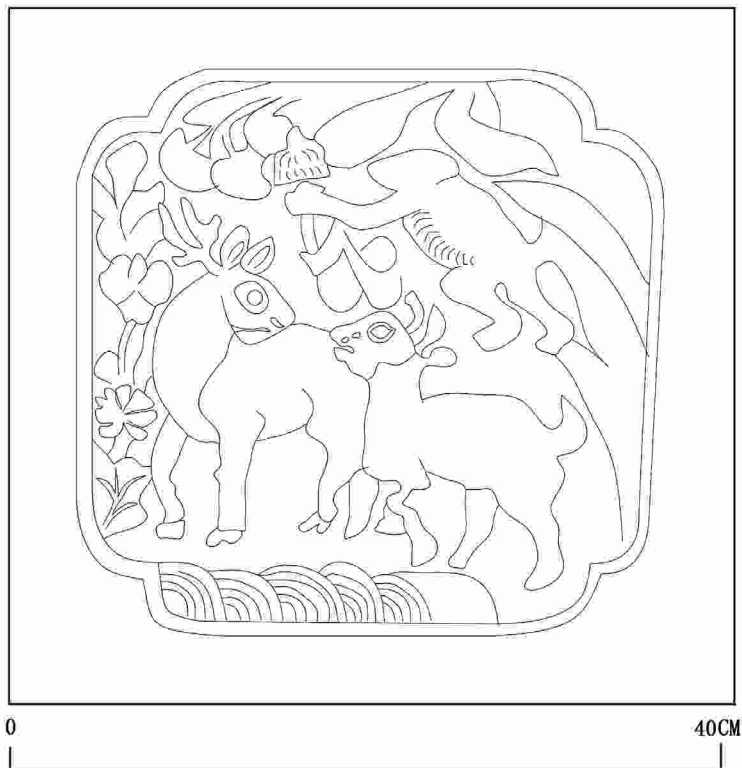


图三 09YY 主殿平、剖面图



图四 09YY 西殿平、剖面图

米，高于北部佛台 0.3 米，用青砖夹泥土错缝平砌，在该佛台的北部，残留有三座泥质佛像的下部，



图五 禄祿封侯雕花砖线图



图版三 石佛

因破碎，姿态不详。

殿内底部用青砖呈东西向平铺，中北部置一方形青砖，方砖规格为 0.4×0.4 米。其它用砖规格为 $0.28 \times 0.14 \times 0.06$ 米， $0.36 \times 0.18 \times 0.06$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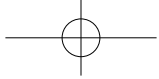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在南基础的南部为一迴廊，东西长 10.5 米，南北残宽 1.2 米。在迴廊的中部偏南分别有二个柱础石，径长 0.6 米，两柱础石间距 3.2 米。迴廊的东部偏南有一长方形石块，南北长 0.5 米，东西宽 0.3 米。中东部残留有铺地砖，呈东西向错缝平铺。

在迴廊的南部有一月台，呈长方形，东西长 10.5 米，南北宽 2 米。月台南部用青砖及石块砌制，中部残留有少量残砖块，在月台中南部向外凸出 0.4 米，东西长 3.45 米，用青砖错缝平砌。

西殿(殿2):该殿位于发掘区的西部，东邻 F1，南邻殿 3，方向 180° ，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面阔 9.9 米，进深 6.5 米。由北基础、东基础、南基础、西基础、佛台等构成。(图四；图版四)

北基础宽 0.5 米，残存高 1.4 ~ 1.65 米，内侧用斜青砖砌制，外围用青砖夹白灰错缝平砌。

东基础宽 0.6 米，残存高 1.85 米，下部用石块砌制，上部内侧用平砖和斜



砖砌制，外围用青砖夹白灰错缝平砌。

西基础宽 0.6 米，残存高 1.0 ~ 1.25 米，用青砖夹白灰错缝平砌。该基础外西部有一用石块和青砖砌制的墙角，向外凸出 0.1 米。

南基础底部残留有凹槽，凹槽宽 0.12 ~ 0.2 米，深 0.06 米。该基础中部和东西两侧分别设置有四个柱础石，呈圆形，直径 0.58 米，东部两柱石间距 3.0 米，西部两柱石间距 3.0 米，中间两柱石间距 3.3 米，东部柱础上外围用瓦竖砌呈圆形。

在该殿内北部有一佛台，呈长方形，东西长 7.2 米，宽 1.6 米，残高 0.9 米。佛台南壁下部东、西侧及中部分别设置有六根竖柱，高 0.68 ~ 0.84 米，宽 0.14 米。竖柱之间用雕刻花砖呈东西向砌制而成。花砖向内凹进 0.02 米，凹面上部的东西两侧残留有雕刻砖竖砌，花砖规格为 $0.28 \times 0.14 \times 0.06$ 米， 0.36×0.36 米。图案有“富贵牡丹”、“多子多孙”、“麒麟送子”、“禄祿封侯”（图五）等（图版五）。佛台面仅残留少量的东西向包边砖。在佛台上的中部及东、西两侧分别有一佛座，中部佛座呈长方形，东西残长 1.05 米，南北宽 0.8 米，高 0.35 米，用青砖错缝平砌而成。东侧佛座呈长方形，东西长 1.45 米，南北宽 0.76 米，高 0.38 米，用青砖错缝平砌而成，距东基础 0.75 米。西侧佛座呈长方形，东西残长 1.3 米，南北宽 0.72 米，残高 0.3 米，用青砖错缝平砌而成，距西基础 0.7 米。

在该大殿的东、西两侧中部分别有一佛台，东部佛台南北长 2.0 米，东西宽 0.7 米，高 0.72 米，台面及三壁涂抹有白灰。西部佛台南北长 2.0 米，东西宽 0.7 米，高 0.72 米，台面及三壁涂抹有白灰，台面残留有三座泥质佛像下部，残高 0.56 米。

在该大殿的东、西两侧南部分别有一佛台，东部佛台南北长 1.6 米，东西宽 0.7 米，高 0.12 米，台面及三壁涂抹有白灰。西部佛台南北长 1.6 米，东西宽 0.7 米，高 0.12 米，台面及三壁涂抹有白灰。

殿内底部用青砖呈东西向平铺。用砖规格为 $0.28 \times 0.14 \times 0.06$ 米， $0.36 \times 0.18 \times 0.06$ 米， 0.3×0.3 米。在大殿内中部两侧分别有一长 2.6 ~

2.75 米，宽 1.0 ~ 1.05 米的土面，没有发现铺砖。

在南基础的南部为一迴廊，东西长 8.8 米，南北宽 1.75 米。在迴廊的东西两侧及中部偏南分别有一个柱础石，呈椭圆形，径长 0.56 ~ 0.66 米。东部两柱石间距 3 米，西部两柱石间距 3 米，中间两柱石间距 3.3 米，分别与南基础上柱础石相互对应，南北间距 1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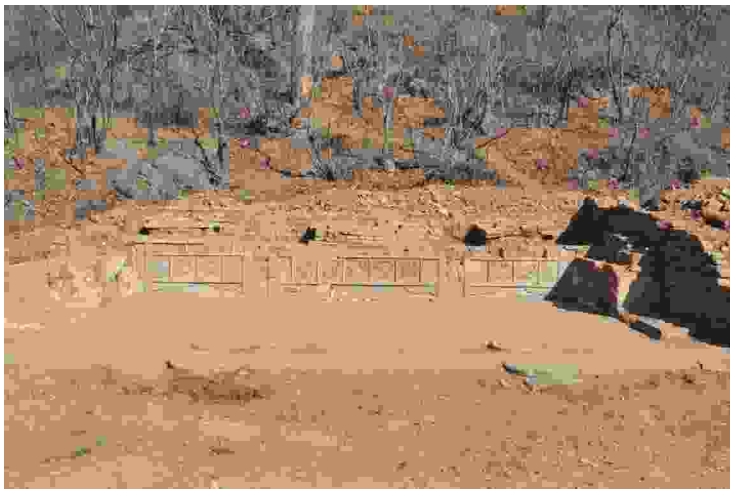
迴廊南侧残存东西两侧少量石条及青砖包边。殿内堆积青砖残块、倒塌土等，包含物有板瓦、筒瓦、建筑构件及琉璃构件等。

三、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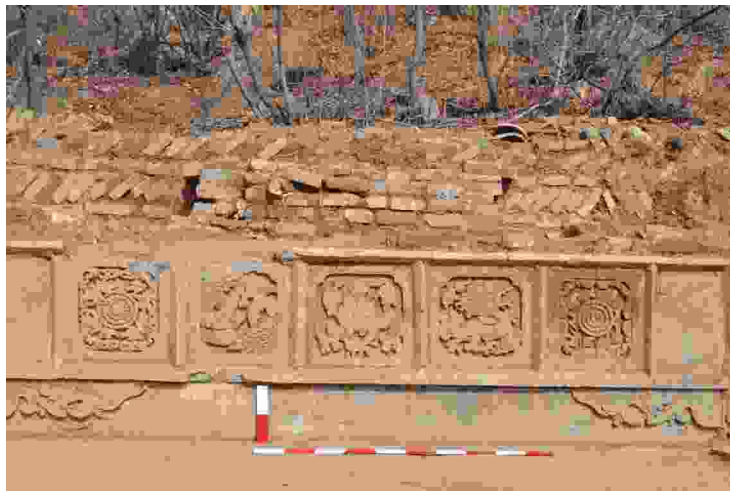
在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大量的砖、瓦及各类建筑构件，可分为陶器、铁器、琉璃器、铜器四类。择其代表作为标本介绍如下。

1. 陶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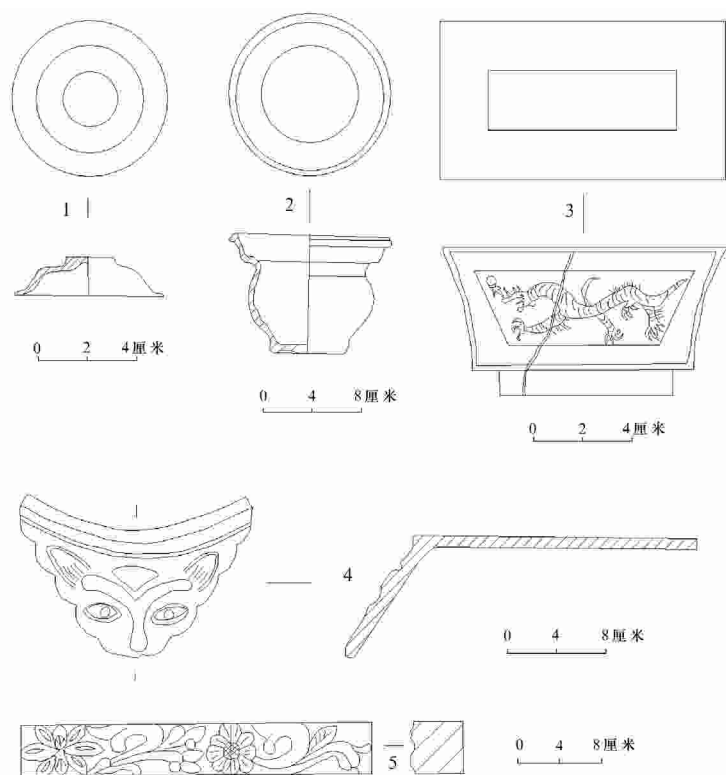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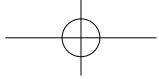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陶盖 F1: 1，泥质灰陶。高 3 厘米，直径 6.4



图版四 西殿残址



图版五 西殿东部雕花砖



图六 应梦寺遗址出土器物

1. 陶器盖 (F1:1) 2. 陶香炉 (F1:2) 3. 陶香炉 (D2:1)
4. 陶滴水 (D2:2) 5. 雕花砖 (D2:3)

厘米, 底径 2 厘米 (图六, 1)。

香炉 F1:2, 泥质灰陶。敞口, 鼓腹, 圈足, 高 9 厘米, 口径 13 厘米, 腹径 11 厘米, 底径 6.5 厘米 (图六, 2)。

香炉 D2:1, 泥质灰陶, 上雕刻龙形。上口长 23 厘米, 底部长 14 厘米, 高 12 厘米 (图六, 3)。

滴水 D2:2, 泥质灰陶。长 23 厘米, 宽 19 厘米, 厚 1 厘米 (图六, 4)。

直檐雕花砖 D2: 3, 泥质灰陶。长 21 厘米, 宽 14 厘米, 厚 5 厘米 (图六, 5)。

雕花砖 D2: 4, 泥质灰陶。长 32 厘米, 宽 30 厘米, 厚 5.5 厘米 (图七, 1)。

雕花砖 D2: 5, 泥质灰陶。长 29 厘米, 宽 29 厘米, 厚 5.5 厘米 (图七, 2)。

雕花砖 D2: 6, 泥质灰陶。长 30 厘米, 宽 30 厘米, 厚 5.5 厘米 (图七, 3)。

2. 铁器类

剪刀 F1:3, 长 19 厘米 (图七, 4)。

叉 F1: 4, 长 20 厘米, 宽 6.5 厘米 (图七, 5)。

镰头 F1: 5, 长 13.5 厘米, 宽 5 厘米 (图七, 6)。

锅 F1:6, 敞口, 弧底, 高 14 厘米,

口径 37 厘米 (图八, 1)。

熨斗 F1: 7, 尖头平底, 长 21 厘米, 头长 4.8 厘米, 宽 2 厘米, 厚 1.6 厘米 (图八, 2)。

铲头 F1:8, 长 14.5 厘米, 宽 4.5 厘米 (图八, 3)。

灯 F1: 9, 侈口, 平底, 口径 10 厘米, 底径 6 厘米, 高 2.5 厘米, 灯柄高 5 厘米 (图八,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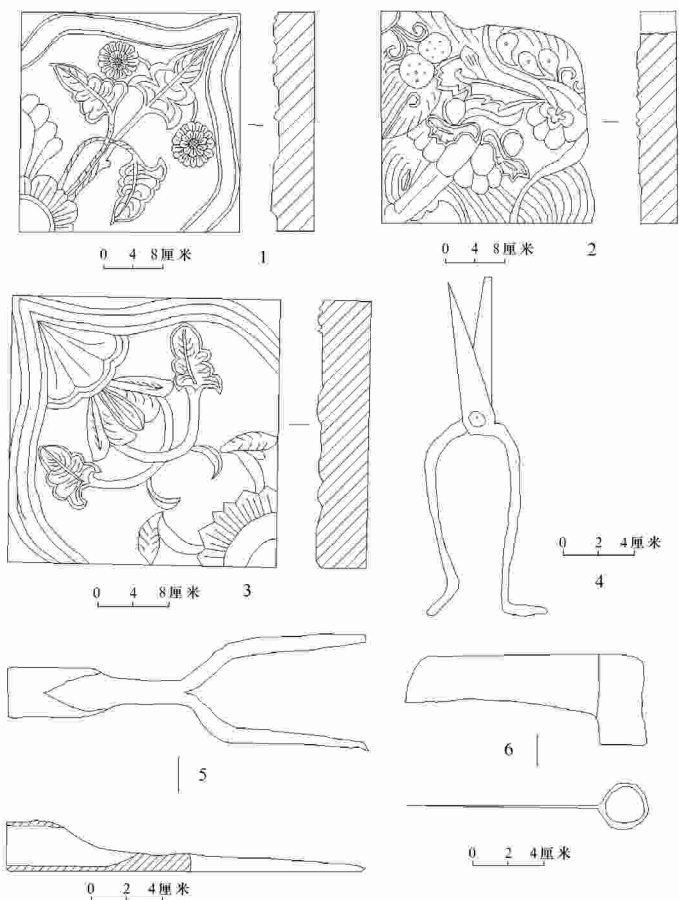
3. 琉璃类

屋脊陡板 D2: 7, 花蕊施绿釉, 花瓣施黄釉, 残长 30.5 厘米, 残宽 25 厘米, 厚 3 厘米 (图八, 5)。

屋脊陡板 D2: 8, 花瓣状, 中有铁棒卯相联, 花蕊施绿釉, 花瓣施黄釉。顶宽 18.5 厘米, 底宽 26 厘米, 残高 7.5 厘米 (图八,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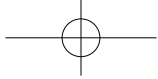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琉璃瓦当 D2: 9, 龙纹, 施绿釉, 直径 11 厘米, 厚 1.8 厘米 (图九, 1)。

琉璃砖 D2:10, 绿釉, 长 23 厘米,



图七 应梦寺遗址出土器物

1. 雕花砖 (D2:4) 2. 雕花砖 (D2:5) 3. 雕花砖 (D2:6) 4. 铁剪刀 (F1:3)
5. 铁叉 (F1:4) 6. 铁镰 (F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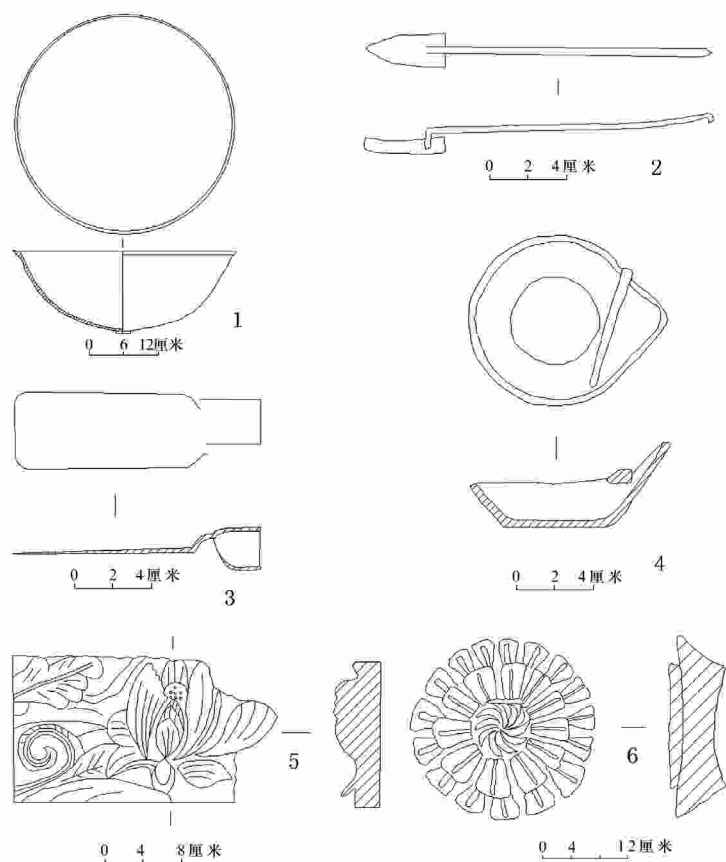
宽 11.2 厘米，厚 5 厘米，上有字“保安州沙城民一月琉璃匠人”字样（图九，2）。

4. 铜器类

勺 F1: 10，口径 26 厘米，高 9 厘米，厚 0.3 厘米，勺把长 14 厘米（图九，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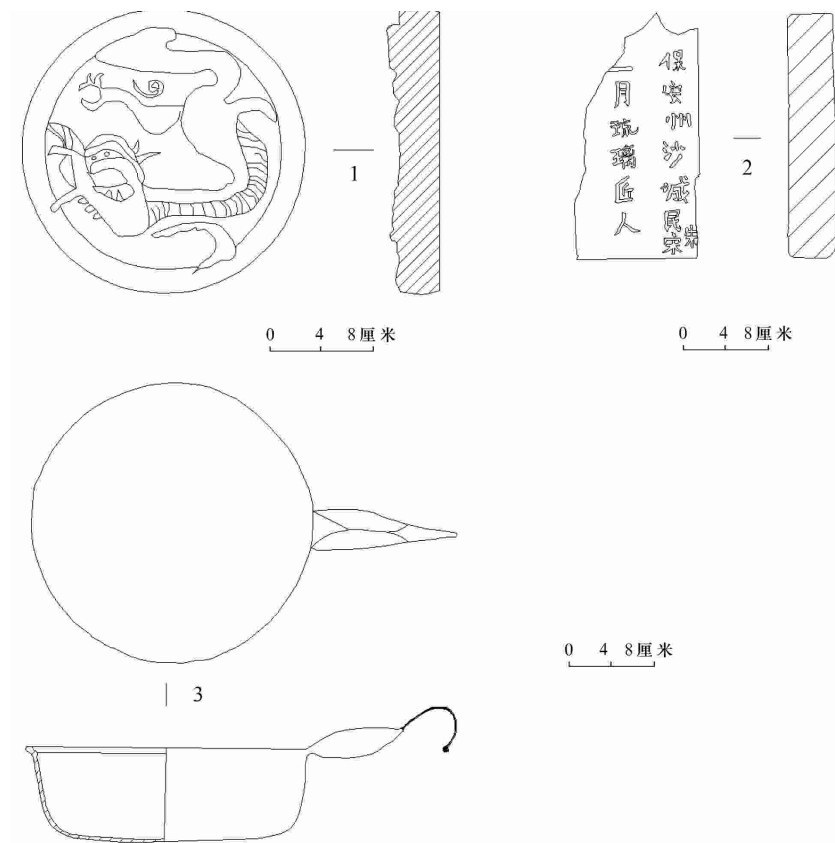
四、结 语

据《延庆州志》载：“应梦寺在州城北二十里应梦山上，相传萧太后应梦建。元末兵焚。基址及鉴石辇道烧造琉璃砖瓦窑石俱存。”据本次发掘的情况来看，未见辽代时期的建筑基址。虽有部分辽金时期的勾纹砖散见于基址之上，但均为二次搬运所至，不是原生堆积。难以据此而断应梦寺始建于辽代。



图八 应梦寺遗址出土器物

1. 铁锅 (F1:6) 2. 铁熨斗 (F1:7) 3. 铁铲头 (F1:8) 4. 铁灯 (F1:9)
5. 琉璃陡板 (D2:7) 6. 琉璃陡板 (D2:8)



图九 应梦寺遗址出土器物

1. 琉璃瓦当 (D2:9) 2. 琉璃砖 (D2:10) 3. 铜勺 (F1:10)

应梦寺经多次修缮，其西殿与殿 1 应为不同时期建筑。但从遗址的建筑形制、建筑构件的风格来看，应梦寺的主体时期应为明代中晚期，延续至清代中期。在发掘中清理出不同时期的石碑残件，碑头上有“正德七年”、“崇祯元年”、“康熙五十一年”的字样也印证了这一点。

通过此次发掘，基本搞清了应梦寺遗址殿址及一重院落的布局情况，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物，丰富了对明代寺庙格局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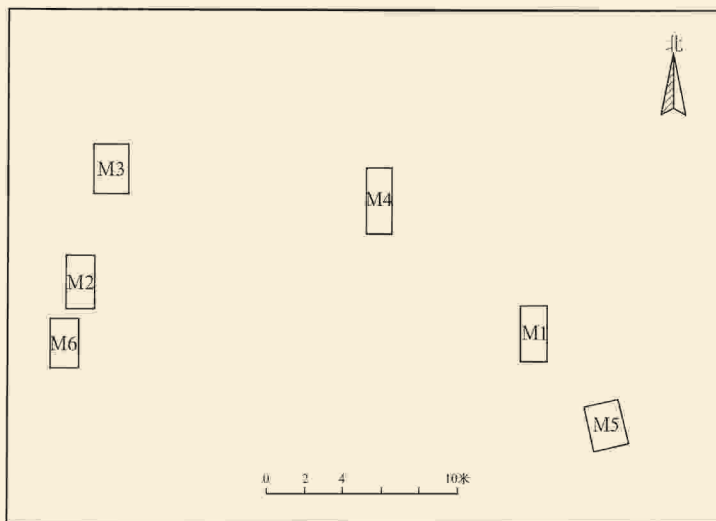
发掘：郭京宁、程金龙、张永强
整理：郭京宁、冯双元、王冠群
执笔：郭京宁、程金龙、张永强



北京市密云县石桥小区 商住楼工程考古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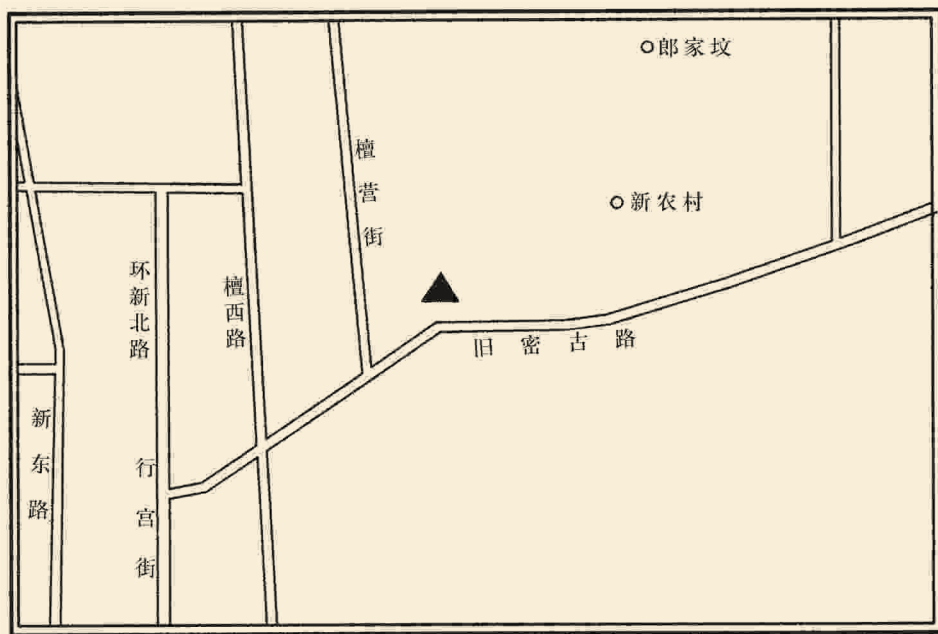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密云县文物管理所

2007年11月29日~12月4日,为配合北京市密云县石桥小区商住楼工程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密云县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对密云县石桥小区商住楼工程用地范围内考古勘探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北京市密云县檀营街东侧,南邻旧密古路,地理位置为东经 $116^{\circ}52'00.73''$ 、北纬 $40^{\circ}23'02.59''$,海拔高度约77米(图一)。此次发掘的6座古墓葬均为清代墓葬(图二),可分为双棺墓、三棺墓和瓮棺墓。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图二 墓葬分布图

一、双棺墓



图一 发掘地点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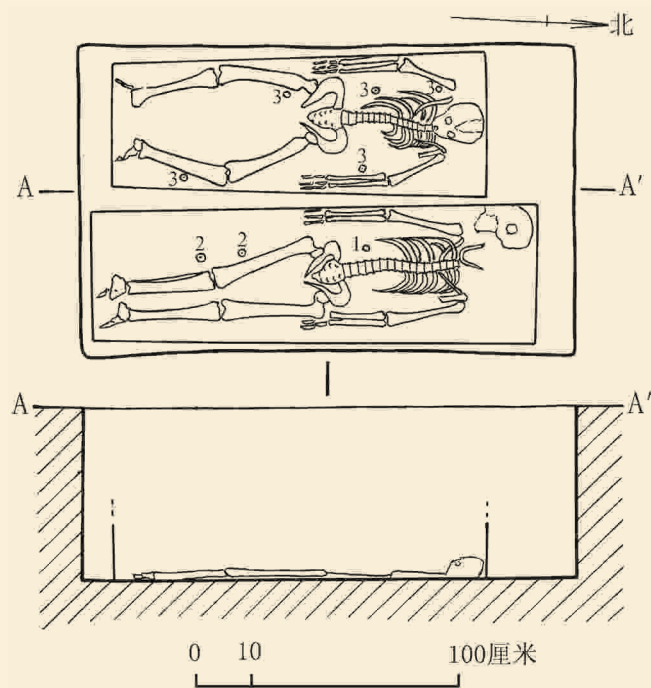
双棺墓共有4座,分别为M1、M2、M3、M5。

M1 位于发掘区的西南部,南邻M5,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南北向,方向 359° 。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南北长1.91米,东西宽1.2米。墓口距地表1.03米,墓底距墓口0.66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双棺,棺木腐朽,仅显棺线痕迹。西棺长1.44、宽0.47~0.56、残高0.22米;西棺内



北京市密云县石桥小区商住楼工程考古发掘简报

骨架保存较好,头向北,面向上,葬式为仰身直肢,性别不详。东棺长1.72、宽0.5~0.55、残高0.22米;东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向北,面向西,葬式为仰身直肢,性别不详(图三)。



图三 M1 平、剖面图
1. 铜扣 2、3. 铜钱

随葬品 东棺出土铜扣3件、“道光通宝”7枚;西棺出土“开元通宝”5枚、“嘉庆通宝”15枚。

铜扣 4件。东棺出土。标本M1:1,形状、大小相同。扣体呈桃形,顶部两环相连,通体素面。扣体直径0.7厘米,通长1.7厘米(图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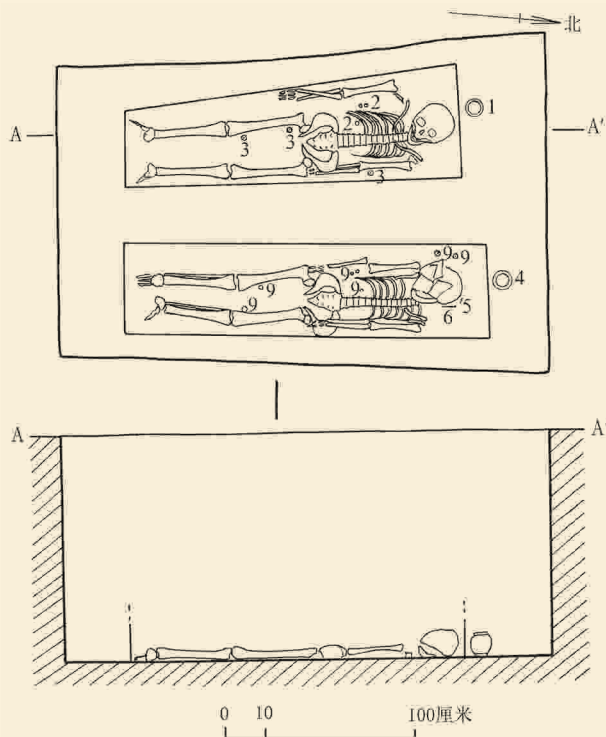
开元通宝 5枚。西棺出土。标本M1:4,小平钱,方穿,钱面文为“开元通宝”,对读,背面有月牙纹。直径2.40、穿径0.70、郭宽0.20厘米(图十一,1)。

道光通宝 7枚。东棺出土。标本M1:2,小平钱,方穿,钱面文为“道光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2.40、穿径0.60、郭宽0.30厘米(图十一,3)。

嘉庆通宝 15枚。西棺出土。标本M1:3,小平钱,方穿,钱已锈蚀,钱面文为“嘉庆通宝”。直径2.40、穿径0.60、郭宽0.30厘米(图十一,2)。

M2 位于发掘区的西南部,南邻M6,北邻M3,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南北向,方向358°。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南北长2.6、东西宽1.56~1.84米。墓口距地表0.95米,墓底距地表深2.15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双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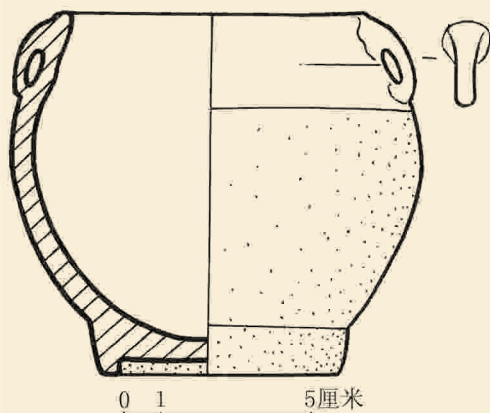
棺木腐朽严重,仅显棺线痕迹。西棺长1.8、宽0.41~0.61、残高0.2米;西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上,葬式为仰身直肢,性别为男。东棺长1.95、宽0.49~0.52、残高0.13米;东棺内骨架保存较好,头向北,面向上,葬式为仰身直肢,瓷碗覆盖在头骨上,性别为女(图四)。



图四 M2 平、剖面图
1、4. 双系瓷罐 2、8. 铜扣 3、9. 铜钱
5. 银押发 6. 银簪 7. 黄釉瓷碗

随葬品 西棺出土双系瓷罐1件、铜扣5件、“嘉庆通宝”9枚。东棺双系瓷罐1件、银押发1件、银簪1件、瓷碗1件、铜扣7件、“咸丰通宝”29枚。

双系瓷罐 2件。标本M2:1,西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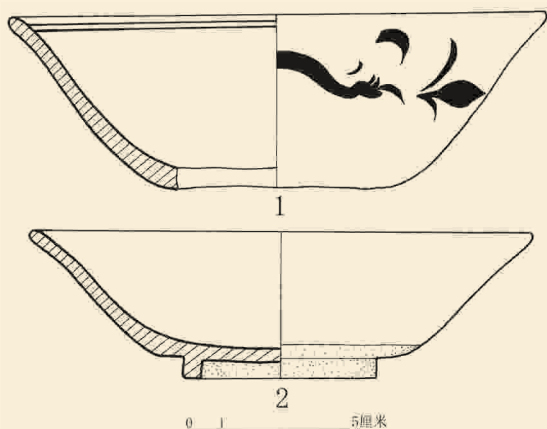
图七 M2 出土双系瓷罐 (M2:1)



考古简报

米黄色粗胎，酱褐色釉，外壁肩部以下无釉。圆唇，直口，鼓腹，圈足。领与肩处有两对称桥形耳。口径8.2、底径6.2、通高9.6厘米（图七）。标本M2:4，东棺出土。残，米黄色粗胎，酱褐色釉，外壁上腹部以下无釉。圆唇，直口，鼓腹，圈足。领与肩处有两对称桥形耳，两耳已残。口径8.4、底径6.4、通高9.2厘米（图十二，6）。

瓷碗 1件。东棺出土。标本M2:7，残，米黄色胎，外壁白釉泛黄，内外壁均施釉，内壁施化妆土。外壁饰黑色草叶纹。内壁上部有两周弦纹。圆唇，敞口，弧腹，底残。口径15.8、残高5.1厘米（图五，1）。



图五 M2、M3 出土器物
1、2 瓷碗（M2:7、M3:1）

铜扣 12件。标本M2:2，西棺出土。5件大小、形制相同。扣体呈桃形，顶部有一环，通体素面。扣体直径1.2厘米，通长2.1厘米（图六，7）。标本M2:8，东棺出土。7件大小、形制相同，扣体呈桃形，顶部两环相连，通体素面。扣体直径1.2厘米，通长2.6厘米（图六，9）。

银押发 1件。东棺出土。标本M2:5，两端宽扁尖锐，中间稍有收腰，上篆刻有花卉和如意云纹，背面有款“天元足纹”。长12.2

厘米（图六，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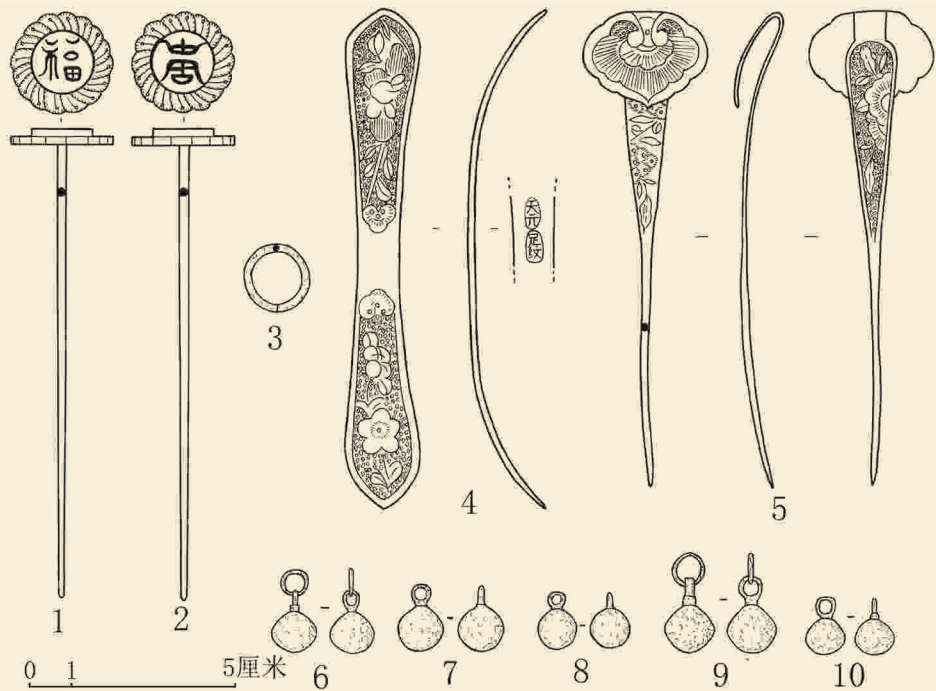
银簪 1件。东棺出土。M2:6，簪首作如意云纹形，上篆刻如意云纹，簪体中部略宽，正面篆刻花卉纹，簪体背面亦篆刻花卉纹，簪尾尖锐，为锥形。通长11.6厘米（图六，5）。

咸丰通宝 29枚。东棺出土。标本M2:9，小平钱，方穿，钱面文为“咸丰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2.10、穿径0.60、郭宽0.20厘米（图十一，5）。

嘉庆通宝 9枚。西棺出土。标本M2:3，小平钱，方穿，钱面文为“嘉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2.30、穿径0.60、郭宽0.20厘米（图十一，4）。

M3 位于发掘区的西南部，南邻M2，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南北向，方向2°。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南北长2.8米，东西宽1.58~2.06米，墓口距地表0.95米，墓底距地表深1.2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双棺，棺木腐朽严重，仅显棺线痕迹。西棺长2.06、宽0.62~0.78、残高0.24米；西棺骨架保存较好，头向北，面向上，葬式为仰身直肢，性别为男，骨架腹部上盖一瓦，瓦长0.24、宽0.18~0.2米。东棺长1.78、宽0.4~0.64、残高0.17米；东棺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西，葬式为仰身直肢，性别为女（图八）。

随葬品 西棺出土瓷碗1件、铜扣2件、“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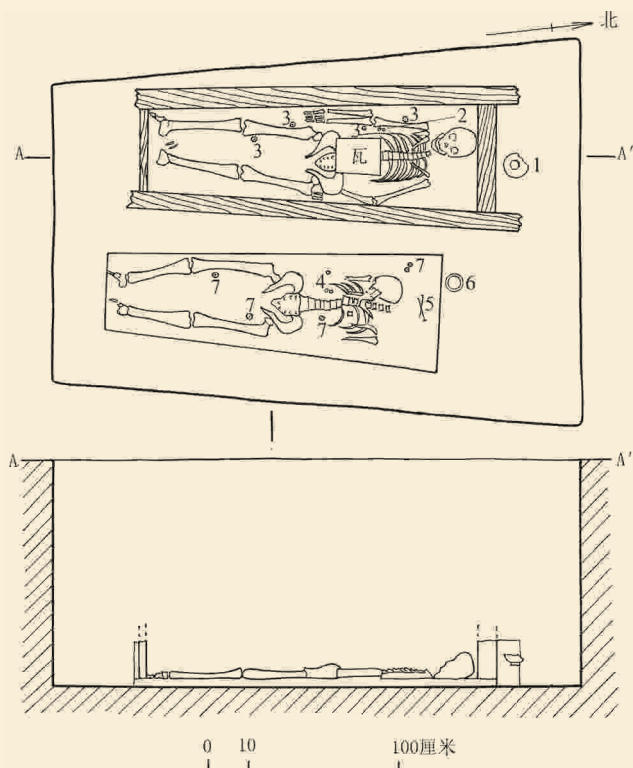


图六 M1 ~ M3、M6 出土器物

1、2、银簪（M3:5-2、M3:5-1） 3. 铜环（M6:2） 4. 银押发（M2:5）
5. 银簪（M2:6） 6 ~ 10. 铜扣（M1:1、M2:2、M3:4、M2:8、M3:2）



北京市密云县石桥小区商住楼工程考古发掘简报



图八 M3 平、剖面图

1. 瓷碗 2、4. 铜扣 3、7. 铜钱 5. 银簪 6. 双系陶罐

庆通宝”4枚；东棺出土银簪2件、双系瓷罐1件、铜扣3件、“乾隆通宝”21枚、“道光通宝”20枚。

瓷碗 1件。西棺出土。标本M3:1，残，米黄色粗胎，黑褐色釉，通体施釉，仅圈足无釉，有滴釉现象。施化妆土。尖唇，敞口，弧腹，矮圈足。口径14.7、底径5.6、通高4.3厘米（图五，2）。

双系陶罐 1件。标本M3:6，东棺出土。残，米黄色粗胎，酱褐色釉，外壁上腹部以下无釉。圆唇，直口，鼓腹，圈足。领与肩处有两对称桥形耳，已残。口径8.6、底径6.4、通高9.8厘米（图十二，5）。

铜扣 5件。标本M3:2，西棺出土。2件大小、形制相同。扣体呈桃形，顶部有一环，通体素面。扣体直径1.1厘米，通长1.6厘米（图六，10）。标本M3:4，东棺出土。3件大小形制相同。扣体呈桃形，顶部有一环，通体素面。扣体直径1.1厘米，通长1.8厘米（图六，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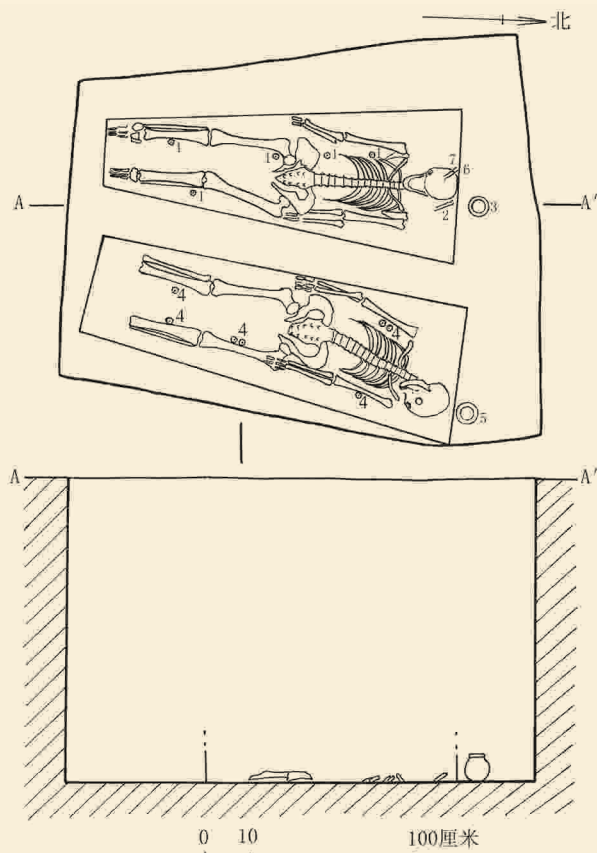
镏金银簪 2件。东棺出土。标本M3:5-1，簪体呈圆锥形，簪头作花瓣形，花叶用垒丝表示脉络，中间有一篆体“寿”字，长11.5厘米（图六，2）。标本M3:5-2，簪体呈圆锥形，簪头作花瓣形，花叶用垒丝表示脉络，中间有一隶书“福”字，长11.5厘米（图六，1）。

嘉庆通宝 4枚。西棺出土。标本M3:3，小平钱，方穿，钱面文为“嘉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2.50、穿径0.60、郭宽0.30厘米（图十一，7）。

乾隆通宝 21枚。东棺出土。标本M3:7-1，小平钱，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2.20、穿径0.60、郭宽0.13厘米。

道光通宝 20枚。东棺出土。标本M3:7-2，小平钱，方穿，钱面文为“道光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2.35、穿径0.60、郭宽0.30厘米（图十一，6）。

M5 位于发掘区的东南部，北邻M1，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南北向，方向358°。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南北长2.3、宽1.4~1.95米，墓口距地表0.95米，墓底距地表深2.35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棺木腐朽，仅显棺线痕迹。西棺长1.7、宽0.32~0.74、残高0.15米，西棺内骨架保存一般，头向北，面向不清，葬式为仰身直肢，棺木底部铺有一层白灰，性别为女。东棺长1.8、宽0.48~0.68、残高0.15米；东



图九 M5 平、剖面图

1、4. 铜钱 2、6. 银簪 3、5. 双系瓷罐 7. 铜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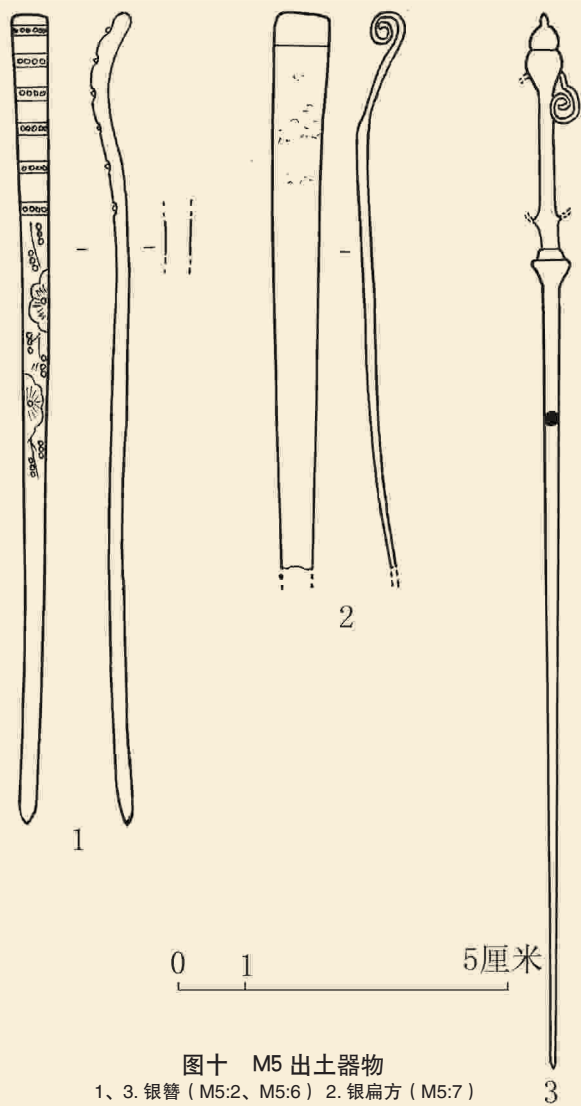
考古简报

棺内骨架保存一般，头向北，面向东，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性别为男（图九）。

随葬品 西棺出土银扁方 1 件、银簪 3 件、双系瓷罐 1 件，“乾隆通宝” 12 枚；东棺出土双系瓷罐 1 件、“乾隆通宝” 9 枚、“雍正通宝” 5 枚。

双系瓷罐 2 件。标本 M5:3，西棺出土。残，米黄色胎，黑釉，轮制。方唇，直口，圆肩，鼓腹，下腹弧收至底，矮圈足。领与肩处有两对称桥形耳，两耳已残。通体施黑褐色釉，仅器底无釉，素面。口径 8.4、底径 6.2、通高 10.4 厘米（图十二，4）。标本 M5:5，东棺出土。米黄色胎，黄褐色釉，轮制。方唇，直口，圆肩，鼓腹，下腹弧收至底，矮圈足。领与肩处有两对称桥形耳。通体施黄褐色釉。口径 8、底径 6.6、通高 11.2 厘米（图十二，1）。

银扁方 1 件。西棺出土。标本 M5:7，残，簪首卷曲，簪体呈扁平状，通体素面。残长 8.5 厘米（图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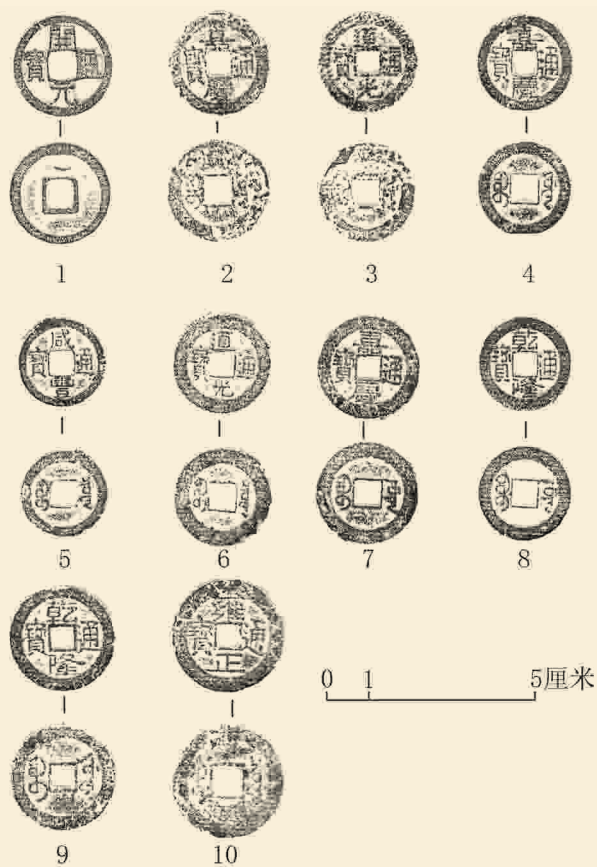


图十 M5 出土器物

1、3. 银簪（M5:2、M5:6） 2. 银扁方（M5:7）

银簪 3 件。西棺出土。标本 M5:2，1 对，大小形制相同。簪体扁平，簪首微曲，上饰竹节纹，簪体中部饰花卉纹，竹节之间残留有镶嵌的绿松石，簪尾尖锐。长 12.4 厘米（图十，1）。标本 M5:6，簪体为圆锥形，簪首残，簪首为银丝缠绕的五面行禅杖，下套银环，杖顶为葫芦形。残长 16.1 厘米（图十，3）。

乾隆通宝 12 枚。西棺出土。标本 M5: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50、穿径 0.50、郭宽 0.30 厘米（图十一，9）。



图十一 M1 ~ 3、M5 出土铜钱

1. 开元通宝（M1:4） 2、4、7. 嘉庆通宝（M1:3、M2:3、M3:3）
3、6. 道光通宝（M1:2、M3:7-2） 5. 咸丰通宝（M2:9）
8、9. 乾隆通宝（M5:4-1、M5:1） 10. 雍正通宝（M5:4-2）

乾隆通宝 9 枚。东棺出土。标本 M5:4-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0、穿径 0.60、郭宽 0.20 厘米（图十一，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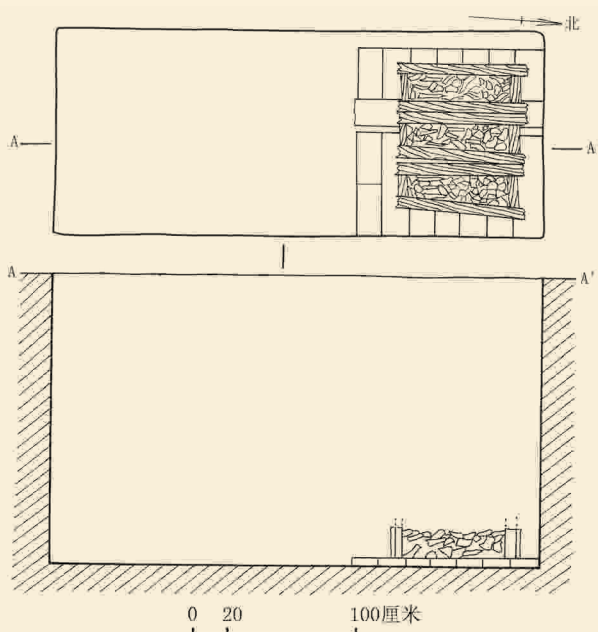
雍正通宝 5 枚。东棺出土。标本 M5:4-2，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雍正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70、穿径 0.60、郭宽 0.30 厘米（图十一，10）。



二、三棺墓

三棺墓 1 座，为 M4。

M4 位于发掘区的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南北向，方向 359°。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南北长 3.04、宽 1.28 米，墓口距地表 0.95 米，墓底距地表深 2.75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墓底北部内置三棺，棺均长为 0.82、宽 0.3、棺木厚 0.07 米，棺木腐朽，棺内置骨灰。棺木下用青砖平铺而成，青砖南北长 1.2、宽 1.16 米。青砖尺寸：0.32×0.16×0.06 米。无随葬品（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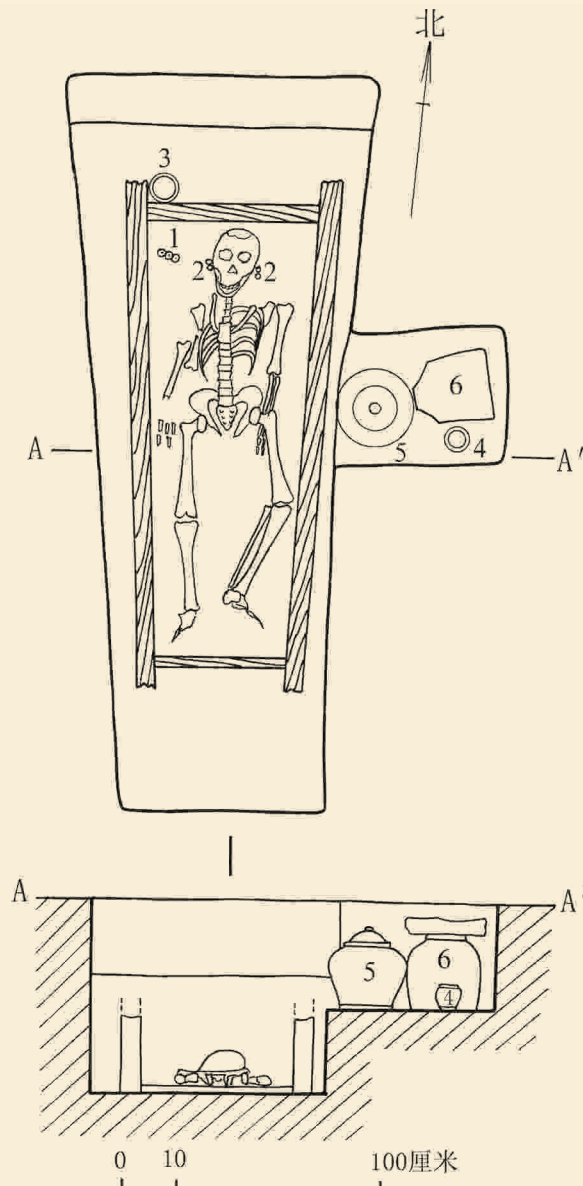
图十三 M4 平、剖面图

三、瓮棺墓

瓮棺墓 1 座，为 M6。

M6 位于发掘区的东南部，北邻 M2，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南北向，方向 358°。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南北长 2.86、宽 0.8 ~ 1.24 米，墓口距地表 1.05 米，墓底距地表深 1.81 米，内填花土，土质较松。内置三棺，西为木棺，东为两瓮棺。木棺南北长 1.98、宽 0.66 ~ 0.86、残高 0.3 米，棺木腐朽，棺木厚 0.08 米，骨架保存一般，头向北，面向上，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性别为女性；瓮棺位于墓葬东部，其土圹呈长方形，东西长 0.68、宽 0.53、深 0.41 米，其底部高出木棺底部 0.34 米；瓮棺可分为东西两棺，西棺高 0.3、直径 0.3 米，

上有圆形盖已残；东棺高 0.29、直径 0.29 米，上口覆盖一块不规则的石块，石块长 0.45、宽 0.32、厚 0.08 米。瓮棺内均有骨灰（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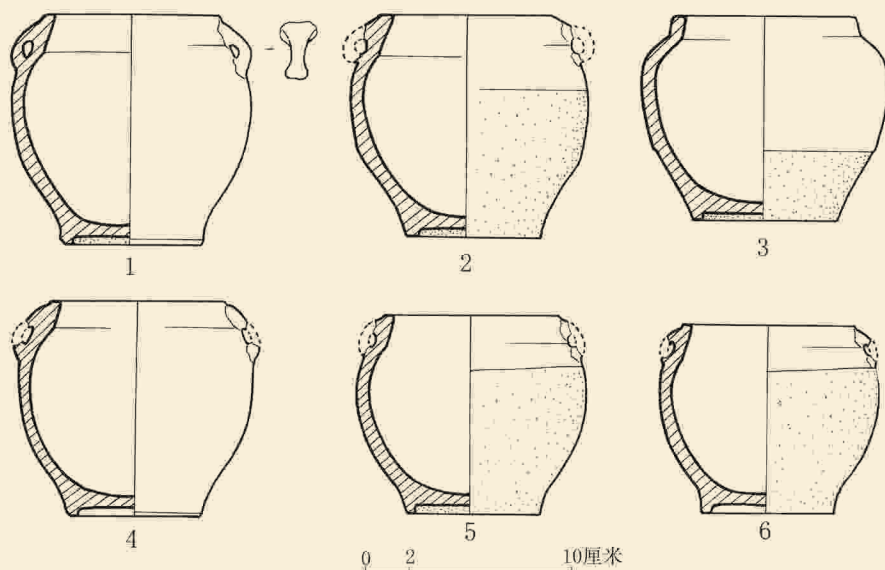
图十四 M6 平、剖面图

1. 铜钱 2. 铜环 3. 双系瓷罐 4. 酱釉瓷罐 5、6. 瓮罐

随葬品 木棺出土铜环 4 件、双系瓷罐 1 件、“乾隆通宝” 17 枚；瓮棺出土瓷瓮罐 2 件、双系瓷罐 1 件。

双系瓷罐 1 件。标本 M6:3，残，木棺出土。米黄色粗胎，酱褐色釉，外壁肩部以下无釉。圆唇，直口，鼓腹，圈足。领与肩处有两对称桥形耳，两耳已残。口径 8.4、底径 6.6、通高 11 厘米（图十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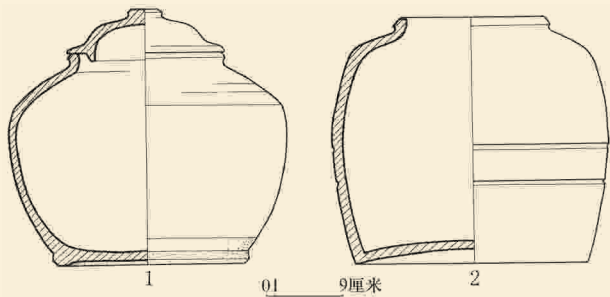
酱釉瓷罐 1 件。标本 M6:4，瓮棺出土。



图十二 M2、M3、M5 出土器物
1、2、4-6. 双系瓷罐 (M5:5、M6:3、M5:3、M3:6、M2:4) 3. 酱釉瓷罐 (M6:4)

米黄色胎，通体施黑褐色釉，仅器底无釉。轮制。方唇，直口，圆肩，鼓腹，下腹弧收至底，矮圈足。口径 8.8、底径 7、通高 10.2 厘米（图十二，3）。

瓮罐 2 件。瓮棺出土。标本 M6:5，米黄色胎，轮制。唇口，短束颈，折肩，鼓腹，腹部缓收，胫部略外撇，平底。盔帽式盖，扁圆钮。外壁及唇施酱釉，有光泽。内壁施酱紫釉。口径 16.8、底径 27、通高 39.5 厘米（图十五，1）。标



图十五 M6 出土瓮罐 (M6:5、M6:6)

本 M6:6，米黄色胎，轮制。尖圆唇，直口，折肩，腹微鼓，底略内凹。器体施黄褐色釉，腹部有两道弦纹。口径 17.4、底径 21.6、通高 30 厘米（图十五，2）。

铜环 4 件。木棺出土。标本 M6:2，呈环形，直径 1.7 厘米（图六，3）。

乾隆通宝 17 枚。木棺出土。标本 M6:1，小平钱，范铸，外圆郭，内方穿，钱面文为“乾隆通宝”，对读，背穿左右为满文。直径 2.20、穿径 0.60、郭宽 0.13 厘米。

四、结 语

本次发掘共清理墓葬 6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其中双棺墓 4 座，三棺墓 1 座，瓮棺墓 1 座。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判断，均为清代墓葬。这批墓葬均为小型墓，形制较为单一，随葬品不丰富，规格等级较低，应为平民墓。葬具为木棺或瓮棺。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在双棺葬中，以男女合葬为主，从出土器物判断男性多葬于西棺，女性多葬于东棺。出土文物种类较多，有镏金银簪、银簪、银押发、银扁方、双系陶罐、双系瓷罐、酱釉瓷罐、瓷碗、瓮罐、铜钱等。这批随葬品和北京其它地区出土随葬品在种类上差别不大，但双系瓷罐、双系陶罐等双系容器在这批墓葬中普遍出现，这是这批墓葬的一大显著特点。在北京其它地区也有明清时代的双系容器出土，但数量较少，较为分散，少有这样集中出土的情况。这一特征或许和明清时代密云县的生活习惯等有关。

通过对这批墓葬的发掘，可以对北京市密云县平民墓葬的形制、葬具、葬式等丧葬习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发掘：于 璞 李 华

整理：刘晓贺

绘图：杨科民

摄影：韩宜林

执笔：于 璞 李 华 刘长河



唐乐邦穗墓志考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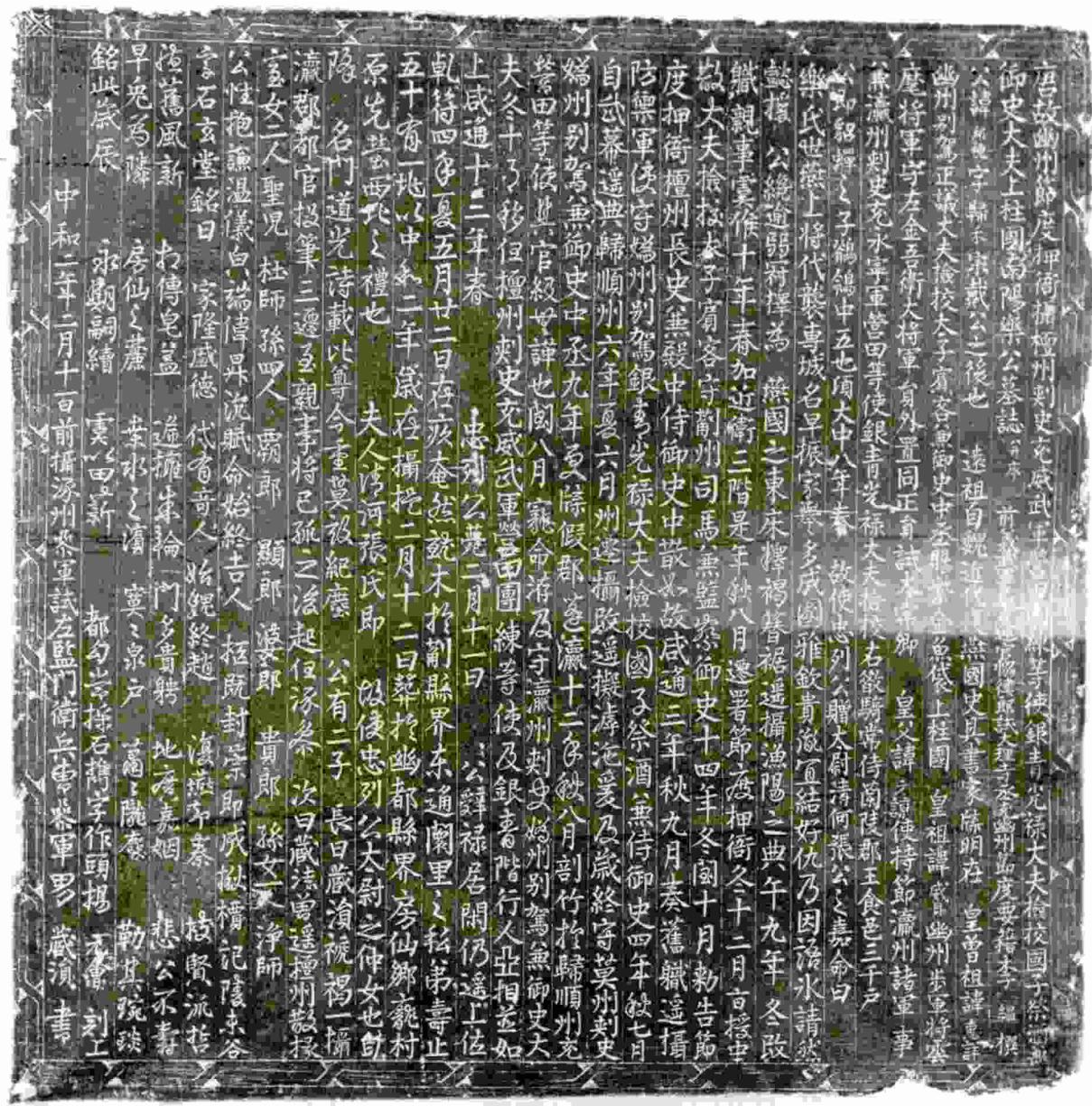
鲁晓帆

唐乐邦穗墓志^①，1949 年在北京石景山区东南的庞村（现首钢院内）出土。志石曾藏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内，今不知其下落。据拓本志石高 63 厘米、宽 62 厘米。正书兼行，30 行，行 25 至 38 字不等。志文属词典雅，字袭鲁公。李缙撰文，乐藏润书，杨元会刻工。唐中和二年（882 年）上石。乐邦穗于大中八年（854 年）被择为当时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允伸的次婿，并跟随岳父为官近 20 年，屡受岳父的提拔与重用。官自亲事、押衙，升至妫州别驾、瀛州刺史、御史大夫等要职，成为当时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允伸的重要心腹和得力助手，在幽州也起到过相当的作用。根据志文所记，可补正唐史的一些内容，并可充实北京地方史料。今就墓志内容略加诠释，并附原文、试加标点。

唐故幽州节度押衙摄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乐公墓志并序 前义武军节度巡官协律郎试大理寺丞充幽州节度要籍李缙撰」

公讳邦穗，字归禾，宋戴公之后也。远祖自魏，近代复燕，国史具书，家牒明在。皇曾祖讳惠详，「幽州别驾、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皇祖讳威见，幽州步军将，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试太常卿。皇父讳文谅，使持节瀛州诸军事」兼瀛州刺史、充永宁军营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兰陵郡王、食邑三千户。」公即貂蝉之子、鹤鸽中五也。倾大中八年春，故使忠烈公赠太尉清河张公之嘉命。曰：「乐氏世燕

上将，代袭专城，名早振，家誉多成。国雅钦贵，胤宜结好。仇乃因语水，请然」懿援。公才逾弱冠，择为「燕国之东床。释褐簪裾，遥摄渔阳之典午。九年冬，改」职亲事、虞侯。十年春，加近卫三阶。是年秋八月，迁署节度押衙。冬十二月，旨援中」散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守蓟州司马兼监察御史。十四年冬闰十月，敕告节度押衙、檀州长史兼殿中侍御史、中散如故。咸通三年秋九月，奏旧职，遥摄」防御军使、守妫州别驾、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四年秋七月，「自武幕遥典归顺州。六年夏六月，州迁摄改遥拟漳施，爰及岁终守莫州刺史、」妫州别驾兼御史中丞。九年，更牒假郡蓬瀛。十二年秋八月，剖竹于归顺州充营田等使，其官级等革也。闰八月，宠命游及，守瀛州刺史、妫州别驾兼御史大夫。冬十乃移任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及银青阶，行人、亚相并如」上。咸通十三年春，忠烈公薨，二月十一日，公辞禄居闲，乃遥上佐。」千符四年夏五月廿二日，在疾奄然就木于蓟县界东通闾里之私第，寿止」五十有一。塋以中和二年岁在摄提二月十二日，葬于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原先塋西北之礼也。夫人清河张氏，即「故使忠烈公太尉之仲女也。自」降名门道光，诗载比尊，今重莫设纪尘。公有二子：长曰藏湏，褫褐一摄」瀛郡都官，投笔三迁，至亲事，将已孤之浚起伍涿参。次曰藏清，曾遥檀州散掾。」室女二人：圣儿、杜师。孙四人：霸郎、颢郎、婆郎、贵郎。孙女一人净师。」公性抱谦、温仪而端伟，升说赋命始终吉人。枢既封，崇即成。楸枰记陵



唐乐邦穗墓志拓片

未谷，口石玄堂。铭曰：

家隆盛德，代有奇人。始魏终赵，复燕口秦。拔贤流哲，清旧风新。权传皂益，逢拥朱轮。门多贵聘，地广嘉姻。悲公万寿，早免为邻。房仙之麓，乘水之滨。真真泉户，蒿蒿陇尘。勒其琬琰，铭此岁辰。永期嗣续，虞以田薪。都勾当采石携字作头，杨元会刻工。」中和二年二月十一日前摄涿州参军、试左监门卫、兵曹参军，男 藏湔书。」

一、撰文、书丹、刻工者

撰文者李缙，署“前义武军节度巡官、协律

郎、试大理寺丞、充幽州节度要籍”。前义武军节度巡官，《唐会要》七八：“易定节度使……置永清军，建中三年（782年）召其军曰：义武”。^②据《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五月辛亥，易定节度赐名义武军”。^③又《旧唐书·地理志一》：“义武军节度使，治定州，领易、祁二州”，^④《新唐书·方镇表》同。节度巡官，《新唐书·百官志四》：“节度使下有巡官一人”。^⑤协律郎，正八品上。试大理寺丞，从六品上。均见《旧唐书·职官志三》。幽州节度要籍：“节度使……要籍一人”，^⑥见《新唐书·百官志四》。

书丹者乐藏湔即乐邦穗长子，署“瀛郡都



官……涿参”。瀛郡即指河北道的瀛州。《新唐书·百官志》载：刑部有都官主事、都官令史等，这是中央官职。这里疑“瀛郡都官”即为“瀛州司法参军事”，从七品下。“涿参”即河北道涿州参军的简称，从八品下，见《旧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百官志四》。文末乐藏湓还署“前摄涿州参军、试左监门卫、兵曹参军”，《新唐书·百官志四》载：十六卫有左右监门卫，署掾有兵曹参军。《旧唐书·职官志三》：“诸卫兵曹参军，正八品下”。^⑦试官为非正式任命。次子乐藏清署“檀州散掾”。散掾，应为推官、衙官，州衙等职。

刻工者杨元会，署“都勾当采石携字作头”。都勾当，即总处理。唐大和八年（834年）“以权勾当幽州兵马史元忠为留后。”^⑧唐开成五年（840年）“正月，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⑨的记载，均见《两唐书·文宗纪》。勾当犹之处理，作头即为工头。此类名称，在晚唐已经普遍使用，杨元会也因此留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乐志的撰文、书丹、刻工者在整个篇文中，对乐氏家族都极为尊重并进行了避讳。如：邦穗的“穗”字缺笔，祖“威见”的“见”字缺笔，父亲“文谅”二字均缺笔，这些都充分表现为乐志是晚唐时期的作品。铭曰的“日”字作“日”字，犹存晚唐的风格（缺笔文字见原墓志拓片）。

二、乐邦穗祖籍及前三代事迹

墓志云：乐邦穗为“南阳乐公”、“宋戴公之后”。据《元和姓纂》，乐姓是“宋微子之后，戴公生子衍，字乐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后汉乐干自赵徙南阳”。^⑩因以称望，这与墓志记载相吻合。即乐邦穗祖籍是为山南东道邓州南阳郡，是以宋戴公后人的字为姓氏的。

乐氏家族世代为唐幽州地区的高级官吏，志石中详细记载了乐邦穗前三代的官职。曾祖父乐惠详，任“幽州别驾、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幽州别驾，即幽州大都督府别驾，正四品下。正议大夫为文散官，正四品上。检校太子宾客为东宫官，正三品。检校是加官，非实职。御史中丞为职事官，正四品下。赐紫金鱼袋，唐制，三品以上金饰袋，景龙中始佩鱼，见《旧唐书·舆服志》。上柱国是为勋官，正二品。

祖父乐威见，任“幽州步军将，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试太常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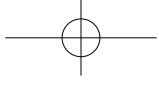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幽州步军将，应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下自设的地方官职。云麾将军为武散官，从三品上。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十六卫有左右金吾卫，设有大将军职，正三品。员外置同正员，其禄俸赐与正官同，详见《通典·职官典》。太常卿即太常寺卿，正三品，“试”即未正式授予的。试官起于武则天时期，见《文献通考·职官考》。

父亲乐文谅，“使持节瀛州诸军事兼瀛州刺史、充永宁军营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兰陵郡王、食邑三千户”。使持节瀛州诸军事、瀛州刺史，从三品，见《新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百官志四》。充永宁军营田等使，唐初曾把全国划分为十道，范阳道下辖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远、保定十六军。天宝年间在河北道设立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治幽州，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91400人。设立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37500人。皆未见永宁军。在北京出土的唐开成三年《周元长墓志》中曾出现“署永宁军副”称谓，详见《唐周元长墓志考释》。^⑪《北京房山石经题记》第三部分（诸经题记）《大金色孔雀王咒经》载：“使摄瀛州刺史永宁军营田团练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李行琮”。^⑫可见瀛州确有永宁军，可补史阙。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检校右散骑常侍，中书省右散骑常侍与门下省左散骑常侍所等同，正三品下，见《新唐书·百官志二》。兰陵郡王，唐封爵九等，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户，从一品。三曰国公，食邑三千户，从一品。此志记郡王“食邑三千户”与史异。而唐代爵位无兰陵郡王，兰陵郡系隋以前的旧郡名，西晋时从东海郡分出一部分，置兰陵郡，治所在丞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镇），隋时废此郡。

三、乐邦穗事迹及官职

根据上三代在幽州地区的官职，故墓志云：乐邦穗“世燕上将，代袭专城”，又因其父乐文谅曾官居“右散骑常侍”，故志又称乐邦穗“貂蝉之子”。显庆二年（657年）“散骑常侍分左右，隶门下、中书省，皆金蝉、珥貂”，^⑬后人就把“金蝉、珥貂”简称为“貂蝉”。

墓志云：“故使忠烈公赠太尉清河张公”，这里“忠烈公太尉清河张公”即是指当时的幽州卢龙节



度使张允伸。“允伸字逢昌，范阳人也……世仕幽州军门……大中四年（850年）冬，诏赐旌节（节度使）……咸通十三年（872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册赠太尉，谥曰忠烈”。^⑧张允伸任幽州卢龙节度使二十三年之久，史与志相合。而张姓出自河北道贝州清河郡，见《新唐书·地理志三》。《元和姓纂》称：张姓十四望，第一出清河。史与志相合。

墓志云：“公才逾弱冠，择为燕国之东床”。系指张允伸把乐邦穗择为佳婿一事。张允伸“咸通九年（868年），累加至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燕国公。”^⑨故称邦穗为“燕国之东床”。

墓志云：乐邦穗于大中八年（854年）“遥摄渔阳之典午”即蓟州司马，遥摄犹遥领。大中九年（855年）“冬，改职亲事、虞侯”。《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记载节度使下设有亲事一职，其职责是在政府部门中办具体事务。“六品七品子为亲事，八品九品子为帐内，限年十八以上举诸州，共率万人为之”。^⑩《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五年条胡三省注曰：“亲事，常在左右者，今宰执侍从，犹有亲事官”。^⑪虞侯，原为掌水泽出产之官。《左传·昭公二十年》载：“蓺泽之薪蒸，虞侯守之”。^⑫西魏时曾置虞侯都督，后世沿袭。隋时为东宫禁卫官，掌侦察、巡逻之任。唐代后期，各藩镇以亲信武官为“都虞侯”、“虞侯”，是为军中执法的长官。

墓志云：乐邦穗自大中十年（856年）冬十二月至十四年（860年）冬闰十月“迁署节度押衙、中散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守蓟州司马兼监察御史”。中唐以后，节度使下有押衙。唐末，押衙可充任都虞侯、都兵马使、都押衙、镇遏使、都指挥使、军使等官，“押衙”表示军将在藩镇军内的位阶，或是参与军政庶务的吏职。中散大夫为文散官，正五品上。“蓟州渔阳郡，下。开元十八年（730年）析幽州置”。^⑬下州的司马品秩为“从六品上”。^⑭邦穗充蓟州司马长达近4年之久。监察御史为职事官，正八品下。

墓志云：乐邦穗大中十四年（860年）“冬闰十月，敕告节度押衙、檀州长史，兼殿中侍御史、中散如故”。檀州长史，从五品上，见《旧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百官志四》。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见《新唐书·百官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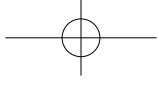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墓志云：乐邦穗咸通三年（862年）“秋九月，奏旧职，遥摄防御军使、守妨州别驾、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幽州范阳郡昌平

县“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款关，即居庸故关，亦谓之军都关。其北有防御军”。^⑮邦穗任此使，地接妨州。防御军使，“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⑯志与史合。按1978年在延庆县谷家营村出土《唐张乾曜墓志》云：张氏“至元和八年正月六日歿于任所之私第。以其年三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迁柩于军之西南五里古原，礼也”，^⑰即葬于防御军防城西南五里。由此可以证明今延庆县谷家营东北五里即为唐幽州防御军所在地。妨州别驾，从四品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从三品。侍御史，从六品下。

墓志云：乐邦穗咸通四年（863年）“秋七月，自武幕遥典归顺州”。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归顺州……怀柔，州所理也”。^⑱

墓志云：乐邦穗咸通六年（865年）“夏六月，州迁摄改遥拟淳沔，爰及岁终守莫州刺史、妨州别驾兼御史中丞。假郡蓬瀛”。淳沔，今作淳沱。“淳沔水东至参户入淳沔别，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从河东至文安入海，过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⑲《旧唐书·地理志三》：河北道莫州文安郡，上。《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州刺史，从三品。遥拟淳沔，言为将任莫州刺史。

墓志云：乐邦穗“秋八月，剖竹于归顺州充营田等使……闰八月……守瀛州刺史、妨州别驾兼御史大夫。冬十乃移任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及银青阶，行人、亚相并如上”。御史大夫，正三品，见《新唐书·百官志三》。威武军营田团练使，檀州有威武军，见《唐会要》七八、《新唐书·地理志三》。营田使，《新唐书·百官志四》：“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唐六典》卷七“屯田郎中”云：“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其后注云：“幽州五十五屯，清夷一十五屯，北郡六屯，威武一十五屯，静塞二十屯，平川三十四屯，平卢三十五屯，安东一十二屯，长阳使六屯，渝关一十屯。”可知驻扎在檀州的威武军，不仅设有营田使，而且还有屯田一十五屯。防御团练使，“至德后，中原置节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上元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宝后置，未见品秩”。^⑳行人，周官秩亦有行人，掌聘局；亚相，汉制，丞相空缺，常以御史大夫递升，唐以后常称御史大夫为亚相。



在乐邦穗历次官职升迁中，曾经两次治理归顺州（详见附表）：一次自咸通四年（863年）六月，历时二年。另一次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至闰八月，仅两月，并且充当“营田等使”。《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中曾记载：“归顺州，今理怀柔县……自安禄山之乱，此地因陷入胡”。^⑨而今据墓志记载，乐邦穗在咸通年间，还曾经两次治理归顺州，由此可证归顺州并未陷于胡。又“允绅领镇凡二十三年（自大中四年至大历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军民用义。至今谈者美之”。^⑩这里似可以包括乐邦穗所治理的归顺州在内。志文牵涉幽州的古文献，足以证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不甚可靠，志文内容可补史阙。

乐邦穗亦曾两次治理瀛州（详见附表）：一次是自咸通九年（868年）至十二年七月，历时三年七个月；另一次是自咸通十二年闰八月至九月，仅充当瀛州刺史两月。乐邦穗还曾三次充任“妫州别驾”（详见附表）：一次是自咸通三年（8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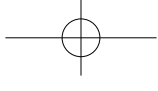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于檀州长史任内；二次是在咸通六年（865年）于莫州刺史任内；三次是在咸通十二年于瀛州刺史任内。三次充任妫州别驾皆是在任其它州职官时兼任的，这就远远超越了其区域范围，而这种任职方式在军事上就构成了东西或南北呼应的有利态势。从地理方位来看，妫州（今北京延庆一带）位于幽州之西北；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位于妫州之东，幽州之东北；瀛州（今河北河间一带）、莫州（今河北任丘一带）皆位于幽州之东南；这些州成为环绕幽州从西北到东南一个半圆弧状的防线。这种布防其主要目的：一是对外凭借幽州从西北到东北的山峦天然屏障、扼守重要山口来防御东北方的契丹等族南下侵扰；二是对内占据重要据点来防备河北及中原（这时太原李克用势力开始强大，窥视幽州地区）其它割据势力对幽州地区用强。据此，可以窥见到藩镇割据时期，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军政部署是自成体系的，这种统一的军政指挥系统，完全是为了战时的需要，且具有很强的军事特色。

附表：唐乐邦穗生平年表

年号	公元	岁数	事 迹
大和元年	827年	1岁	乐邦穗生
大中八年	854年	28岁	公才逾弱冠，择为燕国之东床，释褐簪裾，遥摄渔阳之典午。
大中九年	855年	29岁	冬，改职亲事、虞侯。
大中十年	856年	30岁	秋八月，迁署节度押衙。冬十二月旨授中散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守蓟州司马、兼监察御史
大中十四年	860年	34岁	冬闰十月，敕告节度押衙、檀州长史、兼殿中侍御史、中散如故。
咸通三年	862年	36岁	秋九月，奏旧职，遥摄防御军使、守妫州别驾、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
咸通四年	863年	37岁	秋七月，自武幕遥典归顺州。
咸通六年	865年	39岁	夏六月，州迁摄改遥拟潯洳，爰及岁终守莫州刺史、妫州别驾、兼御史中丞。
咸通九年	868年	42岁	假郡蓬瀛
咸通十二年	871年	45岁	秋八月，剖竹于归顺州充营田等使，……闰八月，……守瀛州刺史、妫州别驾、兼御史大夫。冬十乃移任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及银青阶，行人、亚相并如上。
咸通十三年	872年	46岁	春，忠烈公薨，二月十一日，公辞禄居闲。
乾符四年	877年	51岁	夏五月廿二日，在疾奄然就木于蓟县界东通闾里之私第，寿止五十有一。
中和二年			二月十二日葬于幽都县房仙乡庞村。

墓志云：“咸通十三年春，忠烈公薨，二月十一日，公辞禄居闲”。史载张允伸“咸通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卒”，^⑪《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十三年春正月……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燕国公、食邑三千户张允绅卒，赠太尉”。又记“二月，幽

州牙将张公素夺留后张简会军政，自称留后”。^⑫乐邦穗因张允伸死后一月，张公素逐张允伸之子张简会军政，自称留后，无奈只好辞官回家。《新唐书》则云：咸通十三年二月“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张允伸卒，其子简会自称留后。三月癸酉，平州刺史张公素逐简会，自称留后”。^⑬这里将正月允



伸卒误记为二月，将二月张公素自称留后误为三月，应据志正史。

墓志云：乐邦穗于乾符四年（877年）“在疾奄然就木于蓟县界东通闾里之私第”，可知唐幽州城的二十六坊，有东通闾里（坊）且在蓟县。“葬于幽都县房仙乡庞村”，即今地石景山区东南的庞村。该村名虽历经千余年，其后始终未曾改变过。而“房仙乡”乃为唐幽州幽都县的十二乡之一，其铭词云“房仙之麓”，可能就包括今天的石景山在内。在唐、辽时期，现今石景山的广大区域都为房仙乡管辖，这在北京出土的辽代天庆四年（1114年）《王师儒墓志》中也有“归藏于县房仙乡池泉里”的记载。^⑨此地即今天的公主坟附近，房仙乡的区域范围或就始于唐代。其铭词曰“桑水之滨”，即是指今天的永定河，在唐称谓桑干河。而今天的庞村仍在永定河的东岸，变化不大，这为考察永定河故道提供了宝贵资料。

综上所述，乐邦穗任职的一生，始终得到岳父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允伸的庇护和提拔，服官近20年，自亲事、押衙直至升迁到三品官。在一生的转职、兼职的过程中，似明白地显示着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在统治幽州的政治、军事、生产及防务上，是以调遣内亲来协助自己统治的。因之自咸通三年起，邦穗或遥摄军务，或遥典归顺州，或假郡蓬瀛，又三度任妫州别驾，这些官职都是东西或南北兼顾，并打破区域限制的。所有这些，证明幽州在藩镇统治下，官员任职与分布是另有它独特体系与根据的，形成了中央政权以外的地方性与特殊性。然而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节度使张允伸还是一位比较恭顺的藩将典型。他对属下官员的任命，均采取的是地方来办理，中央来追认的办法。如：大中十年八月，邦穗迁署节度押衙，十四年闰十月敕告节度押衙；咸通九年更假郡蓬瀛，十二年闰八月守瀛州刺史等等。这些任命皆是地方在先，中央在后，但是并未发生过地方与中央的龃龉。从这里来看，乐志又可以成为晚唐边镇史和幽州史的实物例证，对今天北京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唐乐邦穗墓志》拓本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资料室有收藏，现收藏地点不详。

②《唐会要》卷七八，中华书局1955年第1版，第1432页。

③《旧唐书·德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3页。

④《旧唐书·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1页。

⑤⑥《新唐书·百官志四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09页。

⑦《旧唐书·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22页。

⑧《旧唐书·文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6页。

⑨《旧唐书·文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9页。

⑩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89页。

⑪《唐周元长墓志》，1956年在北京市西城区旃檀寺西街出土，缺盖，志石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志系青白石制成，长、宽均为63厘米、厚112厘米。正书，25行，每行40至44字不等。陇西李掖撰并书。志石四侧刻有花纹，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上石。其墓志考释见拙文1994年第九期《首都博物馆馆刊》。

⑫《北京房山石经题记》第三部分（诸经题记）《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⑬《新唐书·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6页。

⑭⑮《旧唐书·张允伸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79页。

⑯（唐）杜佑撰：《通典·职官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

⑰（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⑱（春秋）左丘明著：《左传》昭公二十年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页。

⑲《新唐书·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22页。

⑳《新唐书·百官志四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18页。

㉑《新唐书·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20页。

㉒《新唐书·百官志四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10页。

㉓《唐张乾曜墓志》，1978年在延庆县谷家营大队出土。志高47、广48厘米，志石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㉔《旧唐书·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20页。

㉕《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22页。

㉖《旧唐书·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23页。

㉗《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金陵书局刊行光绪八年五月版。

㉘②《旧唐书·张允伸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79页。

㉙《旧唐书·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79页。

㉚《新唐书·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3页。

㉛《辽王师儒墓志》，1957年复兴门外公主坟出土。墓志原文见北京市文物局、辽金城垣博物馆编辑《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策划交流部副研究馆员）



元贞元年大都路造铜权斤半锤八思巴文



对元大都出土八思巴字文物的思考

张秀荣

元朝自忽必烈选定燕京，蒙古的统治中心建立在元大都后，便进行修筑交通道路、建立漕运、海运运输线和驿站设置等建设，在教育方面，除设立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外，还创制了拼音文字即八思巴字。纵观我国几千年文化，八思巴字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地区陆续发现八思巴字文物，该字是元代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以藏文为基础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现称八思巴字或方体字，并于1269年（至元六年）正式颁布执行。八思巴字具有“国书”的官方地位，其文字替代了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并用它译写一切文字。据历史文献记载，八思巴为“吐蕃萨斯迦人……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①。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②。八思巴字体多数字母仿藏文体式，呈方形，少数字母采用梵文天城字母，因译各种语言的需要，字母由原来的41个，增至57个。八思巴字有正体（楷书）、篆体、双钩体三种书写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正体，多用于记录各种事务；而篆体具有整齐、对称、均匀、饱满等特点，一般用于官印、碑额等，有时在碑刻的边框左右两侧有双钩体的八思巴字出现。八思巴字既能译写汉语、藏语、蒙古语，也能译写

梵语、维吾尔语等，亦包括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八思巴字于元王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目前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有：

1、居庸关云台的八思巴字

北京昌平区居庸关内有座创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的“云台”，当时台上建有三座并排而立的白色藏式佛塔，台正中为通向南北的门洞，人们称其为过街塔。遗憾的是塔在元末明初全部被毁，现只剩下石台，故人们又习惯称它为“云台”。它是元代留下的珍贵的历史遗物，早在1961年3月，便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上部宽25.21米；下宽26.84米，通高9.5米。至今上面还保留着造型别致，图案精美的雕刻。尤其是券门内两壁浮雕的四大天王之间，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③的略写部分。虽经六个多世纪风雨的侵蚀，但字迹依然清晰，其中的八思巴文（见图一）保存得也十分完整。

2、瓷碗底部的八思巴字

1970年在北京旧鼓楼大街发现一窖元代瓷器，共藏有青花、影青瓷器16件。其中两件影青瓷碗的底部，均有一墨书八思巴字。根据南宋末年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中《蒙古字体·百字姓》，译成汉文为“张”或“章”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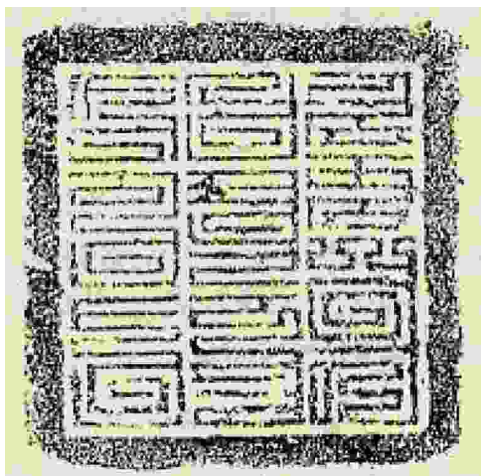
3、“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八思巴字官印

1965年，在北京明代的北城墙夯土层中发现一枚八思巴文官印。其印为铜质，正方形，每边各长7.6、厚0.8厘米，印把呈椭圆形，三行共九字，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对音释读为“ti gen zu



文物研究

lu tun heun baw caw jin”，即汉字是：“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见图二）。此印的字体为八思巴字的一种篆体，是摹仿汉字的篆体而成的，但篆法与汉字篆体相比有些出入，松散而不太规范。根据历史学家们的推测，这枚铜印应是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后被遗弃之物。这枚“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为元代主管各路通行宝钞的官印。《元史·百官志》中记载，诸路宝钞提举司，属户部，设“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都提举一员，正四品；副达鲁花赤一员，正五品；提举一员，正五品；同提举二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国初，户部兼领交钞公事。世祖至元，始设交钞提举司，秩正五品”。至正二十四年（1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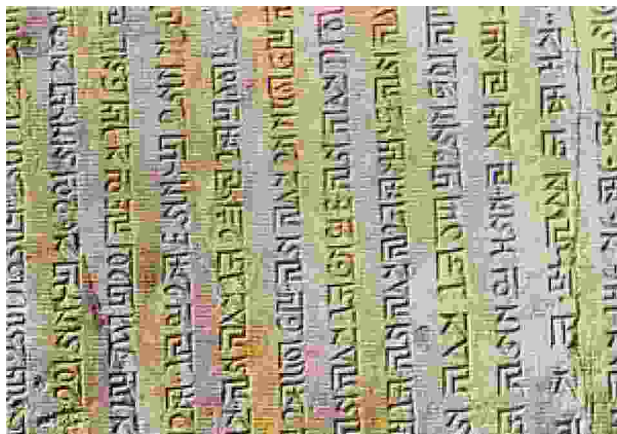


图二 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八思巴文印

年），“改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升正四品，增副达鲁花赤、提控案牒各一员”^④。元代于至元三年（1266年）开始设“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之官，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为“诸路宝钞都举司”。依据资料记载，元代确有此官制度，其印经专家鉴定亦是真品。

4、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桦皮厂北口的明代城墙地基处，发现了一块66公分见方的万宝寺庙产执照刻石。石上刻有德如“自备囊资，买到大都在城永福坊南街北白地一段，创建万宝寺一所。……今后但有亲徒弟人等，并不得争执”字样^⑤。依据执照所记，这是元至大四年（1311年）诸路释教都总统付给万宝寺住持德如的庙产执照。其执照的纪年上是一方仿刻八思巴字的印。虽字迹已漫漶，无法释读，但可以确定它是三行篆体八思巴字无疑。

5、铜权上的八思巴文



图一 居庸关云台门洞内的八思巴文

近年来，市文物管理部门在北京各区县征集10余枚元代的铜权。其中4枚铸有八思巴文字。

(1) 元贞元年（1295年）大都造铜权

权为略扁的六角形，通高11.2厘米，重933克。钮呈倒梯形方钮。上端略收，束腰，底座为六角形须弥座式，稍宽于权身。权身的正面中间部位铸“元贞元年大都路造”的汉字，左侧是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在背面的中间除铸有汉字“三十五斤秤”文外，还铸有八思巴文“斤半锤”。

(2) 元大德八年（1304年）大都路造铜权

此权与上述权形制相同，只是所铸斤两有所区别。权通高11.2厘米，重900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左侧为波斯文“三十五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斤半锤”；权背面中间铸汉字“三十五斤秤”与八思巴文“斤半锤”，左侧为波斯文“斤半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三十五斤秤”；铭文皆为竖行阴文。

(3) 元大德十年（1306年）大都路造铜权

其形制与元贞元年间权相似，略小。通高9.4厘米，重616克。权身正面中间铸“大德八年大都路造”汉字，左侧为波斯文“一十六斤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斤锤”；背面中间铸汉字“一十六斤秤”与八思巴文“一斤锤”，左侧为波斯文“一斤锤”，右侧为回鹘蒙文“一十六斤秤”；铭文为竖行阴文（见图三）。



图三 大德十年大都路造铜权斤半锤八思巴文



元代秤砣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但标明称量和砣重的并不多，而在北京就发现了3枚，实属珍贵。用标明有定量的砣，可为人们使用带来方便，也有利于保证称量的准确。

(4)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制造“云需总管府较”铜权

该权通高9.5厘米，重598克。形制与元贞元年权略同，权身正面铸“至正十二年正月造”汉字。左侧铸汉字“三十五斤”；背面铸汉字“云需总管府较”，在权钮的顶端铸有八思巴文。这枚带有“云需总管府较”铭文的铜权，为首例，以往未曾发现。这里的“较”通“校”，其意为此权是经过“云需总管府”的校正，可大胆放心的使用。据《元史·百官志》的记载，可知“云需总管府”于元“延祐二年(1315)置”，为“秩正三品。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元世祖建行宫于此，在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及行营供办之事”，由达鲁花赤、总管等8人组成。

在北京发现带有八思巴字的文物还很多，如1970年，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路北出土一“威州军兵千户印”^⑥及北京地区发现的“至正十年五月造，房山县务之印”、“昌平站印”^⑦、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多种形状的八思巴文印章^⑧、唐代阎立本《步辇图》上面，经元代人收藏所留下两枚至元、至治年间的八思巴文印^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资料中心存影印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八思巴文钱币等，上述文物虽然有的出土地不详，但现存北京，这对了解元代的文化，用以丰富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为广泛推广使用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元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一，设立专门机构，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

元时设立蒙古翰林院是专“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⑩的文化机构。当时元朝政府将全国著名的文人学者聚集在翰林院。他们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敕令以及编写官方各种重要文件、历朝帝王的实录，以及后妃、功臣列传的修撰等。蒙古翰林院还将各种汉文经典著作翻译成八思巴字著作，以供各朝蒙古帝王学习使用。隶属于蒙古翰林院的蒙古国子监就是专门负责教授蒙古国字。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建“立诸路蒙古字学”^⑪，即在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字学科。至元七年(1270年)，又“设诸路蒙古字

学教授”^⑫。至元八年(1271年)，开始设立新字学士于国史院。忽必烈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⑬。这样，蒙、汉、色目官僚子弟都可入学、专门学习蒙古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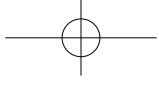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其二，对使用八思巴字亲下诏书。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七月，忽必烈对虎符文字改用八思巴字的使用，曾下诏书令认真执行。诏书言：“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⑭。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五月，又对中书省云：“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⑮。对各个衙门使用的印明确规定，“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用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⑯。有元一代，凡是诏令、公文、印章、牌符、钱币等都必须使用八思巴字。由此得知，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必须学习八思巴字，否则对国家的法令、政策以至钱币的使用都将带来巨大的困难，从这点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推行使用八思巴字态度的坚决。

其三，利用地形，推广宣传八思巴文。

居庸关城中坐落着一座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建造时间最早的过街塔座。明代末年毁于地震，后又修建了佛教寺庙，清康熙年间，寺庙亦毁，便留下现存的塔座。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塔座的正中开着一个贯通南北方向的门洞，它是中原与大都城去往张家口、大同及内蒙古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的重要交通要道。那时，无论皇帝、高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过街塔是他们南去大都，或华北平原，以及大都及华北平原去塞外、内蒙古的必经之路。每天行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塔下的过街洞内的墙壁两头，用八思巴文、汉文、梵文(古尼泊尔文)、西夏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等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除此之外，还有用八思巴、汉、藏、西夏、维吾尔等文字刻写的《造塔功德记》，六种文字同时出现在这通道内，它既反映了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反映了元代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而八思巴字虽晚于其他几种文字的创制，但却同时出现在这里，也说明当时元代的统治者对推行普及八思巴字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即利用地形加大宣传，扩大影响。

对元代的统治者为何要在这里修过街塔，缪



荃荪于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中引《松云闻见》讲：“……关旧无塔，玄都百里，南则都城，北则过上京，止此一道。”元代的皇帝及皇亲国戚，“每岁之夏，车驾清暑泮京，出入必由于是”。尤其是元顺帝继位以来“频岁行幸，率遵祖武”。于是在一次过居庸关时便“揽辔度关，仰思祖宗勘定之劳，俯思山川拱抱之壮，圣衷惕然，默有所祷”。为表示对神明的报答与崇拜，面谕近臣“建塔宝”。其实真正建塔的原因，正如元时的欧阳玄所说：“自古帝王之建都也，未有不因山河之美以为固者也，然有形之险，在乎地势，无形而固者，在乎人心，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以固人心为先。固之之道，惟慈与仁，必施诸政，是故使众曰慈，守位曰仁，六经之言也”^⑧。元顺帝在居庸关重要的关口建过街塔，既在乎人心，又在乎地形之险。以佛经稳定人心，使全国不同民族的百姓都安心于元朝的统治之下。用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也说明了这一点。经咒中载：“持此陀罗尼者，一切罪恶皆不能染。……书此陀罗尼安置幢上，树于高山或高屋上，及余高处或浮图中，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善男子善女人等。见此陀罗尼幢，若近幢若幢影沾身若幢风吹身。……罪业便消。……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罪灭福增众人爱敬，命终之后生极乐国”。^⑨由此看来，在过街塔中刻写佛经的目的正如经中所言“于四衢道造塔，安置此陀罗尼行道顶礼，当知此辈是摩诃萨（摩诃萨为佛教术语，是摩诃萨埵的略写，为众生之意）”^⑩。其目的是让人们们对佛的经典要顶礼膜拜。凡是经过这里就如同诵了经，拜了佛，但在笔者看来，加强统治，以佛定心是一方面，而利用居庸关的特殊地形和交通要道来宣传推广八思巴文是又一个主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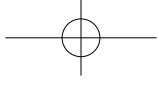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三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出土的八思巴字文物，以及博物馆等一些单位收集珍藏的共计约有数十件，其他省市地区无论在种类及数量上均不能与之相比，如河北省出土二件^⑪。湖北、江苏、河南、广东、温州等地只出土、或发现一件。为什么在北京地区会出土如此多的八思巴字文物，而其他地区则不能。再有，元世祖规定八思巴字是“译写一切文字”，为什么没能代替汉字。另外，蒙古原有回鹘式蒙古文字，为什么又创制八思巴字，将其取代，这些问题我们从元朝历史客观地进行

分析就会得到解决。

首先，北京（即当是的元大都）是元朝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元朝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其政权统治的范围广，影响大。中央文化机构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都设在大都，各种宣传教育机构健全，便于推行皇帝的指令，而元世祖的“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⑫的诏书就是通过这些机构传递、下达到全国各地的。因此说大都地区在执行元朝的方针政策方面都会比其他省市贯彻执行得及时、全面彻底，影响力也比其他省市地区要大的多。毋庸置疑，反映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带有八思巴字的各种器物多，也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这或许就是大都的八思巴字文物多于其他省市的其中原因之一。

其次，创制国家各民族统一的文字。蒙古为什么废弃原创的回鹘（古代维吾尔）式蒙古文，又新创八思巴文？是不是蒙古文字的历史久远需要更新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早期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贵族首领，“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对文字并没有要求。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与金及宋使用汉文，与中亚往来使用波斯文（回回字）。南宋使臣许霆在窝阔台时期出使蒙古，他目睹这一状况云：“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刺楚才主之”^⑬。依许霆所言，说明当时的蒙古还处在刻木结绳记事阶段，他们若与中亚地区往来时用回回字，与回鹘、西夏交往时用畏兀字、西夏字，惟独没有自己的文字。后因汗国迅速的发展与军政事务的日益繁多，他们才感到文字的重要。成吉思汗便令俘虏乃蛮部落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令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⑭。塔塔统阿后又遵照成吉思汗的指令用畏兀文字拼写蒙古文字（称回鹘式蒙古文），用以记录军国要事，以解燃眉之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显示自己地位的至高无上，并



认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创制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字，才能显示出国威，若不是这样，便是“一代制度”的重要缺陷，会严重地影响元朝的威信，因此必须用新的文字去代替回鹘式的蒙古字，因为回鹘式的蒙古字只能用于本民族，蒙古若想统治其他民族，就必须创造一种别的民族都能用的文字，于是八思巴奉命去创蒙古新字。经过几年的努力，八思巴以西藏文字为基础，经加工，改造成蒙古新字，新型文字既是民族文字，又是国家文字，并有国书的地位，以他取代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其字不久又改称“蒙古字”，元末明初称其为“蒙古国字”，近代学术界称其为“八思巴字”。

第三，八思巴字因为本身原因无法代替汉字。八思巴字是一种拼音文字，又是一种没有声调的拼音文字，而汉字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而且汉语又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每一个字都有一定的意义，一句话读音不同，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不同，八思巴字恰恰不能解决汉字的读音问题，更不能记录汉语的声调，况且汉语又有丰富的同音词和多音字，八思巴也没有规定区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此用八思巴字译写出的汉语是无法阅读的语言，这样自然而然被淘汰，最后成了一种死的文字。

蒙古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既提高了本民族的地位与威望，也有利于与其他国家及民族的联系、往来和交流，尤其在指导和治理国家方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蒙古族所创制的八思巴字其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四

创制于13世纪60年代的八思巴字，不仅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而且在元大都地区推行传播还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元大都是首善之地，中央的重要政治文化机构都设在元大都，它更是全国政治经济及国内外文化融合的中心。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人口。聚集在这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必须需要语言文字，而八思巴文在人口如此集中的大都地区能名正言顺地推行，这也是其它任何城市无法做到的。大都成为传播各种文化的载体，同样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八思巴文传播到全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国。

八思巴字虽推行使用只近一个世纪，但意义极其深远。八思巴字的创制是蒙古族在历史上所

立下的伟大功绩，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创制是蒙古在文字学与语言学方面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它的产生促进了当时民族间的了解，也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交流及发展。元代所留存下的八思巴字遗物是我国文化的宝贵财产，对研究元代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都有益处，对于印证和补充史料也是极为难得的资料。

①②《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③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④《元史》卷85《百官一》，中华书局，1976版。

⑤⑥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6期。

⑦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⑧叶其峰：《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10期。

⑨《唐阎立本步辇图》，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⑩《元史》卷87《百官三》第2190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⑪《元史》卷6《世祖三》第122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⑫《元史》卷7《世祖四》第129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⑬《元史》卷81《选举》，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⑭《元史》卷10《世祖七》，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⑮《元史》卷13《世祖十》，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⑯（明）叶子奇：《草木子·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

⑰《金史》卷101《李英传》，中华书局，1975年7月版。

⑱缪荃荪：艺风堂抄本《顺天府志》卷14《昌平县·关隘》条引《松云闻见》。

⑲⑳（唐）杜行顼译：《大正新修大藏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华书局，1975年7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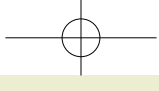
㉑焦彦龙：《河北平山县出土两方八思巴文官印》，《考古》，1982年5期。

㉒《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㉓（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

㉔《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中华书局，1976年4月版。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馆员）



浅析

“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

庾 华

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藏经楼一层展厅展出了一些堪称精品的古钟，其中一件铜钟工艺精美，保存完好，颇有特点。铜钟通高 124.5cm，口径 89.5cm，重量 514kg，钟钮为常见的双龙蒲牢造型，两条龙的龙头相背，龙身上下交叠缠绕在一起，两条龙的尾部分别缠绕于对方的左前肢上，双龙身体区分明显，均为五爪龙，前肢有两趾铸于钟顶内，三趾头与钟顶之间有空隙，龙面的额头、眉间、鼻头、上唇均有凹点纹。两个龙头的龙须都有残缺，钟钮向上弯曲的弧度很小，龙身略显平直。钟顶呈圆弧形，布满铭文，共计 104 字。钟肩浑圆，装饰了一周莲花瓣，共计 28 朵，在每个莲瓣内分别铸写一个汉字，共计 28 字。莲瓣上有两道、下有一道凸弦纹。铜钟表面没有用来划分区域的线条，整体铸满铭文，文字排列顺序为自右向左、由上至下环绕钟体排列。在钟体上部铭文起始处有一个莲花座的牌位，牌位上有铸造年款：“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即该铜钟铸造于公元 1492 年 5 月的某个吉日。钟体下部均匀地分布着八卦符号，钟体的裙部（钟体接近底口的部位）呈喇叭状外敞，似一条微微凸起的宽带缠绕钟口一周，钟裙上密布着篆书体文字，四个圆形钟月（钟的撞击点）微微凸起，分列四方。钟口为八耳波弧状。这件铜钟铸造工艺精湛，不仅造型、装饰风格、铭文内容都有别于北京地区同时期铜钟，在中国寺观古钟中亦属罕见。（见图 1）

一、铜钟铭文

该铜钟的表面铸写了大量的文字，这些文字

不仅书写工整，疏密合度，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而且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珍贵的历史文献。经过辨认，我们发现铜钟上的所有铭文均与道教密切相关。依据文字内容和从上到下的排列顺序，我们可以将这些文字划分为钟顶、钟肩、钟体、钟裙四个组成部分。

钟顶铭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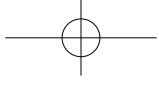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百字圣诰：混元六天传法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普为众生消除灾障八十二化三界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右垣大将军镇天助顺真武灵应福德衍庆仁慈正烈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

紧接着在钟肩上的 28 个莲瓣中分别铸写了 28 个汉字，7 字一组，分为 4 组，钟牌上方的莲瓣上为：井、鬼、柳、星、张、翼、轸。其余按反时针方向顺读，依次为：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

接下来铸写在钟体上的文字篇幅更长，几乎覆盖了整个钟体表面。铭文内容是三部道教经文，依次为：《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

其中《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位居钟体上部，篇幅最长，铭文为（原文无标点）：

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仰启玄天大圣者，北方壬癸至灵神。金阙真尊应化身，无上将军号真武。威容赫奕太阴君，列宿虚危分秀气。双睛掣电伏群魔，万骑如云威九地。紫袍金带佩神锋，苍龟巨蛇捧圣足。六丁玉女左右随，八杀将军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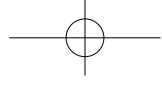
后卫。消灾降福不思议，归命一心今奉礼。

尔时，元始天尊于龙汉元年七月十五日于八景天官上元之殿，安详五云之座，与三十六大帝、十极真人、无量飞天大神，玉童玉女侍卫左右。一时同会，鼓动法音，天乐自响，大众欣然，咸听天尊说无上至真妙法。是时上元天官东北方大灵七声，天门忽开，下观世界，乃有黑毒血光秽杂之气，幽幽冥冥。从人间东北方直上冲天，盘结不散。大众咸惊，默然不敢议问。时会中有一真人，名曰妙形，威德充备，诸天尊仰。越班而出，执简长跪，上白天尊曰：“况此境清静太阳道境，何得有此黑毒之气盘结冲上，是何异因？惟愿天尊至圣为众宣说，绝其疑虑。”天尊告曰：“汝等妙行，能为众生发问是由，汝当复坐，静默安神，吾当为说。”天尊曰：“下元生人，皆秉清静氤氲真一之形，悉备三万六千神气，扶卫其身。今已阴阳数尽，劫运将终，魔鬼流行。信从邪道，不省本源。谄求余福，昏迷沉乱。不忠不孝，不义不仁。好乐邪神，祷祭魔法。今为六天魔鬼，杜（笔误，应为“枉”）所伤害，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未尽天年，横被伤杀。本非死期，魂无可托。鬼毒流盛，死魂不散，怨怒上冲，盘结恶气，汝当自知。”于是，妙行真人与诸大众闻是说，已心大惊怖。欲请天尊威光暂降下方，收除魔鬼，救度生人，拔济幽魂，去离邪横。大众怀疑未敢。天尊告曰：“不劳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大神将，号曰真武。部众勇猛，极能降服邪道，收斩妖魔。”真人上白天尊曰：“不审此位神将生居天界，修何道德为于神将？”天尊告曰：“昔有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娠，怀胎十四个月，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时，诞于王宫。生而神灵，长而勇猛，不统王之位，唯务修行，辅助玉帝，誓断天下妖魔，救护群品。日夜于王宫中发此誓愿，父王不能禁制。遂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登天，玉帝闻其勇猛，



图1 “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

敕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以断天下妖邪。”真人上白天尊曰：“如何得此神将，入于下方，收除魔鬼，救度群生，免遭横死，日有所益，伏愿大慈。”天尊遂其所请。天尊乃敕右侍玉童，驰诏真符一道，迳往北方，召其真武神将。其神蒙召，部领神众，迳往天尊前长跪：“臣已奉玉帝敕命，位镇北方。今日何缘得睹慈颜，特蒙符召？”天尊告曰：“吾于上元官中大会说法，忽下方黑毒怨气冲上天界。大众咸惊，汝宜往彼，收断妖魔，拔济魂爽。”真武神将敬奉天尊教敕，乃披发跣足，踏腾蛇八卦



神龟，部领三十万神将、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狮子、毒龙猛兽，前后导从，齐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时收断，人鬼分离，冤魂解散，生人安泰，国土清平。

真武神将与诸部众还归上元宫中，朝见天尊曰：“昨奉教命，往下方收斩妖魔，仗慈尊力，乃于七日之内，天下邪鬼并皆清荡。”天尊曰：“善哉！汝等诸神，得无劳乎？”于是真武神将乃交乾布斗，魁罡激指，上佐天关，而作咒曰：

“太阴化生，水位之精。虚危上应，龟蛇合形。周形六合，威摄万灵。无幽不察，无愿不成。劫终劫始，翦伐魔精。救护群品，家国咸宁。数终末甲，妖气流行。上帝有敕，吾固降灵。阐扬正法，荡邪辟兵。化育黎兆，邪赞中兴。敢有小鬼，欲来见形。吾目一视，五岳摧倾。”

急急如律令，奉礼咒曰：“太初太易，无象无形。莫知重浊，孰辨轻清。吾于混沌，分其昏明。天得以健，地得以宁。民得以养，物得以萌。邪得以正，神得以宁。三才之内，万类咸亨。大（笔误，应为“太”）朴既散，仁义乃兴。礼乐既作，奸邪斯行。六谊或失，四民有争。上不宽恕，下不忠贞。或魔或鬼，或妖或精。恣横荼毒，干扰生民。全家疾患，累岁官刑。财物耗散，骨肉伶仃。性命枉逝，灾恶相萦。秽杂之气，上达天庭。天尊有命，令与安平。有妖皆翦，无鬼不烹。瘟疫之吏，束手伏膺。鬼精灭爽，邪魔摧倾。吾有十万力士，五千万兵。天上天下，从吾降升。拒我者灭，奉吾者生。恶吾者辱，敬吾者荣。礼吾者寿，非吾者薨。吾有此令，人鬼咸听。”

急急如律令，又咒曰：“北方玄天，杳杳神君。亿千变化，玄武灵真。腾天倒地，驱雷奔云。队仗千万，扫荡妖氛。雷公侍从，玉女将军。鬼神降伏，龙虎潜奔。威镇五岳，万灵咸遵。鸣钟击鼓，游行乾坤。收补逆鬼，破碎魔军。除邪辅正，道气常臻。”

天尊告真武曰：“自今后凡遇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间，受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恶，修学功过，年命长短，可依吾教，供养转经。众真来降，魔精消伏。断灭不祥，过去超生。九幽息对，见存获庆，天下知（笔误，应为“和”）平。”尔时，妙行真人与诸天帝、无量飞天神王、真仙大众闻说，莫不欢喜踊跃。一时作礼赞叹功德：“我等今日蒙大法利益，请于人世，救护众生，令得免三灾患难。”各各受持，稽首奉行真武神将，再奉天尊敕，永镇北方。奉辞而退。《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竟。

紧接着是《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悟之者，可传圣道。老君曰：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上德不德，下德执德，执著之者，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著万物，既著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浊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仙人葛翁曰：吾得真道，曾诵此经万遍。此经是天人所习，不传下士。吾昔授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授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授之于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上士悟之，升为天官；中士修之，南官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长年。游行三界，升入金门。左玄真人曰：学道之士，持诵此经者，即得十天善神，拥护其身。然后玉符保神，金液炼形。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经，悟解之者，灾障不干，众圣护门。神升上界，朝拜高真。功满德就，相感帝君。诵持不退，身腾紫云。《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然后是《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

太上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道言：吾隐六合之内，处明堂之中，守炼精魄，自然冲冲，名达四远，万境咸通，开关之始，道之先宗，吾陈此经，说子之因，子须秘受，勿施于人，天有七机，亦有三光，斗应其机，光应其罡，斗有七孔，来应五藏，安静怕神，名正修养，耳则不可以乱听，眼则不可以视恶，鼻则不可以闻臭，口则不可以杂味，虚中三光，周流遍体，头以为天，足以为地，道法济人，自然之理。耳若乱听，声色败人，眼若视恶，其光不现，鼻若闻臭，玉真不清，口若杂味，



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见图2)

身多病生，是故病从口入，福从色败，子若戒之，命同天在，能服金液，飞仙必克，能服还丹，坚骨延年，子若有志，但于名山，无为无欲，安而覆迁，莫同凡俗，贪欲为冤，大道玄圣，在子目前，斗步子形，光应子精，密而行之，方得成道。《太上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竟。

最后是：琳琅振响咒，天无氛秽，地无妖尘冥惠，洞清大量，玄玄也。

除了上述三部道教经书之外，该铜钟的钟裙部位还均匀地分布着八个八卦符号和一周篆书体文字，笔者不识这些文字，推测它们可能是道教的符咒。

二、铜钟铭文分析

“真武”又称“玄武”、“玄天上帝”，为龟蛇交合体，是道教信奉的神。在古代，玄武与青（苍）龙、朱雀、白虎合称为“四神”、“四灵”、“四象”，人们对于它们的崇拜由来已久。“四神”、“四象”我们容易理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神灵。所谓“四象”，则是指四种天象，起源于原始先民对于天象的观测和认识。“上古人们仰望星空，将群星划分为若干组团，并赋予人、物或神话的形象，乃中外通理，而我国出于四时分明的自然条件，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四象的观念，乃是情理中事。”^①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四象”崇拜的萌芽，李学勤先生依据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座仰韶文化墓葬中蚌壳排列的龙虎图形^②认为：“看来史前时期末叶已有四象或至少有龙、虎，不无可能”。^③

先秦时期，由玄武与青龙、白虎、朱雀共同组成的完整的四神信仰已经形成。《礼记》卷三《曲礼上》云：“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④那时的人们已经将此四种动物形象描绘在旗帜上，在出行时的仪仗中使用。屈原的《楚辞·远游》中也有“时暖日逮其日党莽兮，如玄武而奔属”之句。由此可见，对四神的崇拜是先秦社会动物崇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原始社会万物有灵和图腾信仰体系的延续和发展。不仅如此，该时期还在四象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范畴“二十八星宿”，在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天文学著作《石氏星经》中，四象已成为天象星宿的方位概念，每象包含七宿。即：

青龙：角、亢、氏、房、心、尾、箕
朱鸟：井、鬼、柳、星、张、翼、轸
白虎：奎、娄、胃、昂、毕、觜、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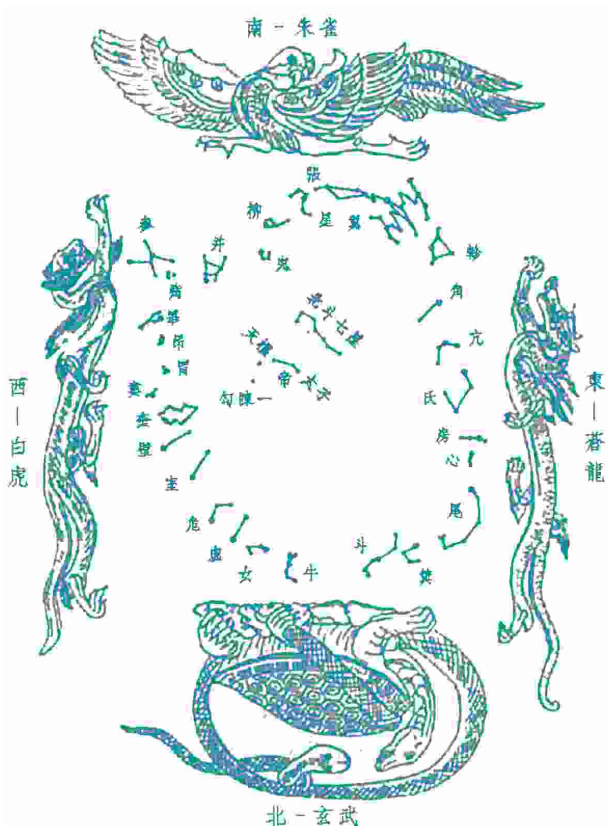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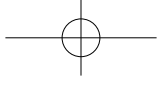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图2 二十八星宿图

两汉时期，镇守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四神信仰十分盛行，四神不仅成为铜镜、瓦当以及墓葬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上的重要纹饰内容，而且文献也多有描述。此时的玄武作为四神之一，其地位与其他三神同等。《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曰：“玄武宿于壳中兮，腾蛇蜿蜒而自纠。”李善注云：“龟与蛇交曰玄武。”^⑤《后汉书·王梁传》中说：“玄武，水神之名。”又载：“《赤伏符》曰：‘王梁主衡作玄武。’”李贤注云：“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⑥《河图帝览嬉》：“北方玄武所生，……镇北方，主风雨。”^⑦该时期，玄武还只是四神之一，尚没有特殊的神格地位。

东汉顺帝以后，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民间四神信仰被纳入道教神灵信仰体系，被赋予了诸多神性。之后，玄武的神格地位逐渐抬升，先后历经了一个由星象中的“北宫玄武”到“玄武神将”，由“玄武神将”到“真武真君”，再到“玄天上帝”的演变过程^⑧，在这个过程中，宋、元、明三朝的封建帝王的尊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玄武”改名为“真武”是在宋真宗时期，是为了避圣祖赵玄朗之讳，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曰：“祥符间避圣祖讳，始改玄武为真武。”《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中记载：“自去年营卒有见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涌祠侧，汲之不竭，疫疠者饮之多愈，甲寅诏即其地建道宫，以祥源为名”。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真武祠。据《元史》卷二十一中记载：在元大德七年（1303年），“真武”被加封为“玄天上帝”。

铜钟铭文以称诵“真武”为主。钟顶的“百字圣诰”又称“百字圣号”，是真武称号。从其称号我们可以看出：真武大帝作为传法的教主，经过修炼，悟出真道，能够帮助众生消除灾难，历经八十二化后的真武具有非凡的才能，仁慈正烈，降福于民，被誉为“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百字圣诰”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个字，以短小的篇幅、精练的语言极力渲染、称颂了北方真武神的超凡能力，目的是要唤起民众对“真武”神的虔诚信仰。

分布在钟体上部，占据了钟体铭文绝大部分篇幅的是道教的重要经文《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曾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经文开头是咒语，名为“仰启咒”，接下来是描述元始天尊于龙汉元年在八景天宮为妙行真人等说法的情景，讲述了北方大神将真武诞生、修行、飞身以及奉玉帝之命镇守北方的事迹，真武于开皇元年诞生于静乐国王室，在武当山修道四十二年，得道成仙。玉帝闻听他十分勇猛，命他镇守北方。龙汉元年，真武将军奉元始天尊之命，前往人间，收断了东北方妖魔。继真武将军的这些事迹之后，便是“真武神咒”、“奉礼咒”等咒语，最后是天尊告诉真武下降人间的时日、职司等。并认为此经的作用极大，如果人间供奉此经，则“魔精消伏，断灭不祥”，可致“天下太平”。《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位于钟体上部，而且其起始句紧邻钟牌，说明该经是铸钟者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位于钟体中下部位的是道教的另外两部重要经文：《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和《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它们顺序排列在《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之后，之间没有间隔和任何起始标识，让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样的位置说明这两部经并不是该铜钟所要表现的主要经文。《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简称《清静经》、《常清静经》，大约成书于唐代，作者不详。经文篇幅短小，仅有391字，以“清静”二字为题，论述了“好清静则得道，务贪求则沉苦海”的道理。经文之后是葛仙翁、左玄真人和正一真人的三篇赞语。该经文对后世

道教教理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一卷，仅二百余字，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类，作者不详，推测出于唐宋时期。其大意是说：天之三光与人的身体相对应，人若耳不乱听，眼不恶视，鼻不闻臭，口不杂味，则“虚中三光，周流遍体”，寿命可与天同。如果服金液还丹，亦可延年成仙。若能无为无欲，便可成道。这些内容与道教教义密切相关，都是如何延年益寿，得道成仙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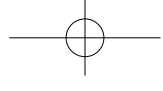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铜钟的设计者和铸造者在钟肩莲瓣上铸写二十八星宿名，均匀排列，环绕钟肩一周，不仅用星宿名称将铜钟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明确地划分出来，也使人们清楚看到玄武神对于北方的镇守作用，这一构思也十分巧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铜钟铭文的主题内容是道教的经文和神祇，布局十分巧妙合理，从中可以看出经文的主次：《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位于铜钟最显著的位置，是铜钟上的主要经文，而《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和《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是次要经文。另外，钟顶部位的“百字圣诰”、钟肩的二十八星宿名、占据钟体大面积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都与“真武”神密切相关，如此安排的目的在于称颂“真武”镇守北方的神力，突出真武神格地位。

三、铜钟的来源

迄今为止，“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的来源尚不明确，存在疑问。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成立于1985年10月5日，其前身是1980年2月成立的大钟寺文物保管所。1983年，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此铜钟调拨到该馆。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一张拓片与该铜钟有密切关联，该拓片藏品编号为：北京7704，尺寸大小为：100×268cm。通过比较，笔者发现拓片所显示的铜钟纹饰和铭文与铜钟完全相符，大小也正好吻合，可以明确断定它就是该件铜钟的拓片。该拓片的档案卡上写着：“弘善寺铜钟，西城区德胜门大街弘善寺胡同，明弘治五年五月（1492.5）。阳文正书，上刻北方真武经，下段刻符文。”拓片的拓制者是20世纪30年代琉璃厂翰茂斋的李月庭，拓片制作地点是西城区德胜门大街弘善寺胡同三号。^⑨由此说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的“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放置在德胜门附近的弘善寺。

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中有弘善寺



的档案(档案号:J181-15-111),其上记载:“敕赐弘善寺坐落内五区弘善寺胡同三号,……庙内法物有木佛像二十六尊,木神像八尊,大铜钟一口,大鼓一面,大小五供二堂,小铜钟一口,大木鱼一个,铁钟一口,铜磬一口,供托五个,木制千佛塔四座,铁香炉一个,供桌三张,藏经三十本,另有石碑两座,柏树三棵,榆槐六棵。”^①档案中所说的“大铜钟”应该就是这件铜钟。《北京市志稿·金石卷》中亦有关于此钟的记载:“明弘善寺铜钟铸文存,弘治五年五月制,上层二十八宿字,中层经文,下层篆书。在德胜门内弘善寺。”^②这些资料证实:民国时期,铜钟的确放置在德胜门弘善寺。

我们已知明朝时期北京城区内曾有两个弘善寺,一个位于左安门外,是明朝正德年间的太监韦霏所建,又称“韦公寺”,实为“宏善寺”^③;另一个就位于西城区德胜门大街,《宛署杂记》中说:“弘善寺,唐开元年创,成化丙戌太监崔安等重建,请于朝,敕赐今名。”^④《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明顺天府志》:‘原弘善寺有敕建碑。’臣等谨按弘善寺在德胜桥东,其地即名弘善寺街,明成化七年建,敕赐寺碑今存。”^⑤“成化丙戌”年和“明成化七年”是同一年,即公元1471年,太监崔安等人重建寺庙的时候,朝廷赐名“弘善寺”。也就是说,“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曾经放置的弘善寺由明朝太监崔安等人于成化七年修建。

明朝时期,宦官专权十分严重,宫中太监多建佛寺养老,太监崔安等人于明成化年间重修的弘善寺即属此类。

北京城德胜门附近的弘善寺是一座佛教寺庙,肯定不会铸造一件具有浓郁道教文化内涵的铜钟,“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理应另有出处。无论从主要经文的内容,还是从经文在铜钟上的布局,都可以推断出该铜钟所在的庙宇应该是以“真武”为主要供奉神祇的道教场所——真武庙。那么同样位于德胜门附近,与弘善寺毗邻的真武庙是否就是该铜钟的肇始之地?笔者仅做推测,不敢妄下定语,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求证。

四、结 语

中国古代钟铃文化遗物众多,按发声方式可分为钟和铃;按腔体造型可分为合瓦型和正圆型;按功能可分为信号工具、乐器、礼器、法器、报

时器等。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的“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属于正圆型的宗教法器,这类古钟是继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兴起的古钟类型,与先秦时期的青铜乐钟在造型、声音、功能、装饰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道钟与佛钟具有相同的形制特征,区别在于使用的场所不同和铭文内容不同。“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造型美观,工艺精良,铭文字体遒劲有力,是中国古代铜钟的杰出之作,反映了中华民族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铜钟表面的铭文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布局巧妙,独具匠心,真实地再现了明朝早期北京地区真武信仰的发展状况,是北京地区道教文化的独特载体,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①③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78页。

②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本,第1250页。

⑤(梁)昭明太子选、(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会文堂书局,清宣统三年(1911年)。

⑥(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晋)司马彪注补、(梁)刘昭注:《后汉书》(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9月。

⑦(明)孙穀辑、(清)钱熙祚附注:《河图帝览嬉》,守山阁丛书,上海鸿文书局,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石印本。

⑧杨立志:《玄武——玄帝神格地位演变考略》,《宗教学研究》,1993年第1期,8~13页。

⑨解小敏主编:《北京古钟》(下),“弘善寺铜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10月,268页。

⑩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1月,93页、94页。

⑪吴廷燮等纂、于杰等点校:《北京市志稿·金石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185页。

⑫庾华:《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收藏的北京宏善寺铜钟》,《北京文博》,2006年第3期,61页。

⑬(明)沈榜编:《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223页。

⑭(清)朱彝尊原辑、(清)于敏中等修、(清)窦光鼎等纂:《钦定日下旧闻考》。

(作者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用毛雕法雕刻兽毛

浅析竹刻艺术品 鉴赏要点

尚美华

人们用刀刻竹子的历史悠久。而将竹刻技术艺术化，一般认为从唐代开始，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代雕花卉尺八，是目前保留的、较早的竹刻艺术品。明代中期以前，刻竹者并不留名，嘉靖、隆庆以后开始涌现出世人闻名的刻竹艺人，竹刻作品也成为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喜爱的、专门的艺术形式，致使一些精美的竹刻品流传至今。竹刻的艺术语言是经雕刻表达的，不同的雕刻技法表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些艺术风格经过流传承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鉴别竹刻品，了解雕工技法是最重要的，通过技法了解作者也是必须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提到辨伪。

一、雕刻技法的认识 辨别

竹刻品的雕工分平面雕和立体圆雕。常见的笔筒、香筒、臂搁、扇骨等多用平面雕刻；人物、动物等是用竹根雕成，属于立体圆雕。平面雕刻又分为阳文、阴文雕刻；阳文又有毛雕、留青、浅刻、深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

毛雕 毛雕的雕刻线条细而浅，多见于笔杆、笛、箫等。

因为这些器物直径细，竹体薄，不适宜深刻，毛雕法很适宜这样的竹材。但有时为了表现题材的需要，也会与其他雕刻法配合使用，进一步表现主题纹饰的细节，如人物的须眉、鸟兽的羽毛、极小字的诗篇等。民国人于硕，字啸轩，精于此法，并善于雕刻象牙小件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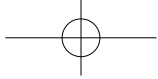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留青 留青是把竹材的青皮留下来作主题线条，将主题线条以外的部分去掉，留下竹皮部分呈现的图案。竹皮光滑洁亮，把玩年久会变得微黄；竹肉部分年久后颜色更深，但不亮，这样利用竹皮与竹肉二者的颜色差别来表现纹饰的主题。明末竹刻家张希黄擅长此法。



明末张希黄用留青法雕山水

浅刻 也称“薄地阳文”，浅刻法走刀不仅有线，有时还有面。画面中的有些部位不是用线来表现，而是需要成片的面来表现；另外，有些表现纤秀的字体、花鸟等也需要这种刻法。

深刻 是阳文中最基本的刻法。深刻比浅刻更深，以竹材表面为地，向下深刻，往往还由阴刻托起阳线，以此来表达图案的凹凸起伏。用这种刻法刻出的花瓣等，看上去立体感更强。清早期竹刻名家周芷岩



用此法刻竹最佳，常见题材有荷花、晚松等。

浅浮雕 浅浮雕是将图案纹饰以外的地子铲掉，留下凸起的花纹。铲掉的地子有多有少，留下的图案有高有低。高低交错，远近隐现，山水树林，错落有致。这种雕法比较复杂，因为从最初画景到最后成景，需要分步来做，画景不在一个平面上，决定了画稿不能一次完成，只能将最高一层先画好、刻好，再逐层随刻随画，随画随刻。三朱（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两周（周芷岩、周笠）、吴鲁珍等高、浅浮雕皆具精工。雕高、浅浮雕的人，不仅能雕，更要会画，这是后人，特别是今人雕刻者难以模仿的。浅浮雕的层次较少，一般两层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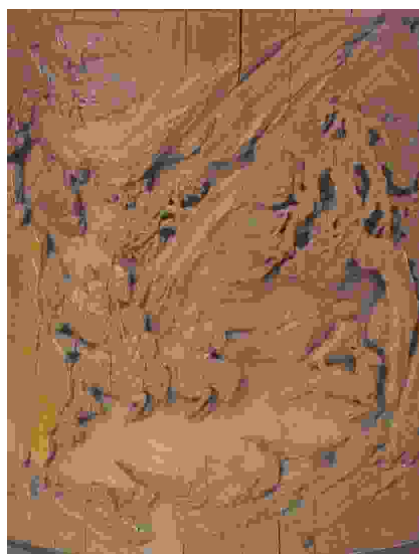
高浮雕 工艺表现为高处更高，低处更低，雕刻得更深。高浮雕用材接近竹根部位，竹肉更厚，以便雕出五、六层的深度。高浮雕器物上有的部位采用了圆雕技法，如表现树木，一棵棵树干从地子上悬空起来，更加逼真地表现了立体的感觉。用高浮雕法的器物一般是笔筒。高浮雕比浅浮雕更难，虽然也是随画随刻，但要雕五、六层，光是工具就复杂得多。高浮雕器物立体感更强，许多图案象活起来一样，山有远近层次，水从山里边流出，而不是像普通画面从上流到下，树成为一棵一棵的独立躯干，人物也从画面上走出来，看得见，摸得着，极其生动。清早期狩猎图笔筒外壁是通景狩猎图，图中山林密布，藤枝悬挂，古松苍劲，溪水湍流，一只雄鹿在猎手追赶下惊恐飞奔，迎面又遭到了猎犬的围堵拦截，这场人与动物的较量与寂静的山林动静呼应，人物、马匹、动物的神态刻划入微。这种高浮雕的效果，显示出嘉定派高手的精湛技艺。

透雕 透雕工艺用于制作香筒的比较多，这是因用途的要求而设计的，但取得了更加绝妙的效果。透雕的孔洞一般在主题纹饰的衬地上，或是在人物旁、山石洞穴之中。透雕经常与高浮雕结合使用，透雕的部位不仅正面雕刻得完美流畅，纹饰侧面也雕得圆滑玲珑，其工艺非常讲究。

圆雕 圆雕的方法在竹刻艺术中也是很难的。首先，在选料时就很讲究，竹根要在土中半埋半露的好，然后还要根据竹根的形状设计题材的纹样。在设计时，不但要设计正面，还要将侧面、背面逼真地设计出来。一切去留雕琢，都要照顾到材料和题材的结合，才能雕出活灵活现、形态生动的作品。圆雕的难度还表现在雕的过程需要固定，因为圆雕要 360° 雕刻，钳夹材料不易把握角度，所以圆雕需要的工夫更大。圆雕的题材也较广泛，佛像、人物、动物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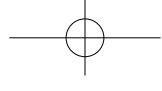
用浅浮雕法刻笔筒



用高浮雕法刻狩猎图



用圆雕法刻人物



明末朱三松刻仕女图笔筒

二、竹刻作品的风格流派

竹刻艺术的主要流派是以“三朱”为代表的嘉定派和以濮仲谦为代表的金陵派。

嘉定派创始人朱松邻，明晚期人，专攻行草图绘，对篆书和刻章也很精通。朱松邻刻竹擅长精雕细镂，所刻器物有香筒、笔筒、杯等，并擅雕簪钗等饰品。由于作品广受喜爱，以至于世人将其制品直接由其名“朱松邻”代替。他的作品传世很少，他的高浮雕风格开创了嘉定派的先河。朱松邻之子朱小松，绘画的造诣比前辈更深，擅长小篆和行草。他的竹刻，山川云树，迂曲盘折，所刻人物动物，形象表情生动活泼。朱三松，朱小松次子，擅长画山石、丛竹、枯木，尤其喜欢画驴。他的雕刻画稿来源于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自己新的创意，丰富了原画的内容。因此，朱三松的作品不论雕工和构图，都显示出精巧娴熟的手法及高超的技艺。朱三松作仕女图笔筒，仕女面带娇色，头戴风帽，衣带飘逸，手持兰花婷婷玉立，背后衬以洞石古松，背面山石刻有“万历甲寅秋八月三松作”款识。此作是以高浮雕和透雕两法刻成，也代表了明末嘉定刻竹风格。

濮澄，字仲谦。万历时生人，直到清初。有对他的形容曰：“貌若无能，而巧夺天工。其竹

器一扫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濮仲谦真迹传世极少，那些雕工繁琐、题材庸俗的作品大多都是仿品，或者取旧器后加款。但其作品简约随型的风格，是金陵派首创。明代刻竹名家除了上述人之外，还有张希黄。总之，明代中期开始，竹刻名家辈出，作品风格主要是朱氏高浅浮雕、浅刻或略施刀凿的濮氏刻法及留青的张氏刻法。

清代前期的竹刻大家主要有吴鲁珍、封锡禄、周芷岩、潘西凤四人。吴鲁珍是继“三朱”之后的嘉定第一高手。他的作品除圆雕外，更善于浮雕。他的浮雕深浅多层，高的地方接近圆雕，低的地方有时用透雕。另外，他创新了浅刻法，虽然雕刻不深，但精工细致至微，表现景物仍有透视的感觉。他的作品风貌还表现在有时并不将器物刻满，而是有所留白，光素的部位竹丝光滑润，雕刻的部位精雕细琢，二者交相辉映，将传统竹刻继承发扬。

另一嘉定名人、略晚于吴鲁珍的封锡禄，也擅长圆雕。封氏兄弟三人都刻竹，锡爵，字晋侯；锡禄，字义侯；锡璋，字汉侯，三人当中属义侯技艺最高。清早期，义侯、汉侯同时进宫当艺差，故名气更大。封锡禄技艺上承朱氏刻法，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和提高。他刻的圆雕人物，有仕女、神鬼等，无论喜怒哀乐，豪雄彬雅，都表现尽致；他刻的鸟兽，栩栩如生；这种更加精确写作的作品，都是表现他自己的功力，也是他胜于前人的地方。他雕的竹根布袋和尚，微笑面世，表情洒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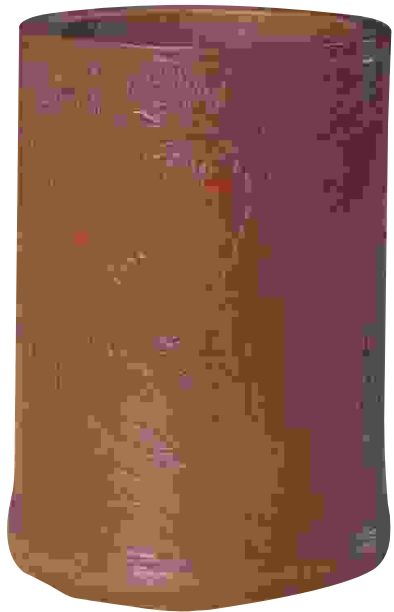


清封锡禄用圆雕法刻布袋和尚



一副看破红尘之相；袒露胸腹，显出博大胸怀；就连身边的小童子，面部表情也是喜笑颜开、百般顽皮的样子，这种出神入化的境地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后人仿刻，也很难达到。

周顥，字芷岩，与封锡禄同朝代人，嘉定派高手，比前者年幼。周芷岩擅长绘画，尤其摹仿



清周芷岩刻笔筒

古人绘画，这与清早期画坛“四王”主流分不开。与“三朱”祖孙不同的是，“三朱”皆竹人能画，而周芷岩是画人能竹。因此，他的风格是以画法刻竹。尤其是所刻山水，以阴刻为主，又将南宋画法用于刻竹，他是开宗第一

人，可将笔意所达不到者，以寸铁写之。他刻的山水，人无耳目，屋无窗棂，树无细点，桥无略约，皴擦勾点，无处不精，为清代人崇尚。

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人。因曾被郑板桥称赞为濮仲谦以后第一人，故一般被认为属金陵派刻竹人。老桐擅长多种刻法，皆精到至绝，尤其是他的浅刻工夫之深，与濮仲谦浅刻味道大相径庭，以至许多人误认为他只工浅刻。

清代中期及后期，仍有许多刻竹之人，地域也不仅限于嘉定、金陵两地。其中比较有名的刻竹之人有：蔡时敏、庄绶纶。二者擅雕人物，刻法有圆雕、透雕。张宏裕，专刻小像，用圆雕法。方絮，号治庵，山水、人物小照皆刻，用浮雕法，而且运刀如笔，勾勒皴擦，得心应手。自张、方之后，刻像多用留青或阴刻，圆雕、浮雕非常少见。蔡照、袁馨两家，以刻画本故事为最佳。周鐸、韩潮以精刻小字为长。清代晚期，竹刻仍有发展，但一般都是在笔墨上见长，高浮雕、透雕、圆雕、深刻等无人问津。因此，今人所遇凡高浮雕、深刻、透雕、圆雕者，年代至少在清中期以前，尤其高浮雕，大多都在明末清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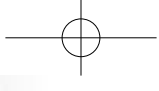
三、竹刻鉴别

在众多名家雕刻备受推崇的时代，真品的供不应求给摹仿者和造假者带来了机会。其手法与其它类别文物造假基本相同。

一类做法是照原物仿制，特别是竹雕大师们的弟子摹仿，有的落大师的款，有的不落款。这类比较难于鉴别，观察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熟悉原作的作品风格，了解原作者的背景，更要熟悉其刀法走向。这需要到有较长收藏史、较大收藏量、较高收藏水准和具有研究鉴定专家的大型博物馆观察原作。其次，观察要仔细，以至于每一部位、每一刀、每一线条。因为摹仿原作，大体上应该与原作一样，只有从细微处才能见差异。这个差异源于不同的人基本功训练不一样，理解掌握作品的程度不一样，手劲也不一样，写款笔迹也不一样等，就像摹仿人的笔迹一样，细微的痕迹会揭开谜底。应该注意的是，如果当代人仿古，基本上仅用阴刻或浅雕，需要高水准绘画工夫的高浮雕、圆雕、透雕是不易仿成的，其成本之高、费工之大是伪造者难以做到的。如果是弟子仿，那么到今天，虽然不是原作，其艺术价值也应较高了。这两种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一类做法是张冠李戴和“关公战秦琼”式的仿造。对这类仿品的鉴别，相对容易一些。只要认真了解原作者的情况细节，如生活年代、基本雕刻风格、画稿的风格来源、用刀习惯、擅长运用的雕法、师承派别等，如果不符，仿品的倪端就显露出来了。除上述之外，更低劣的做法是无款添款、磨款改款。但有了对付前两种作伪的能力，这些就是小儿科的事情了。

在辨伪的时候还不要忘了识真。竹刻大师们有很多弟子门生得以真传，他们的作品水准也很高，但许多因与师父同期而被师父的光辉淹没。要了解这些历史，读一些记载这类事情的书，会帮助我们认识许多名气不大的竹刻者，了解他们的作品并及时收藏，这对我们的鉴赏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当代也有擅长竹刻的艺人，尽管少，但有些浅刻作品也很出色，也应当值得我们关注。总之，鉴赏竹刻艺术品，会使我们间接提高鉴赏绘画等其他方面的水平，它要求鉴赏者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竹刻艺术品的文化内涵之深，也是古今文人津津乐道之题目。相信我们会在学习鉴赏竹刻艺术品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公司振环阁助理馆员）



清前期京城钱局的铜料与滇铜的运输

王纪洁

清代的铸钱体系分为中央鼓铸和地方各省鼓铸,中央京师设有宝泉局(隶属户部)和宝源局(隶属工部)两个钱局,此外各省也都纷纷设钱局铸造。

清代前期京城既是都城,同时亦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但是由于京城以及周边地区铜矿不发达,为保证京城铸钱的顺利进行,清政府对铜料非常重视。本文拟就清前期京局铸钱的铜料来源及铜料的运输等问题做一下考证。

一、币材的金属成分

有清一代,政府对币材有着明确的规定。清制钱的金属成分主要是铜和铅(清代有白铅、黑铅之别。铅泛指白铅即锌,黑铅指铅),在不同阶段两者的配铸比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清初对币材的规定与明末铸钱相同。据《天工开物》载:“凡铸钱每十斤,红铜居六、七斤,倭铅居四、三。”《天工开物》成书于明末,其所指的就是明末铸钱的合金成分。清初,铸钱亦定制为“铜七铅(锌)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改为“铜六铅(锌)四”,雍正五年(1727年)币材的含铜量再次降低,为“铜铅(锌)各半”,乾隆五年(1740年)改铸青钱(铜、锌、铅、锡合金),为铜50%、白铅(锌)41.5%、黑铅(锌)6.5%、锡2%。

为便于统计分析,现将清前期各朝铜钱金属分析数据^①列表如下:

局名	名称	Cu (铜)	Pb (铅)	Sn (锡)	Zn (锌)
宝泉局	顺治通宝	64.49	7.57	2.37	22.61
		56.8	4.58	2.83	31.16
	康熙通宝	65.62	7.72	2.62	20.68
		64.35	1.23	0.37	32.31
		61.27	5.88	1.18	31.88
	雍正通宝	65.95	2.44	0.068	29.58
		55.25	6.81	0.98	36.58
	乾隆通宝	59.68	4.08	1.11	30.84
		55.32	5.58	2.05	3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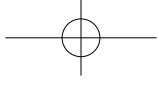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局名	名称	Cu (铜)	Pb (铅)	Sn (锡)	Zn (锌)
宝泉局	顺治通宝	62.56	4.82	2.43	26.25
		64.88	6.76	2.09	23.43
	康熙通宝	53.26	6.99	1.64	33.30
		60.23	2.10	0.41	34.02
		65.98	6.57	2.50	21.34
		60.05	5.83	1.93	28.82
	乾隆通宝	55.31	3.38	0.99	38.75
		56.74	6.99	1.71	31.31
		57.77	5.05	2.27	33.08

上表对清初铜钱金属成分的分析结果显示,铜、锌是清初铜钱的主要原料,这与清政府的规定完全相符,但随时间的不同二者的比例有所不同。而且,大多数铜钱中含有铅、锡等矿物质,与清朝条例的规定又有所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有学者认为是清制钱中的铅、锌可能是有意加入的^②。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铜料的供应不足,清初的铸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历朝历代的废钱、旧器,而这些废钱、旧器带有一定量的铅、锡,因此,铸出的铜钱中混入了铅、锡^③。

可见,自顺治元年至乾隆五年(1644—1740年),清朝规定铜钱的主要成分是铜、锌,只是铜、锌的含量有所变化而已。

乾隆五年(1740年),铜钱币材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改铸铜、锌、钱、锡合金钱,也就是所谓的“青钱”^④。乾隆五年,规定铸钱合金比例为“每红铜(铜)五十斤配合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再加锡二斤共为百斤,即铸成青钱。”^⑤其合金中含铜50%、锌41.5%、铅6.5%、锡2%。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止,几乎整个乾隆朝都在铸造“青钱”。

改铸“青钱”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件大事,不仅意味着币材、铸钱技术等方面的变化,而且还导致了清朝矿业政策的改变,如铅、锡矿的大量开采。同时,也反映了清前期货币理论水平及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得到逐步提高。



二、铜料来源

综上所述,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当时铸造铜钱必须以铜和锌按一定的比例搭配熔铸,所以铜、锌是铸钱的主要原料,铜料尤为重要,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为“铜政”。

清代铸造铜钱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旧钱回炉、旧铜器熔铸、采办洋铜以及自行采矿炼铜,其中自行采矿炼铜是最主要的来源。铜的产地主要集中于两湖、两粤、川、陕、贵等省,其中以云南产铜最多,习惯称为“滇铜”。

清初,中央和地方铸钱的铜料全部依靠国内供给。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大部分铜料从日本进口,以后由于日本铜产量下降,进口日铜也随之减少。雍正时,进口铜料的不足部分,由采办国内滇铜得到补充。到了乾隆年间,滇铜逐渐代替了大部分进口铜^①。

最初,政府为了保证京城两局铜的供给,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京局所需的铜都是由各关在市面上收购的。顺治二年令京师崇文门、直隶天津关、山东临清关、江苏龙江关、西新关、浒墅关、扬州关、安徽芜湖关、凤阳关、浙江北新关、南新关、江西湖口关、赣关、湖北荆州关、广东太平桥关、淮安关,共十六关差办铜^②。这些“税关”从课税收入中专门拨银两收购铜、铅,并由各税关运交京城的两局铸钱局。凡是清政府指令购运交京城两局铸钱的铜,简称“京铜”,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了整个清王朝 267 年时间。

随着京城铸钱量猛增,两局年所需铜原料由顺治初年的一二百万斤,到康熙年间达到四百万斤。为弥补国内产铜之不足,清政府还允许从国外运入铜料。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后,所需铜原料多从日本远程购回,当时称采买“洋铜”。“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给官用。有余,则任其出售于市肆,以便民用。”^③

此外,清政府在国内还收购历代旧钱和铜器以补铜料之不足。为保障铸钱原料,曾下令四品以下官员及老百姓不得使用铜制器皿,全部收缴国家以保铸钱,私藏者治罪等,但种种措施仍不能保证两局钱币的正常铸造。

三、滇铜的开采

此时,云南铜矿业开始呈现发达迹象,而且

铜料质地较佳,开采远景亦可信赖,因而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遂把铜料的采办转移到了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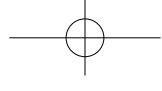
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铜、锡著名。商周时期,云南尤其是滇池地区青铜铸造业就非常发达。滇池地区及附近地区,多是产铜、产锡的源地。由于资源丰富,促进了滇池地区矿冶业和铸造业的发展,形成灿烂的青铜文化。滇国金属矿产丰富,甚至其中部分还远销境外。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其铜料产地有的就是来自云南的东川、会泽地区^④。西汉中叶以后,滇东北地区的青铜冶炼日趋发展起来,经王莽新朝至东汉时期已十分兴盛。朱提(昭通)、堂狼(东川)生产的铜洗行销全国各地,成为当时各地铸钱的主要原料。而滇东北地区得当地产铜洗之利,为铸钱创造了条件^⑤。

清朝对云南的统治确立后,大量移民入滇,推行“改土归流”,客观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推进了边疆的开发,使云南的矿冶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东川、易门、路南、永北(今永胜)的铜,鲁甸、白羊(今宾川牛井)、永盛(今云龙)、茂隆(今沧源)的银,个旧的锡,罗平、建水等地的铅都负盛名。1743年至1802年间,滇铜的平均年产量均超过10000万斤以上,最高年产量达到14000万多斤,位居全国之冠。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筹滇十议疏》,其中第四疏议理财,着重“广鼓铸开矿藏”。开采滇铜供应铸钱之需,东川矿山之大规模开采从此开始^⑥。他实行对滇矿招商开采的政策,抽税20%,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政府在云南设立官铜店,收购滇铜。此后,铸钱原料逐渐停止办运洋铜,基本依赖滇铜。当时,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20%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此外,滇铜虽说官收,但老百姓私采私售从未杜绝,民间小厂众多。全省铜矿雇工,盛时约有20~30万工人劳作。

滇铜产量盛时约占清代全国铜产量的95%以上,是清铸钱业的原料基地。滇铜中尤以东川产量最多。清前期东川的铜厂多达33个,其中产量最高的有汤丹厂、碌碌厂、大风岭厂、紫牛坡场、茂麓厂,这些大厂还辖若干小厂。从产量上看,乾、嘉时期,最高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新纂云南通志》对以上五厂的产量统计表明,它们年产铜900万斤,占当时全省铜产量的75%,占全国铜产量的64%。

清政府根据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把这里



文物研究

作为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京师铸钱局铸钱原料开始以滇铜为主。乾隆三年(1738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输京正铜574万斤,又按九五成色每百斤加耗铜8斤,再依运输损耗每百斤加余铜3斤,每年共发运额铜633.144万斤进京^①。这一规定数额被长期奉行,因此,云南铜矿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期内,对于清朝中央的财政金融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江南、贵州等地方钱局鼓铸所需的铜料,也主要依靠滇铜,形成“洋铜而外惟仰给滇铜”的局面^②。与滇铜生产旺盛相适应,清政府对铸钱的用铜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清政府于乾隆四年(1739年)决定,“各省解办京铜,官商亏空甚多,现在云南铜颇旺,应将各省每年解办精通四百万斤,尽归云南办运”。^③从此以后,京局鼓铸用铜全部使用滇铜。

用国产的滇铜取代洋铜铸钱,一方面使得铜原料供给保持相对平稳,另一方面降低了铸钱用铜价格和成本,从而使清代铸钱制度长期保持稳定。

四、滇铜的运输

由于铸钱所需的铜料主要来源于京外,因而铜料能否顺利运送到京城,便直接影响到宝泉、宝源两局的制钱铸造。为加强管理,清政府对京局采办滇铜做了严格规定,明确“每一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其由滇运输至京,每百斤脚价三两,后来户部对滇铜运京脚价实行实报实销制度,但节省不会太多^④。

在实际运行中,滇铜运输时因运力不济、运送不力而屡出差错。为保证京铜供给,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不能延误,清政府屡次晓谕省督,不尽责而延误时日者,惟滇省督府是问。

朝廷对滇铜入京的线路及期限有着严格的限定。乾隆三年(1738年)《云南运铜条例》规定,滇铜运京路线为:由云南两处产铜之地分别转运到四川永宁,然后改由水运,由永宁河入长江,经泸州、合江、江津、重庆、汉口到江苏仪征,转入运河,最后到达直隶省的张家湾,起岸后陆运至京。乾隆七年(1742年),户部议定,将铜房由张家湾移设通州。然后由通州转运至京^⑤。

对于滇铜运京期限朝廷也有严格的规定。乾隆十四年(1749年)户部议言“自川至汉口,定限四月;汉口抵通州,定限五日;至于汉口、仪征,例须换船,一切搬运过载,于汉口定限四十日,仪征定限二十日,通计自领铜抵通,定限十有一月。……其交通之后,自京回滇,以九十九为限。”^⑥

从时间上看,虽然规定运输的时间在一年左右,但由于路途遥远险恶,所谓“程途万里”,故有学者推算估计滇铜运京往往有二三年才运达到^⑦。可以说,京铜运输是清代规模宏大的运输工程,由于钱币铸造为每年定制,事关国计民生,故滇铜远远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运输等工程更为完善,转运制度也更为严密^⑧。

由此可以证明,云南铜料的输出,对京城钱币的铸造和市场供应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清代制钱制度的稳定。可见,云南在清代货币铸造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①数据来自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一版;周卫荣、戴志强:《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丛》,中华书局,2002年。

②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435页。

③王显国:《乾隆五年前清铜钱中铅、锡问题及乾隆“青钱”研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5年硕士论文。

④笔者注:因为黄铜添加锡以后,颜色变青,故谓之“青钱”。

⑤《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96页。

⑥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官商》,《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⑦《清朝文献通考》卷14。

⑧《皇朝掌故汇编·钱法》卷1。

⑨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科学史论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⑩云南钱币学会:《云南货币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

⑪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云南近代货币史资料汇编》。

⑫道光《云南通志》卷76《京铜》。

⑬《清高宗实录》卷269。

⑭沈云龙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173《户部·钱法》,第791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92年。

⑮王德泰:《关于乾隆时期钱值高昂问题的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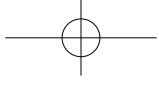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⑯《清朝文献通考》卷17。

⑰《清朝文献通考》卷17、卷13、卷16。

⑱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34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⑲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建国以来北京地区 汉代考古成果综述

靳 宝

一、回顾历程

北京在两汉时期为北方军事重镇，起着连接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以及边疆少数民族文明的纽带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均在出土的大量汉代遗迹中得到了验证。回顾这 50 多年的北京汉代考古历程，可分三个阶段。

1949 年至 1978 年，是北京汉代考古初步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在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措施，坚持“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并在全市进行了普遍的文物调查。1958—1959 年的第一次文物普查，不仅全面掌握了本市文物分布情况，为今后全面规划和开展本市文物保护、征集、清理发掘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尽管这期间经历了缺乏科学性管理的文物保护期，但诸多文物保护工作者仍从濒临毁灭的边缘挽救了大量的考古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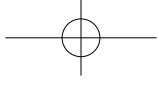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北京秦汉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城址的探查和墓葬发掘。据初步统计，这 30 年间共发掘汉墓 249 座、城址 18 座。城址方面，主要是对古蓟城的调查和勘探，也包括诸如今房山区的汉广阳县城、窦店的汉良乡县城、长沟的汉西乡县城，以及今昌平区的汉军都县城和平谷区的博陆城等。墓葬方面，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京密引水工程以及其它基本建设工程，在全市各区县都发现过汉代墓葬，如平谷的西柏店村、唐庄子汉墓，怀

柔城北汉墓，昌平史家桥、半截塔和白浮村汉墓等。在已发现的汉墓中，1974—1975 年发掘的丰台区大葆台 1 号、2 号汉墓，最为重要。此外，在北京西郊还发现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及墓表的石构件 17 件，是东汉时期的一组神道阙。

1979 年至 1990 年，是北京汉代考古相对平稳的阶段。改革开放后，北京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理性思维阶段，深感对文物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清理、保护、描述上，需要从更高的层次来把握考古文化的脉络。^①不过，从成果数量和规模上来讲，这一时期稍逊色于以往，共发掘汉墓 105 座、遗址 2 座。

1981 年—1984 年北京市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遂对以往的城址又进行了探查，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发现了新的窖藏遗址和冶铸遗址。在墓葬方面，北京东南郊三台山，以及石景山、海淀、通县、昌平、延庆、房山等区县相继发现很多汉墓，其中以 1982 年北京三台山和 1983 年通县永乐店畜牧场发现的东汉墓规模最大。^②

90 年代至今，为北京汉代考古继续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随着国家和北京市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和投入，又由于学术发展的推动和基建工程的大规模开展，北京市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带着课题发掘的考古工作，基建考古全面展开。这对北京汉代考古也是一个好的形势。据初步统计（已公开的发掘资料），该时期共发掘汉墓 841 座，仅 2006 年至 2007 年这短短两年，北



北京史地

京地区就发掘汉代墓葬 209 座, 汉代窑址 35 处^③。同时, 该时期又发现新城址 1 座, 并对以往的城址进行了深入探查。如, 为了配合海淀区上地村建设工程, 发掘了 523 座汉墓^④; 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 在丰台区发掘了大量古遗址, 其中南正遗址墓葬区是全面勘探过程中新增加的 1 处面积最大、遗存最丰富、出土文物最多的文物埋藏区。^⑤这些遗址中, 汉墓占有一定的份量。而且, 90 年代之后, 北京又发现和发掘了继大葆台汉墓之后又一颇具规模的汉墓, 即 2000 年发掘的老山汉墓。

事实证明, 汉代北京地区确是北方重镇, 为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链接的纽带, 是汉代北方文明的中心。

二、墓 葬

到目前为止, 北京地区汉墓的发掘数量仍是各类墓葬中最多的。就已公布资料粗略统计,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北京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 已逾千座, 时代历西汉、东汉, 跨越四百余年。^⑥如果包括未发表的, 北京地区历年发现的汉代墓葬达 3000 座之多^⑦。其遍布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等区县, 分布区域较为广泛。所出土的器物, 据粗略统计, 共有 107915 件, 其中陶器和钱币占多数, 还有铜器, 以及少量的铁器、漆器、玉器、骨器、石器、印章、石刻、画像石等。无论从数量上, 还是从种类上, 其发掘成果值得关注。

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墓 (M1、M2) 和石景山区老山汉墓, 是目前北京最大的三座汉墓。大葆台汉墓于 1974 年发现并发掘, 1975 年 6 月发掘工作基本完成。该墓葬遗址位于北京西南郊郭公庄西南隅, 西临永定河, 南靠京广铁路支线。一号墓在东, 二号墓在西, 两墓相距约 26.5 米, 封土相连成一高大土丘。据专家考证, 一号墓主人为广阳顷王刘建, 二号墓为其王后^⑧。

两墓均为大型土圹木椁墓, 形制相同, 2 号墓稍小, 并被火焚毁, 仅有少量遗存。1 号墓保存基本完整, 它坐北朝南, 由封土、墓道、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而墓室又由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内回廊和后室等部分组成, 这就是所谓的黄肠题凑葬制。

1 号墓虽被盗过, 但仍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器物, 共约 850 件, 可分为陶器、铜器、铁器、铅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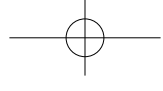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玉石器、骨角牙器、漆木器、纺织品、车马器和其它共 10 类。其中, 八棱兵器、铜镜、龙头枕、玉璧、玉璜、骨雕、骨棒、云纹漆床、云龙纹漆器、六博棋、刺绣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物, 造型别致生动, 制作精巧。2 号墓尽管遭到火焚和盗窃, 仍出土了 240 件残存文化遗存, 有陶器、铜器、玉石器和车马器等。其中, 出土的玉佩、透雕人像玉饰, 是很典型的器物, 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同时, 其中有些器物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 而大部分器物又表现出大一统的社会共性, 体现出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文化特征。^⑨

在 1 号墓墓道中放置的随葬车马, 皆真车真马, 且保存完整, 计有朱轮华毂车三辆, 马十一匹。2 号墓内殉葬的车马已无存, 仅残存一些车马器。从 1 号墓埋葬的 3 辆车看, 皆朱轮华毂彩漆车, 车上器件都鎏金, 整体车的外形相当华丽, 不难看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和生活。^⑩

大葆台汉墓, 为北京考古史上一次重大发现, 目前仍是北京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两座汉墓。更为重要的是, 大葆台汉墓为我国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墓, 墓葬形制和结构比较特殊。因此, 它在考古发掘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随后, 相继发现了诸如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江苏高邮天山汉墓等一批具有黄肠题凑葬制形制的汉墓, 遂对汉代黄肠题凑葬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也更加证实了大葆台汉墓首次发掘黄肠题凑葬制的考古意义和历史价值。同时, 大葆台一号墓的规模之大, 迄今仍居已发现的“黄肠题凑”墓之首, 它的墓葬形制和棺槨结构, 保存比较清楚和完整, 且乃汉代“黄肠题凑”葬制的成熟形态。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黄肠题凑”墓的结构和葬制, 并为进一步探讨汉代帝王葬制, 提供了十分重要而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 也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资料。此外, 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和整理, 掀起了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汉代葬制的再研究, 特别是对“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这一天子之制的深入探讨。^⑪

继大葆台汉墓之后, 2000 年北京市又发掘了一座规模较大的汉墓, 即老山汉墓。该墓位于北京市石景山老山教练场东南环路北侧, 外观为近方形土山。老山汉墓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 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四部分构成。墓室由外回廊、题凑、内回廊三大部分组成, 也属题凑墓。

老山汉墓虽然早期被盗, 但仍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首先是保存极为完整的墓室木结构建筑,



与以前发现的同类型墓相比,有其一致性,也有相当的特殊性。以前发现的题凑多用柏木垒砌而成,而老山汉墓的题凑却用了大量的杂木,如板栗等。这就为我们研究西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建筑形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其次,老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漆器制品以及漆器构件等,这在北方汉墓中极为罕见。而且出土的漆器规格高、种类多、制作精美,如大型漆案、耳杯、盒、壶等,为不可多得的漆器精品。中棺棺盖上的丝织品,是一件特别设计绣制的珍品,绣品面积之大、之完整也属北方之最。此外,老山汉墓还出土了百余件陶器,种类有鼎、罐、壶、盒、盆、耳杯等,形制也有相当的特殊性。关于该墓的年代,据一些专家推断,应在西汉中晚期。^⑨

除了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外,还有诸如怀柔城北汉墓群^⑩,昌平白浮村^⑪、半截塔^⑫、史家桥^⑬汉墓群,平谷西柏店村、唐庄子汉墓群^⑭,海淀上地汉墓群^⑮,顺义临河^⑯、田各庄^⑰汉墓群,密云提辖庄汉墓群^⑱,房山岩上汉墓群^⑲,等等。

就墓室构筑形式和埋葬情况而言,北京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大致可分为四类: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墓、画像石墓。土坑墓和砖室墓为较常见也是发现数量较多的两类,瓮棺葬墓数量次之,而画像石墓数量极少。^②从出土器物来看,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玉器、漆器、印章、砖瓦、钱币等,种类丰富,数量较多。有些陶器是很有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当时的社会状况。如1959~1960年在怀柔县城北的东汉墓中出土1件双人踏碓俑^③,可知当时虽仍使用人力操作,但双人同踏,工作效率也应是较高的。同时期在平谷县西柏店、唐庄子东汉墓也出土了陶磨和陶碓。陶磨为一磨扇架设在一方形台的十字(穿孔)架上,磨台下连着漏斗,用四柱支架。陶碓为单人操作具,底部后端(即农夫操作处)的四角上各有一向上的支柱残迹,推测支柱上面还应有一横扶手。

铁器出土相对较少,但也很有价值,如1960年在北京昌平县史家桥43号汉墓(新莽至东汉早期)中出土铁锄一件,呈凹字形,似应为木锄之铁刃。其形状又与清河镇朱房乡西汉古城遗址所出铲之铁刃相同,或即为木铲之铁刃。漆器,大部已朽。其它还有骨梳、木梳和残骨器等。这些都反映了汉代北京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北京汉墓及其出土器物,它们之间既有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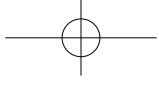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的特征,又或多或少存在自身的独特之处。从大的文明发展来讲,它们仍体现出汉代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征。有的学者在对东北汉墓全面梳理并与周边汉墓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东北、北京、冀东、平壤同属于汉幽州文化区,即“汉墓幽州分布区”^④;而有的学者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将京津冀地区汉代墓葬划分为五个墓葬文化分布区,北京地区大致属于其中的“西汉墓幽州南部分布区”和“东汉墓幽州南部分布区”^⑤。

三、城址及其它

城址发掘也是北京汉代考古成果的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有关文物考古部门调查,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达20余处,有人说是25处,有人说是22处。实际上现存遗址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有的可能是人为毁灭,有的或是原有误判,但确实保留残垣或地面仍有明显文化遗存者,仍有20座^⑥。这些城址包括封国都城、郡城、县城、侯城,以及一些特殊的专业性城。几乎遍布全市各个区县,如房山区窦店的汉良乡县故城、长沟的西乡故城以及广阳故城和蔡庄故城;大兴区芦城村的汉阴乡县故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的汉潞县故城;平谷区大小北关一带的汉平谷县故城、北城子村的汉博陆故城;怀柔区梨园庄的汉渔阳郡故城;顺义区北府村的汉狐奴故城、后沙峪乡古城村的汉安乐故城;密云县古北口的汉蓟县故城、潮白河西岸的汉犷平故城;延庆县古城村的汉夷舆故城;昌平区百善镇上下东郭村的汉昌平故城、马池口镇古城村的汉军都故城;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的汉故城遗址,以及北京市区东南的蓟城等。

至今残存的城址,有的局部巍然矗立,有的甚至轮廓清晰可见,更有的城墙保存甚好。同时,诸多城址还保存一定的文化遗存,这为探究北京地区汉代城市的内部结构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料。可以说,北京汉城遗址遍及郊野,特别是在北京南部及西南。这么多城址能够残存至今,实在值得人深思。而且这些城址,体现了汉代文化的宏阔与豪迈。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北京汉文化,重新审视汉代的北京。

对古蓟城的探查,是北京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工作城址方面的重要内容。过去人们多认为在白云观以西的“蓟丘”是古代蓟城的标志,即战国时燕的国都所在,也是汉代的燕国、广阳国或广阳郡的首府。1974年发掘的结果,发现了古代城



北京史地

墙，但墙基下压着三座东汉时期的墓葬，说明这段城墙的始建年代尚晚于东汉，所以不可能是蓟城的所在。那么蓟城到底在何处呢？考古发掘工作又提供了新的线索。1956年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发现150余座瓦井，最密集的地区在宣武门豁口两侧和平门一带。1965年又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瓦井50余座，此外还在琉璃厂、新华街、象来街、北线阁、广安门内大街、校场口、牛街、陶然亭、姚家井、白纸坊等地，直至西单的大木仓，也都发现有瓦井。同时，在发现瓦井密集的南部地区，在永定门火车站、陶然亭、天坛、蒲黄榆、宝华里、定安里一带，发现有数量很多的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特别是1974年在白纸坊以北、地图出版社院内和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发现两处战国墓群，1977年在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商业部后院发现了西汉墓。这些水井和墓群为探查蓟城提供了可靠线索。看来，蓟城的位置当在发现瓦井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至于蓟城的准确位置，尚待今后的调查发掘来解决。^④

窦店的汉良乡县城，先后多次被考古工作者调查、勘探。^⑤通过试掘，该城确为西汉良乡县治。而且对城址的规模、形制和建筑结构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至于小城最初是否曾为大城的子城，调查中未能进一步观察，只能留待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解决。可以说，窦店古城的调查和试掘成果使得对城址年代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试掘的剖面提供了科学的地层关系，证明了古城延续使用了千余年，几经修缮。

除了窦店良乡县城、长沟西乡县城等外，还发现了一些专业性城址，如海淀区清河镇的朱房古城遗址就是一个典型。从1954年正式调查开始，共发掘了六次。但每次的工作量都不大，较为重要的是后三次^⑥。同时还发掘出一处汉代铜铁冶坊遗址，并出土一批铁刀、剑、戟、锄等铁兵器和铁农具。根据这些材料，推断这座古城不会早于战国。从城内出土陶片来看，它应该是一座西汉初期修建的城垣，由出土的铁器来看也是如此。^⑦该土城原来可能为一座具有军事意义的边城，是秦汉时防胡军事要塞工程重要的一环，同时还是胡、汉民族贸易交通线的集散地。^⑧

铸币遗址和窖藏遗址也是北京汉代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丰富了北京汉代遗址文化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北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如1982年，怀柔县龙山东坡下修建马路时，发现一处汉代钱币铸造遗址，出土40余块钱范，其中有10块刻有隶书“五铢”。遗址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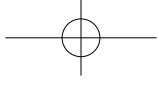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已被新修的马路和县招待所楼房掩盖。^⑨1986年夏，又有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北京为六朝古都，各类遗址也不少，但铸钱遗址仅此一处，就全国来说，这种历史久远的五铢钱铸钱遗址发现得也不多，故此处为我市惟一的铸钱遗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⑩

关于北京汉代窖藏货币，如1960年在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化工学院修建有机化学楼挖地基时出土的汉代窖藏货币，重约30市斤。货币保存状况很好，锈蚀不重，钱文清晰。^⑪再有1981年9月，在今北京市顺义区花梨坎村，人们挖房基时于地表2米处出土小口阔腹灰陶罐一个，内贮东汉晚期五铢钱和经冲凿过的东汉晚期五铢钱200余市斤。这批窖藏的钱币种类十分单纯，应系一整批新铸东汉晚期五铢钱，在冲凿“剪轮”五铢的过程中因某种变故而窖藏起来的，是一批尚未通行于市的半成品^⑫。这些窖藏货币的发现，对研究汉代末期的经济和货币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除了墓葬、城址及上述遗址外，北京汉代考古成果还包括1964年6月在西郊石景山上庄村东发现的汉代石刻，其中有石表、石柱、石柱础、石阙顶等，上面分别雕刻鸟、兽、人物及莲瓣纹、直棱纹、菱形纹、三角纹等。特别是8号方石柱左侧面刻以“乌还哺母”为题铭文，1、6号石柱上还刻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据此可知，这批石刻应是东汉元兴元年为一个秦姓的书佐所建的神道阙。^⑬这批石刻都是汉阙上各个部分的构件，是北京出土的第一古刻^⑭，堪称北京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发现。此外，诸如1957年9月在丰台区三台子出土了几件汉画像石^⑮，1959年在天坛公园内出土一对秦汉时期的铜壶^⑯，1975年在怀柔县崎峰茶公社发现的汉马蹄金一枚半^⑰，1993年在石景山区鲁谷新村出土一对西汉石虎^⑱，等等，都是北京汉代考古的重要成果，对北京汉文化研究都不失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有关汉代北京地区的文献资料少而零散，特别是燕王刘旦之后的记载更简略，这样考古成果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北京汉代考古成果丰富，分布范围广。因此，对其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目前虽有一些初步探讨，但综合分期研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等等，都仍需做大量工作。

①④陈光：《北京市考古五十年》，载于《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建国以来北京地区汉代考古成果综述

②靳枫毅、鲁琪、齐心：《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⑦张治强：《近两年北京地区汉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载于《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南水北调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市考古发掘报告第1号，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⑥⑨胡传耸：《北京地区汉墓概况及墓葬形制分析》，《北京文博》2008年4期。

⑧王灿炽：《大葆台西汉墓墓主考》，《文物》1986年第2期。

⑩白云翔：《从大葆台汉墓论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于《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⑫鲁琪：《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文物》1977年6期；单先进：《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黄展岳：《释“便房”》，《中国文物报》1993年6月20日；尤振尧：《“黄肠题凑”葬制的探讨》，《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4期；高崇文：《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北京文博》2008年2期，等等。

⑬宋大川：《近年来北京考古新成果》，《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⑭⑮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⑯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白浮村汉、唐、元墓葬发掘》，《考古》1962年第5期。

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两汉墓》，《考古》1963年第3期。

⑱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史家桥汉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3期。

⑲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县西柏店和唐庄子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5期。

⑳李达：《海淀区上地村东汉墓》，载于《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2年。

㉑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顺义临河村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6期。

㉒李建林：《北京顺义田各庄汉墓发掘简报》，《北京文博》1999年第4期。

㉓李大儒：《密云又出土十座汉墓》，《北京文物报》1998年第7期。

㉔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南水北调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市考古发掘报告第1号，

科学出版社，2008年。

㉕郑君雷：《论“西汉墓幽州分布区”》，《考古与文物》2005年6期。

㉖姜佰国：《京津冀地区汉代墓葬研究》，载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㉗参见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报告》（未刊稿）。

㉘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于《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㉙冯秉其等：《房山县古城址调查》，《文物》1959年第1期；刘之光、周桓：《北京市周口店区窰店土城调查》，《文物》1959年第9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叶学明、陈光：《北京窰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8期。

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㉛苏天钧：《十年来北京市所发现的重要古代墓葬和遗址》，《考古》1959年第3期。

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㉝赵光林：《北京市发现一批古遗址和窖藏文物》，《考古》1989年第2期。

㉞高桂云：《怀柔县汉代铸钱遗址的发现》，《首都博物馆丛刊》1997年总第11期。

㉟张先得：《北京市朝阳区出土汉代窖藏货币》，《中国钱币》1983年第2期。

㊱高桂云、张先得：《记北京市顺义县东汉窖藏货币》，《中国钱币》1984年第2期。

㊲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

㊳邵茗生：《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文物》1964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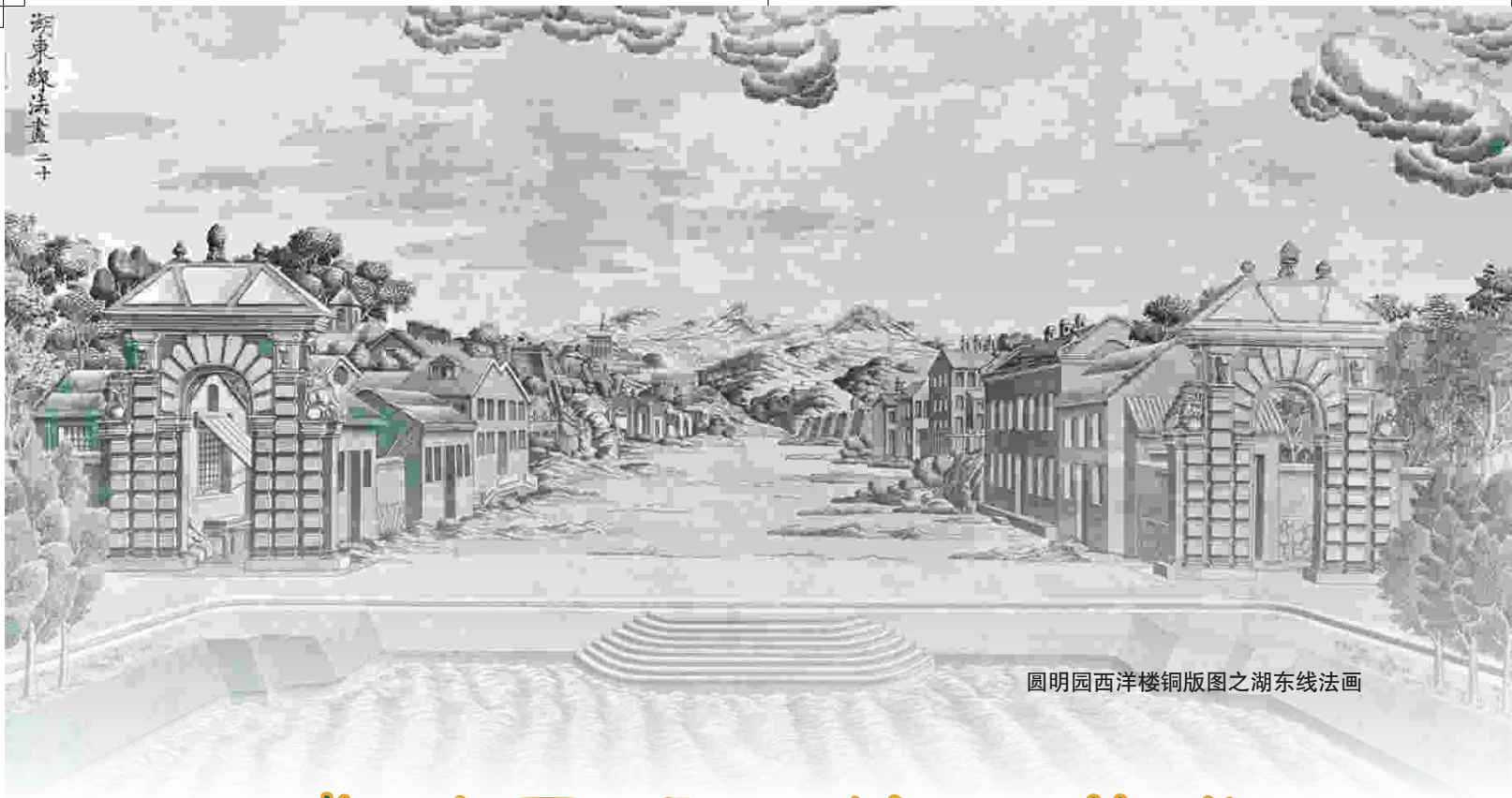
㊴喻震：《丰台区三台子出土汉画像石》，《文物》1966年第4期。

㊵王汉彦：《北京市天坛公园内出土一对铜壶》，《文物》1960年第3期。

㊶张先得：《怀柔县崎峰公社发现汉代马蹄金》，《文物》1976年第6期。

㊷关续文：《石景山区鲁谷新村出土一对西汉石虎》，《北京文物报》1994年第10期。

（作者为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业务科研人员）



圆明园西洋楼铜版图之湖东线法画

盛时圆明园的西洋式 装饰和陈设

陈 辉

圆明园是康熙御赐给雍亲王胤禛的花园，雍正时期扩建成为御苑，乾隆时进一步增建和整修，达到鼎盛。园中不仅仿建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众多名园，而且在长春园内还建有一组西洋式建筑，正所谓“移天缩地在君怀”。盛时的圆明园不但园林建筑独具匠心，内部的装饰和陈设也十分奢华，既有中国的奇珍异宝又有大量西洋式的装饰品，被誉为“东方的凡尔赛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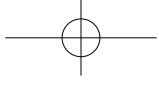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一、康熙、雍正、乾隆的西洋情趣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一只自鸣钟敲开了紫禁城壁垒森严的大门。虽然清朝从康熙到乾隆对基督教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却对西方的科技和艺术很感兴趣。康熙经常召请西方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人入宫讲解西方科技知识。雍正曾有头戴路易十四式的卷曲假发、身着洋装的画像。他对眼镜、温度计、望远镜等西洋的新奇器物颇有兴趣，也是他首先把西洋水法引入圆明园。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水木明

瑟，雍正时称风扇房，用泰西水法引水入室，以推动翎毛风扇，风声水声“泠泠瑟瑟，非丝非竹”，供清帝夏日消暑。乾隆在追求西洋艺术方面大大超越了他的祖父和父亲。自雍正至咸丰，历代皇帝始终把圆明园作为主要园居和理政的场所，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此居住。由于皇帝的西洋情趣，许多西洋物品也通过进贡、购买、仿制等途径纷纷进入圆明园。

二、西洋物品进入圆明园的途径

1、外国使臣和传教士进贡。许多欧洲国家的使臣和传教士来到中国觐见皇帝时大多以西洋物品作为贡品，以博得皇帝的欢心。雍正五年（1727年）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觐见雍正帝，他曾三入圆明园，并向雍正献上葡萄牙国王的礼物。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另一位使臣巴哲格也是在圆明园向乾隆皇帝进献了金银丝缎、宝石、银器、鸟枪、香料、葡萄酒、鼻烟壶、玻璃器皿等礼物共48抬。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



治三世派遣使臣马嘎尔尼带着近 600 件精心挑选的珍贵礼物来到中国。乾隆帝下旨将其中较大的 8 件安设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这 8 件礼品是：天体仪一架，“乃天上日月星辰及地球全图”，“俱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运转，十分相似，依天文、地理规矩，何时应遇日食、月食及星辰，俱显著于架上”，此乃“从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独绝”。这架天文座钟，是个镀金的自动天文仪器，音乐器械、钟表放置在顶端，由齿轮带动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等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下面是发出音乐的音箱。天球全图一件，在蓝底色上装饰以金银制成的星辰，大小颜色各不相同，并以银丝区别天体度数，“犹如仰视天象一般”。地球全图一件，描绘“天下万国、四洲、山河海岛，还有航线和行驶在海上的英国商船”。地球运转全架一件。指引月光盈亏一件。测看天气阴晴一件。玻璃镶金彩灯两件，“此灯挂在殿上光明照耀”。乾隆皇帝为了显示他的“怀柔远人”，回赠英使团礼品达 3000 余件。英使团回国后，他又令将临时摆放在正大光明殿内的贡品移出，同英国进贡的其他礼品一起摆放于圆明园、紫禁城及热河的各处殿堂。存放在圆明园中的有：“远瀛观安设天文大表全分；淳化轩安设地理运转全架；澹怀堂安设天球一件，地球一件；内殿、水法等处收贮小玩器一分；水法收贮瓷器一分，安设玻璃灯一对，气法一分，巧益架一分；水法收贮画幅全副；水法安设西洋船样一只，自行车一对；器皿库收贮大火镜一分；圆明园内殿贮大毡毯一大箱”。^①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传教士潘廷章、李俊贤来京效力，进献了不少西洋物品。其中收藏于西洋水法殿的物品有“铜版画六张、银镶吕宋果壳凉盏一盏”，^②乾隆皇帝对这些礼物很满意，大加赏赐，并命二人在启祥宫行走。这些能够反映西方科学新成就的礼品，乾隆皇帝束之高阁，成为装饰圆明园宫殿的陈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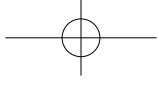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2、由粤海关采购进贡。清初曾一度禁止海上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废海禁，设粤、闽、江、浙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关闭其他三关，专限粤海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清设粤海关监督总理对外贸易，每年外国商船运来欧洲制造的钟表、玻璃、珐琅器等珍奇洋货，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官员竞相争购其中的精品，作为贡品以博得清帝欢心。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广东海关监督毛克明、副监督郑五赛进玻璃镜四面、千里眼五件、伽楠香三块、紫檀木边镶玻璃罩匣一件”。

其中四面玻璃镜做成“紫檀木玻璃镜插屏一件，洋漆玻璃镜一件陈设在乐志山村。做成楠木边座雕夔龙整腿玻璃镜二架陈设在西峰秀色”。^③乾隆帝虽然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却数次传谕粤海关监督进西洋货物，还强调寻觅“西洋物件内有新异者”，“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水法殿上所用玻璃，着造办处行文向粤海关要，陆续采买送来”。^④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初一，“粤海关呈进大驼钟一座、洋瓷人物乐钟一座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上曰……得时交水法殿摆”。^⑤

3、派皇商到国外采购、定做。乾隆十五年五月，皇帝命造办处将所需西洋物件开列清单，并要求“京内无有的稀奇物件，著带些来”。单内所列“大玻璃镜高五尺余，宽三尺余；西洋珐琅大瓶罐；金线；银线；黄底红花毯或红底黄花毯；大小钟表；西洋箱子；西洋柜子；西洋桌椅。皆谐奇趣装修、家具、陈设所用”。同年八月内务府大臣进西洋玻璃灯纸样一张，乾隆命带往西洋去做。同年九月由内廷拨银两万两，交皇商范清注赴西洋传办。^⑥范氏家族是明末清初在张家口地区经营满蒙贸易的汉族富商，范清注顺治初年入内务府，是内务府著名的皇商，长期从事铜、盐运销和对外贸易。

4、由外国传教士在造办处制造。清帝在西洋“奇技淫巧”的诱惑下，由从国外引进物品收集欣赏，发展到引进技术人才在宫中造办处独立生产。雍正年间设圆明园造办处，乾隆二十年一月京内造办处各作搬到圆明园。造办处的很多机构设在圆明园中，如如意馆、茭荷香、春宇舒和、六所等。为了顺应皇帝的西洋趣味和需要，从康熙至乾隆朝，西方各国都竞相派学识渊博和技艺高超的会士来华，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争取清廷放宽教禁，为在中国传教创造良好的条件。清帝比较重视西方传教士才能，传教士中如有“通晓天文及技艺之人”，到达中国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可为之制备衣履，差人伴送进京”。这些传教士进入北京后，被吸收到内廷有关机构工作，并按照各人所长和皇帝的需要分派工作，称为“行走”。清代造办处档案中西洋人的名字屡见不鲜，其中画师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艾启蒙、贺清泰、潘廷章，钟表和机械玩具技师沙如玉、席澄源、杨自新、汪达洪，玻璃技师汤执中、纪文等人也都曾长期在圆明园中工作。

在这些西洋传教士中居核心地位的是郎世宁，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宫廷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



秀的建筑设计师和工艺品大师。从事过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的设计及西洋陈设的设计和布置。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长春园谐奇趣东边，着郎世宁起西洋式花园地盘样稿呈览，准时交圆明园工程处成造，钦此”。^⑦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西洋陈设三十二件，上曰‘交水法殿着郎世宁看，将应用的留用无用的交进。钦此’”。^⑧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交西洋玻璃八仙灯一对，传旨着交郎世宁在水法殿看地方安设”。^⑨

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水法殿西平台桌案上添玻璃灯一对，着郎世宁画样呈览”。^⑩

皇帝不但巡视督察，而且经常亲自参与设计和修改，对款式、纹样、颜色、做工一一指点。“我们的画室设在一座小宫殿里，皇帝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们作画。”（王致诚 1743 年给巴黎达素先生的信）^⑪“西老爷（指席澄源）在如意馆钟房，常见万岁，万岁同他说话，看他做得，很夸奖他法子巧。”^⑫清廷给予这些传教士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所擅长的技艺能够发挥出来。他们也小心翼翼的侍奉清帝，极尽巧思的制造出各种新奇的器物。他们虽是以传教为目的，但也把西方的先进技术、艺术风格带到了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

三、关于圆明园中西洋陈设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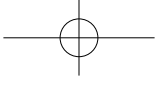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圆明园中无论中式还是西式建筑，内部都摆放有许多的西洋陈设，绘画、钟表、机械玩具、玻璃器、珐琅器等随处可见。位于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是以郎世宁为首的西洋传教士设计并督造的，包括谐奇趣、线法桥、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等十余处西洋建筑。面积虽仅有 7 万平方米，但“其中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其内部的装潢陈设均为西洋式的，西洋显微镜、西洋射光镜、西洋天体仪、西洋绒狗、西洋婴孩玩意、西洋书本、西洋琴、西洋剑、西洋玛瑙把小刀、小叉、勺，陈设的种类无所不包，几乎成了西洋器物的展览馆。

圆明园是清帝的御园重地，王公大臣也不得随意入园，而一些西洋人却因为各种原因得以行

走于御园禁地，一窥圆明园内的风光，在他们生前写下的札记、书信中留下种种见闻。乾隆十八年（1753 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在圆明园觐见乾隆，并游览了西洋楼。据《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记载：“钦差（巴哲格）未来之先。万岁对西（指席澄源）老爷说过好几次，你们快快完西洋房子，你们西洋大人来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里的陈设，都是大西洋里的很好的东西，又有好些都是西老爷做得，很巧妙的玩意摆设”。“富公爷带钦差去看西洋房子，很美很好，照罗马样子盖的。内里的陈设，都是西洋来的，或照西洋样子做的。富公爷问钦差西洋见过没有，他说有好些没有见过，因为内里的东西很多都是头等的”。这里所说的西洋房子指的就是圆明园的西洋楼，^⑬马嘎尔尼在回国后描述承德避暑山庄内的西洋陈设时也曾与圆明园对比：“那些地球仪、天体运行仪、钟表、音乐自动机之类，工艺之精美，数量之丰富，使我们的礼品相形失色。可是我却被告知说，我们所见到的远不如宫中女眷所有的同类物品，或圆明园中所藏的欧洲物品高级”。^⑭1860 年焚毁圆明园的英法联军既毁灭了这个世界的奇迹，也用他们的笔记录下辉煌的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圆明园。“这些房屋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古玩铺，其中置有本国艺术和手工的精品和欧洲制造的各种光怪陆离的装饰物。”（英军步兵第十九队队长 Garnet · J · Wolsely）“这些建筑还尽可能地按西方的格调陈设，里面摆满了欧洲君主作为礼品赠给乾隆的各种艺术品和稀奇之物，哥白林双面挂毯、镜子，法国和威尼斯的玻璃器（有的被拆开装到了玻璃上面），自动玩偶、摆钟和水利机械。（保罗·瓦兰上校）^⑮

四、圆明园中西洋陈设的种类

1、西洋绘画。康、雍、乾三帝对“著色精细入微”的西洋绘画都很感兴趣，尤其是乾隆皇帝，西洋画逼真的形象和气势宏大的场面很能满足他好大喜功的性格。供奉清廷的西洋画师中最有名的是郎世宁。郎世宁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抵京，作为宫廷画师身历康、雍、乾三朝，深得几代皇帝的厚爱，曾担任奉宸院卿，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在北京病逝。郎世宁来华前就已经是一位绘画功底深厚的传教士画家，来华之后为了尽力迎合皇帝的审美趣味，认真学习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并融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创造了中西结合的新画法，颇得皇帝欢心。乾隆对他的绘画



评价很高：“写真世宁擅”，“无过其右者”，“堪称神笔”。在如意馆的画家当中，郎世宁始终处于受尊崇的核心地位，其他西洋画家王致诚、蒋友仁、艾启蒙、贺清泰、潘廷章等人也都要遵循郎世宁的画法。他还培养了许多精通西洋绘画的中国弟子，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班达里沙、王幼学、张为邦、丁观鹏等。

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西洋画家的绘画作品遍布于圆明园的各处殿宇，多用于室内装饰。绘画的内容有山水、建筑、花鸟、人物等无所不包，手法从水墨、油画、水彩画、玻璃画等无所不用。

乾隆六年二月初五日“清晖阁玻璃集锦围屏一架共六十八块着郎世宁等画油画”。

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奉三无私西墙上着郎世宁等照养心殿画通景大画二张”。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谐奇趣东西游廊两进间三面墙棚顶并吊屏九幅俱着郎世宁等画西洋画”。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长春园澄观阁画门二张着王致诚用白绢画美人”。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水法殿十一间北楼挂屏一对着艾启蒙、贺清泰用宣纸各画一副”。^⑥

郎世宁等西洋画师在圆明园的建筑内绘制了大量的线法画。由于装饰宫殿的大部分“线法画”

作品是直接画在墙上或画在纸绢上再张贴在墙壁上的，随着1860年圆明园建筑被焚毁而灰飞烟灭，今天只能从乾隆时描绘的圆明园西洋建筑的铜板画中看到画在墙上的线法画。线法画位于西洋楼景区东部，是在方河东岸建有七道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断墙，墙上悬挂用透视法描绘的内容为西方街市景观的

线法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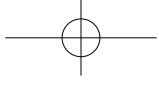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2、西洋钟表和机械玩具。圆明园中收藏钟表名目繁多，形状多样，做工精细，构造精美。奉三无私、别有洞天、紫碧山房、思永斋、玉玲珑馆、含经堂、西洋楼等殿宇都陈设有钟表，其中陈设最多最为精致的是西洋楼。咸丰十一年（1861年）肃顺奏折说“圆明园原库存大小钟表四百四十一件。内：大钟一百七十二件，小钟十三件，大表七十二件，小表一百八十四件。因英法联军的掠夺和破坏，圆明园只剩下大钟一件，风扇十二件，转盘一件，破坏大钟囊一百十七件”。^⑦据档案记载，圆明园中的钟表种类有：“镀金雀儿笼表、镀金圆鼓式白珐琅蓝字表盘有秒五针天文表、黑漆描金花架白珐琅表盘时乐钟、海屋添筹八角亭子仙人仙鹤打钟时刻钟、绿叶玻璃花照背形银花红珐琅西洋亭式自开门水法玩意问乐时钟”等。这些钟表外壳大多为铜镀金或紫檀并装饰珐琅、玻璃、玉石等，有的还附有音乐、水法、跑人转花等。乾隆帝除看重其技术新奇外，更关注造型式样的精巧别致，到乾隆时期做钟处已经成为清宫玩具作坊。正如制造奇巧机器玩具的汪达洪所说：“来华一年后，余以钟表师资格被召入宫，惟实际仅能称为机器匠，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机器，而非钟表”。^⑧当时陈设在圆明园中的机械玩具有自行

人、自行船、自行虎等，均以发条为动力，可以自行。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汪达洪奉命修理谐奇趣殿内自行人”。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汪达洪做成自行船一只，上面有人物、亭座，均施彩画，先摆在“奉三无私”殿，后按照乾隆的旨意，将亭座和船身用漆涂饰后，摆入“水法殿”内。^⑨

3、西洋玻璃器。清代玻璃尚不普遍，精美



圆明园四十景之水木明瑟



的玻璃器皿在皇宫中被视为珍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宫廷造办处设立玻璃厂,以欧洲人当监造人员,吸收西欧玻璃生产技术,制造了不少新器型,创烧了一些新的玻璃品种。据杨伯达先生考证,从雍正年间起造办处玻璃厂设在圆明园六所。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传旨:“照先做过的玻璃菊花碟子样收小些,再做三十件,烧十五色,每色两件,摆在万字房西路第七间屋内小洋漆书格上,分摆六落,每落五个”。^①乾隆时因修建装饰西洋楼需要制作大量玻璃器,从而促成玻璃烧造高潮的到来。乾隆二十年正月三十日,员外郎白世秀将制作完成的一对西洋玻璃灯呈给皇帝御览,皇帝下旨“送圆明园交总管李德裕在水法殿内安放”。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根据水法殿西洋陈设配木座的记载,当时水法殿内有“缠丝玻璃碗、玻璃靶碗、玻璃盖碗、玻璃提梁卮、玻璃葫芦、玻璃蜡台、银壶座玻璃盖碗、缠丝玻璃瓶座、大红玻璃碗、玻璃靶盏、玻璃盏、射光镜”^②等形制多样、装饰丰富的玻璃陈设。造办处生产的玻璃器造价很高,当时住在北京的一天主教士于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寄往欧洲的信中说:“每年都要生产出大量花瓶来,花瓶的塑形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造价很高,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当时有许多为了宫廷使用而生产奢侈品的机关,此玻璃厂只是其中之一”。

玻璃用在窗子上,光亮美观。然而造办处始终无法制造出大尺寸的平板玻璃,必须仰赖进口,因此十分珍惜。雍正五年(1727年)在安装万字房对瀑布屋内的玻璃窗时,雍正下旨“只有中心玻璃准用银库中库存的玻璃一块,两边的玻璃不必,将柜上拆下来的玻璃拆开零用,此样玻璃易得,尔另选用”。^③这一方面显示雍正的精打细算,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玻璃窗的珍贵。即使如此,圆明园中的许多建筑如淳化轩、别有洞天、玉玲珑馆、五福堂、蓬岛瑶台等均有镶安玻璃的记载。“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奉旨于圆明园后殿仙楼下做双圆玻璃窗一件”,^④这是圆明园内安玻璃窗的首次记载。关于圆明园内建筑的玻璃窗,乾隆曾有御制诗《蓬岛瑶台八咏之晶窗》一首:“玻璃即水晶(水晶有生于石者,亦有西洋烧炼而成者),廓长有所过。糊窗堪纵目,万景当前罗。金山高阁上,陡忆俯江波”。^⑤

4、珐琅彩器物。珐琅于公元12世纪出现于欧洲,明初传入我国。珐琅彩器物包括铜胎画珐琅、金银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和瓷胎画珐琅。珐

琅彩瓷于康熙末年烧制成功,全盛于雍正朝,乾隆中期逐渐销声匿迹。前期所用的珐琅彩料主要由国外进口,雍正六年(1728年)清宫廷成功炼制出多色珐琅彩料,施彩烧制的地点主要是宫中造办处和圆明园。雍正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柏唐阿邓八格来说:“内务府总管海望传,着圆明园造办处做备用瓷器上烧珐琅各色器皿等件。记此”。^⑥珐琅彩瓷受到巴洛克艺术豪华风格的影响,华丽富贵,深受清帝喜爱。含经堂曾挂有西洋珐琅莲花灯,水法殿陈设有西洋珐琅碗、玛瑙面西洋珐琅方盒等。造办处画珐琅人林朝楷是郎世宁的徒弟,因技艺高超,颇受重视,雍正时期管理内务府的怡亲王称他为“有用之人”。

乾隆对于西方文明持妄自尊大的态度,认为西方器物无非是奇技淫巧,欧洲的先进科技成果全部成了圆明园宫殿内的点缀与摆设。康熙略有远见,他曾对臣僚说“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他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昔日陈设于圆明园中的这些西洋式陈设或毁于1860年的那次劫难,或被掠走成为英法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引以自豪的藏品。如今我们只能从档案中了解,从遗址中凭吊圆明园昔日的辉煌。

①秦国经、高换婷著:《乾隆皇帝与马嘎尔尼》,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②⑤⑥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2003年。

③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⑭圆明园管理处编:《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⑮⑯阎宗临著:《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⑰约翰·巴罗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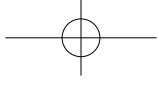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⑱伯纳·布里赛著:《1860年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⑲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⑳㉑朱家潜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㉒《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作者为圆明园管理处助理馆员)



清末民国年间的

法海寺发展脉络略考

苗天娥

法海寺位居北京西郊，建于明代早中期交替的正统之际，屈指算已经走过了 560 个年头了。五个半世纪的历史只有一头一尾的百年风云人们略知一二，至于中间的四百余年的历史，也就是从正德丙寅（1506 年）重修后到新中国成立（1949 年）之间的法海寺发展轨迹，依然是一片空白。四百年间，法海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翻阅了北京市档案馆有关法海寺的零散资料，经过认真比对、梳理，终于将清末至解放前的法海寺大致发展眉目连缀起来，特作此文就正于专家与同行诸好。

一、民国年间法海寺殿堂佛像

关于法海寺每个殿堂里的佛像陈设，本人在《法海寺的建筑形制及殿堂内部设置略考》一文中有所涉猎，只是依照一般禅宗寺庙的格局和一些残留的老照片进行合理推测后得出的结论。最近翻阅北京地区民国时的史料，又有新的发现，正好作为上文的佐证。根据 1930 年北平市社会局登记的寺庙档案（J181-15-110）记载，当时法海寺佛像有木质和泥质两种：“查该庙有八尺高木像三世佛三尊十八罗汉十八尊高四尺泥像十二尊。”由此可知木像共二十一尊，包括三世佛和十八罗汉，三世佛系木佛坐像，法身高约八尺，十八罗汉亦是木制，法身高约四尺，均供奉在大雄宝殿内，1937 年英国伦敦画报女记者安吉拉·莱瑟姆夫人拍摄的黑白照片也能证明这一点。泥像共十二尊，分别是：“四天王四尊，达摩像一尊，童二尊，伽蓝像一尊，童二尊，哼哈二将二尊。达摩伽蓝画像皆高四尺天王高一丈，哼哈高八尺。”这里四天王供奉在天王殿，没有提及弥勒佛和韦驮神将；达摩像和童二尊供奉在祖师堂，伽蓝像和童二尊供奉在伽蓝堂中，哼哈二将塑在护法金刚殿内。药师殿和藏经楼此时早已塌毁，因此没有该殿中塑像的记载。

二、民国年间法海寺庙产

从民国十九年北平社会局庙产登记留下的档案材料（J181-15-110）看，法海寺隶属于平西西郊五分署，具体门牌号码是磨石口二十九号，为“正统四年（1439 年）私建”，僧人只有葆林和寂昌两名，葆林为住持，办理



庙务；寂昌掌管岁耕。本庙面积亩数约计4亩，附属土地30亩，房屋45间，附属房屋20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为修行宏法之用，附属房地出租所得租金为收拾殿房及买衣裳之用”，“每年收入在百元上下不等”，“每月捐助佛教会洋一元”，寺庙不动产市价“约计价洋三千八百五十元”。

本寺法物有铜钟二口，约一千斤，“发声悠扬”、“光洁可爱，声音洪亮”；铁钟一口，约六百斤；铁磬一口，重约四十斤，明碑两件。佛经有《金刚经》、《法华经》各一部。古柏四株，径三尺白果（皮）松一棵，径二尺白果（皮）松一棵，径一尺五红柏二棵（现存一棵），“松林无定数，约一千八百株”，“古柏叶密，避暑相宜”。法海寺庙产契约、种类及数目基本完备，有“手本三纸，红契一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北平市社会局进行了第二次寺庙庙产登记，这时法海寺申报房屋六十三间，亭子两座，其中四亩地基，耕地三十亩，山地一顷五十亩，“价值总计三千八百八十元”。法物有“泥木像五十五尊、大铜钟一口、大铁钟一口、铁牌一面、铁磬五口、小铁钟四口、铁供器一堂、铁鼎一座、铁瓶六对、石碑六座、经典二部、又礼器四十件、有补登石碑十二座，估计总值七百六十三元”。住持继承或管理惯例为“继承师业，师徒相承”。其他动产有“供桌八张、砖井一眼、古柏八棵、白果（皮）松二棵、荒柏千余棵”。当时还有“庙照二件、地契纸一套、手本二套”，“使用权所有权属庙”。

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法海寺寺庙登记表中的数目略有变化：佛像偶像（四十四）“三世佛三尊、配佛像二尊、罗汉十八尊，均木构；达摩一尊、伯伏一尊、马祖佛一尊、给孤独佛一尊、杨晋佛一尊、伽蓝佛一尊、弥勒佛一尊、哼哈将二尊、四大天王四尊、如意佛八尊，均泥像”。神像偶像（十一）“娘娘九尊，哼哈二尊”。礼器七十七件：“大铜钟一口、大铁钟一口、铁牌一面、铁磬五口、小铁钟四口、铁供器一堂五件、铁鼎一座、铁瓶六对、大铁香炉四个、琉璃五件四堂、铁烛扦四付、小铁香炉八个”，法器“殿鼓二面”，经典“金刚经一部、地藏经一部”，雕刻“石碑十八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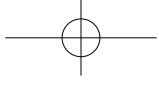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二十五年的法海寺庙产状况看，第一次应该仅仅是法海寺本身的庙产，第二次似乎将龙泉寺的庙产也统计在内了，说明葆林同时管理着法海寺和龙泉寺。并且，民国年间法海寺已经江河日下，不仅僧人稀少而且财产衰微，寺庙经济萧条不堪。

三、清末至民国法海寺的边界四至

近日，笔者从北京市档案馆查得法海寺民国年间的部分原始资料，始知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时，法海寺所属山场的范围是“东至山顶分水岭，西至慈祥庵山界，南至临街大道，北至白塔坡顶”。上溯至大清光绪四年（1878年）时，法海寺住持僧人玄智因年迈多病又无后裔而将法海寺庙宇及山场一并交给承恩寺其师弟德瑞住持，该时法海寺的四至是“东至承恩寺地界，西至慈祥庵地界外至边墙，南临大道，北至白塔坡顶边墙”（见北京市档案馆档案J181-15-110）。

根据上述两则史料，可以推断出法海寺在清末乃至民国年间的大致范围：东至山顶分水岭，分水岭以西归法海寺，分水岭以东属承恩寺地界，大体是今天的馒头山和福寿岭交界处；西至慈祥庵地界，大约是今天的蟠龙山西部山顶分水岭处，与慈祥庵山场毗邻，外至山顶边墙；南至临街大道，毫无疑问是今天模式口大街所在处，正好法海寺建立之初的远山门距此仅一步之遥，位于大道稍北一点；北至白塔坡顶，大概延伸到今天山顶的防火道附近。

法海寺西面和北面边界中提到了白塔坡和山顶边墙。白塔坡指的是现今法海寺东北的平缓山坡，明代正统四年建立法海寺以来寺院东侧的一片开阔坡地辟为塔院，住持本寺的开山祖师、高僧大德圆寂后均入葬于此，目前可以确切考证的有法海寺的开山住持僧录司左觉义兼大功德禅寺住持嵩严寿（即福寿）禅师和第二代住持僧录司右善世慧义皆葬在此塔院里，现塔院遗址上存有两位高僧的谕祭碑和福寿禅师的塔铭可作佐证，昭示了白塔的存在。从现已漫漶不清的《僧录司左觉义兼大功德禅寺住持嵩严寿禅师塔铭》可以得知嵩严寿就是《敕赐法海禅寺碑记》中提到的开山祖师福寿禅师，他是僧录司右善世雪峰渊公的法嗣。福寿8岁出家，“守道励行，精勤不懈”，修得非凡的瑜伽功力，在法海寺担任住持前后凡28年，居然在圆寂前的一年零一个月就预知其圆寂之日，提前召集慧义等徒弟嘱咐修禅要领，然后瞑目坐化。皇帝听说后派遣官员谕祭，说明他确实是当时的一位名僧，并建造“丈有九尺”白塔。正因这高大纯洁的白塔，所以法海寺以东的山坡人们俗称白塔坡。至于山顶的边墙，与模式口在明清时是军事重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年模式口古隘口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它不仅是宣化、张家口及京西的“间道”，也是军事上东取幽州、



西守燕京的咽喉“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蜿蜒成龙形的驼铃古道上从东到西依次建有四个过街楼，老村民传说过街楼也是法海寺、承恩寺、慈祥庵的南面地界标志。而在东西两个过街楼的门洞儿通往山顶处建有两道高大宽厚的边墙，沿山体两侧蜿蜒伸向苍茫的翠微山中，将宽阔的白塔坡围了进去。同时在法海寺远山门外的两个过街楼处也向北筑有两道石砌边墙，直通山顶，将法海寺包在里边。边墙基底宽1.5米，高约3—4米，绵延五六公里长，真是固若金汤。如此看来，法海寺的四至地界确实也与模式口当年沿着过街楼修筑的四道边墙的界限基本吻合。

四、法海寺更换住持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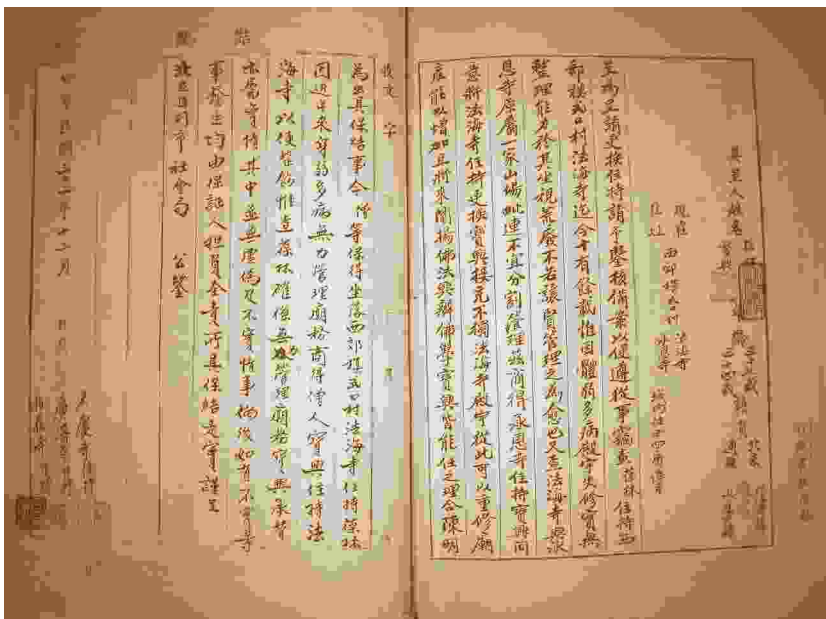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年底，年仅37岁的法海寺住持葆林和时年34岁的承恩寺住持宝兴向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呈请更换住持，理由有二：一是“葆林住持西郊模式口村法海寺迄今十有余载，惟因体弱多病，殿宇失修，实无整理能力，与其坐视荒废，不若让贤管理之为愈也”；二是“又查法海寺与承恩寺原属一家山场，毗连不宜分割管理”。基于这两个原因，法海寺住持葆林情愿拱手相让住持一位于承恩寺住持宝兴，宏庆寺住持敏

持为师徒相承关系，后来“承恩寺因纠纷案已改为十方丛林”，十方丛林院的住持由官吏监督选举，这与法海寺在住持选定上的原则截然不同。社会局又提到两个毗邻的寺庙仅有的一点联系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模式口村民薛厚田控诉该两庙住持葆林、秀林擅伐树木，此外别无瓜葛。社会局觉得此事颇为蹊跷，上报局长后转呈佛教会复核定夺。

北京佛教会很快做出答复：“查模式口村法海寺原系法安老和尚之剃度恩师德瑞于光绪年间用银四百两倒得香火，合并承恩寺，为其临济宗剃度派僧徒继承梵修。届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承恩寺改为贤首宗十方丛林后，而法海寺仍为临济宗，法安后裔继承管理，承恩寺与法海寺原属一家。”并云“承恩寺与法海寺其剃度子孙关系确属法安一派临济宗寺庙耳，法安既为贤首宗派先辈，以其剃度寺庙并为贤首宗十方丛林，而宝兴又为法安老和尚曾法孙，按照统系并不背谬。”最后是北京佛教会执行常务委员全朗等9人的署名。北京特别市社会局接到北京佛教会的复核后，又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三月二十二日，传讯法海寺住持葆林、承恩寺住持宝兴、宏庆寺住持敏悟、广济寺住持显宗和拈花寺住持宽瑞五人问话，与佛教会的说法一致。四月十日，

社会局下发宝兴接充法海寺住持的公文。四月二十六日，宝兴函告社会局尚未收到公函，疑为遗失，恳请补发批示（见北京市档案馆档案J2-8-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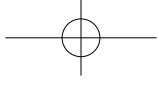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纵观此案前后，清末之际法海寺和承恩寺关系比较密切，可以得知4个事实：①法海寺早在光绪四年（1878年）就由承恩寺住持德瑞和尚用银四百两从师兄玄智手中购得，阐扬临济宗；②光绪年间法海寺住持与承恩寺住持皆出自德瑞剃度徒弟、贤首宗第三十六世法师法安大和尚的门下，仍弘扬临济宗；③民国三十三年前，法海寺仍属于临济宗子孙庙，民国二十七年承恩寺改为贤首宗十方丛林；④事实上，光绪四年后法海寺和承恩寺统一在德瑞住持的名下，后世两寺住持均为德瑞、法安后裔，到法安大师圆寂后两寺各立门户，互不统属，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三年。



法海寺住持更换文书

悟、广济寺住持显宗和拈花寺住持宽瑞联名作保。

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接到葆林和宝兴的呈请后，查阅了前些年寺庙登记情况，发现两个寺院“均无同宗本家记载”，最初“两庙系子孙庙”，即住



五、法海寺庙产内青莲堂墓地置换事宜

据北京市档案馆档案 J2 - 8 - 500 第 76—89 页载,法海寺住持葆林呈请北京市社会局交换地亩备案事宜,收文字第 2817 号,附件有换地契约壹纸、青莲堂李所置模式口村地契壹纸,这是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的法海寺庙产内青莲堂墓地置换一事,也就是法海寺更换住持前一年的事,这是葆林、宝兴为法海寺更换住持一事提前做的准备工作,免得住持交接时发生地产纠纷。青莲堂李绅一向为法海寺的功德主,“历年常有施助”,法海寺前的道路和桥梁一旦朽毁,就由承恩寺法安老和尚出面商请李绅修理完整。李绅还出资改建了法海寺山门内出水大沟木桥,改为石桥。正由于李绅的种种功德,他又认为此地风水优秀,故将祖茔建在了法海寺西面山坡上李童墓遗址上,约二亩六分,属寺旧有山场。李绅为培护祖茔,也为了不影响法海寺住持及庙产的正常交接,特用国币壹百圆置买模式口村西仲旭东民地二亩七分与法海寺葆林山场内二亩六分地互相交换,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五日立字为据,详细写明了地亩的四至范围,中保人有承恩寺住持宝兴、天台山慈善寺住持永安和模式口村民薛厚田。北京市社会局经调查属实,同意备案。

在今天法海寺山门殿以西山坡上李童墓碑北侧仍旧存有青莲堂祖茔坟圈、宝顶、石案和地界石等,墓碑上正中镌刻“江夏李凤山先生之墓”,左为“长白宝熙题”,右为“民国己巳年三月”,墓圈外有一块长条形青石质界碑,上题“江夏李青莲堂茔地”。由此看来,李绅祖茔大部分坐落在李童墓的基址上。

六、法海寺与模式公墓的土地纠纷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法海寺住持葆林的师侄隆山不同意宝兴接替法海寺住持,而葆林常驻西四广济寺,不回庙管理寺务,宝兴无从商洽。由于隆山的阻挠宝兴无法实质上接管法海寺,其时法海寺仍由隆山住寺管理庙务。这时发生了法海寺与模式公墓的土地纠纷。

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四月模式公墓租用法海寺山场成立,与住持葆林签订的合同,前面提到的青莲堂李绅祖茔的地产亦在模式公墓

的租用土地内。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货币贬值,租金增加,公墓无力承担,将年租金改为月捐助法海寺数百元,引起寺内僧人不满。这时承恩寺庙僧普林与住持宝兴发生口角,宝兴一怒之下将普林逐出山门。普林是僧录司正堂法安老和尚的嫡传徒孙,原为八大处二处灵光寺住持,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因其多次违反戒律,被僧团驱逐出灵光寺,又在翠云庵开饭铺,后来到承恩寺,不想又和宝兴发生争执,再次被打出山门。恼羞成怒的普林来到法海寺,强行赶走隆山,自行接管法海寺,自称该寺家长,并派人将公墓租用地第一至五区当作耕地开垦。因此,引发了模式公墓与法海寺普林之间的诉讼纠纷。这件事反映到北平社会局。北平社会局委托佛教会调查此事。历经一年,佛教会亦因内部整顿始终未有专人管理此事。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模式公墓代表祁厚圃再次向政府反映此事,认为不法僧人普林趁乱占用公墓土地、盗伐树木、假公济私,希望政府法办。此时,普林卷土重来,以和尚身份接管了承恩寺。1948 年解放战争结束,随后石景山区解放,新中国成立在即,承恩寺交给了模式口村管理(见北京市档案馆档案 J2-8-500),这桩公案也就迎刃而解了。

七、清道光四年至民国年间法海寺的当家住持

在查阅法海寺民国年间登记庙产档案的过程中,笔者同时涉猎了法海寺周边庙宇如承恩寺、龙泉寺和慈祥庵的一些资料,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法海寺在清末年间历史的一些蛛丝马迹,经过梳理、比对和连缀,基本上弄清了从清道光四年(1824 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一百二十五年间法海寺当家住持的大致脉络,具体如下:

道光四年前——道光七年(1824 年前—1827 年)	道通
道光七年—? (1827 年—?)	玄亲
咸丰同治年间	镜泉
? —光绪四年(? —1878 年)	玄智
光绪四年——民国五年(1878 年—1926 年)	德瑞
民国十七年——三十二年(1928 年—1943 年)	葆林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	宝兴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隆山
民国三十五年——三十六年(1946—1947 年)	普林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1947 年 6 月)	松静

从北京市档案馆档案 J181-15-110 记载看,道光七年(1827 年),法海寺住持道通年迈多病不



能理事，师叔同善作保由玄亲接续梵修。而龙泉寺药碾碑为道光四年（1824年）住持道通亲手植立，说明早在道光四年道通就是法海寺和龙泉寺的住持。玄亲担任法海寺住持多少年档案中没有记载，此后50年间除玄智外还有一位镜泉禅师，这是包世轩先生考察慈善寺文物时的偶然发现，镜泉禅师具体哪年当的住持、当了多少年均无法知晓，笔者根据档案中其他几位住持的年代初步断定镜泉禅师担任法海寺住持应为咸丰同治年间。直至光绪四年（1878年），法海寺住持玄智因年迈不愿管理庙事，“情愿让与师弟德瑞永远住持梵修”，“德瑞不愿享受此庙，同中面设，亦愿供养送庙僧人，京平信银肆佰两整以充酬报养老衣食之费”，双方立字为据，这就是民国末年佛教会认为法海寺和承恩寺属于同一宗派、宝兴可以接充法海寺住持的历史渊源。光绪十四年（1888年）承恩寺住持德瑞上呈僧录司恳请金批入册，师堂老和尚恩准金批入册实行，僧录司盖印。民国五年（1916年），财政部统行划一新契纸，京兆县业户德瑞获得法海寺山场红契一套（县字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五十七号），后传给葆林。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尽管北京市社会局批准宝兴接任法海寺住持一职，但事实上由于住寺僧人葆林师侄隆山的极力反对，葆林行踪无定，宝兴无从商洽，并未接管法海寺住持和庙产，隆山占据法海寺达一年之久。此后，承恩寺僧人普林与住持宝兴发生口角，诉讼后被宝兴逐出承恩寺，普林强占法海寺，赶走隆山，自称该寺家长，行使住持职权，宝兴拿他没办法，于是产生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普林侵占模式公墓土地和盗伐森林案，周旋辗转两年之久未果，很快全国解放了。

八、民国三十七年六至七月间的法海寺住持接替互殴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二十九日，北平市警察局公函警行保管第一三二二号，批准民政局为佛教会接收法海寺住持移交一案派警协助的公函，由该管郊五分局第五分驻所派员协助新住持松静接管法海寺。

松静为佛教会新公选出的法海寺住持，需要与把持法海寺的普林交接庙产。松静于五月间前往模式口查得“法海寺现有劣僧普林盘踞在内”，不敢贸然前往，认为“前往接收若该管警局协助恐不能生效”（北京市档案馆档案J181-16-927），上报中国佛教会北平市分会。北平市佛教

分会考虑到普林的一向作为，唯恐发生事端，便决定由佛教会派人于六月三十日十一时前往接收，同时求助民政局函往警察局派员协助。警察局也深知普林的底细，知道此人最难缠，同意派警协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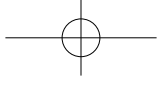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七月一日十时许，法海寺新任住持松静在佛教会北平市分会派来的监交和尚修明、泉峰和广惠寺代表莲果、崇郊寺代表惟明等的陪同下来到郊五分局第五分驻所，请求协助接收。第五分驻所当即派出长警会同保长王辅臣和区民代表张秀山协同前往。当时普林外出不在法海寺，“仅由该寺僧人茂林（普林师弟）眼同点交，暂将木器等件交清，俟普林返庙再行点收”，要求寺僧转告普林及体山与三日迁出，“松静及辅佐人鲍义叔暂居承恩寺待时移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J181-16-927）

就在松静一行离开山门之际，“发现山坡道左有新被砍伐松柏六七株，斧迹犹新，其树倒卧在地。询及保长，王辅臣云仍为普林等所为”。于是松静迅速向五分驻所递交了驱逐胡作非为、破坏佛规的普林师徒的呈子，松静的呈文写得事实确凿、有根有据、言之成理，尤其是揭露了普林师徒多次监守自盗法海寺树木的罪行。五分驻所将其转呈郊五分局。还没等警察局仔细研究的时候，就在七月四日十二时忽然发生了松静和普林师徒在承恩寺互殴成伤案件，双方殴打的凶器竟然是木板和蜡台。当时正好有华北剿匪总部北平新市区稽查处第五中队班长方继祖路过将相关人等带往该处讯办，很快将此案移交第五分驻所，与松静呈文一并移交法院调查办理。

七月十九日，郊五分局局长上报北平市警察局，“遵查松静所呈各节尚属实情，且僧人普林等屡因盗伐树株解究有案，并该僧已由剿总稽查处释回。询称不令松静接收庙务，否则仍不免发生争执，双方可由法院解决。至松静现在城内暂住，双方涉诉结果俟再查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J181-16-927）

其间，普林师徒联合地方势力用非常手段把持了法海寺和承恩寺，内里人事关系盘根错节，警方无法插入其中，法院取证困难，案子一拖再拖，直至石景山区解放。实际上，松静由于普林的无理干涉和殴打争执，并没有当上法海寺的住持，只是佛教会名义上选出的法海寺住持而已。

（作者为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09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1月9日 全市文物系统2008年度工作总结会在北发大酒店召开。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副局长崔国民、张若妮，巡视员巴爱民，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长许金和，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大祯出席会议。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局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及局顾问组部分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对2008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并对2009年工作进行了部署。

1月21日 《文物建筑防雷装置配置规范》、《文物建筑消防安全设施及器材配置规范》获市质监局“2009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批准立项。

1月份 制定《博物馆重要宾客服务接待工作规程》（试行），并下发局属各博物馆，以推动博物馆服务接待工作规范化。

市文物局与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北京市落实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重要意义、开放的实施范围和步骤、保障机制及工作要求。

经国家文物局复核终审，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停云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博物馆9家单位分别获得相应级别的文物修复及保护设计资质。

2月2日 召开市文物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协调会，传达市政府关于加快固定资产审批的具体要求，结合实际工作研究形成了局固定资产审批联动机制和举措，并组织成立了工作组，负责今后各项审批工作的协调督导工作。

2月10日 针对2月9日晚央视大楼火灾，向局系统各单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火安全工作。2月11日起，局领导分别带队对局系统各单位安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

2月11日 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常务副

部长陈启刚分别带队到正阳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检查安全工作。孔繁峙局长陪同检查。

2月16日 召开局长办公会和由局属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县文委领导参加的动员会，传达全市消防工作联席会暨“雷霆行动”部署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市文博系统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雷霆行动”。

2月24日 向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报送《北京市文物局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工作总结及设想》。文件总结了我局5年来依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今后依法行政工作的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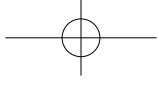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2月26日 与市工业促进局、市规划委员会联合签发《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工作导则》，以推进全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规范化。

2月份 组织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等13个单位1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历时两周对今年市政府计划修缮的2万户居民房屋进行了调查、分类和评估。在现场抽查和内业审核的基础上，通过了由罗哲文、谢辰生、徐苹芳等组成的专家顾问组的集中评审。

3月4日—5日 召开2009年北京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阶段培训会。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北京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阶段工作，及时解决实地调查与数据采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3月5日 在北京市标准化工作会议上，我局获得4项荣誉：文物保护处和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荣获“2008年度北京市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哈骏和孟德兴同志荣获“2008年度北京市标准化工作先进工作者”。

3月8日 《徐悲鸿大型艺术展览》在炎黄艺术馆隆重开幕。国务院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国家文



北京市文物局2009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物局局长单霁翔等出席了开幕式。

3月13日 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考察了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出土文物整理库，听取了研究所负责人关于近几年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情况的汇报。崔国民副局长陪同。

3月16日 在局机关召开博物馆管理工作专题会，通报正阳门免费开放的情况，并对今后博物馆规范化管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局机关和局属博物馆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

3月20日 台盟中央吴国祯副主席对北京市涉台文物进行专题调研，先后考察了李大钊故居、中山会馆、汀洲会馆、湖广会馆、台湾会馆等文物保护单位，并组织有关单位汇报情况，协助台盟中央完成北京市涉台文物专题调研报告。

3月23日 保加利亚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瓦伊洛·卡尔芬一行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参观。

3月30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奥琦等一行参观考察了东城区的几处四合院及孔庙、国子监、文天祥祠等开放单位。双方就文物保护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向首都博物馆捐赠“慈善明星集体奖”奖杯。

3月份 完成《北京市主题功能区规划——北京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研究》编制工作，并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

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博物馆藏品管理和开放接待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博物馆进一步提高安全工作意识，落实责任，确保博物馆藏品安全和开放接待工作安全。

1季度 完成先期进入市政府绿色通道的429项建设项目的文物调查工作，并审核提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意见。

北京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展顺利，18个县级行政区20支普查队共172名一线普查队员深入野外实地调查，普查完成率已达到46.7%。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072处，其中新发现679处，复查1393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名列其中。

配合规划部门完成了地铁房山线、大兴线、9号线、15号线一期总体规划评审工作，启动了西郊线、7号线、14号线工程前期的文物调查工作。

审核注册登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北京空竹博物馆2座博物馆。

配合延庆县应梦寺遗址复建工程，对张山营镇靳家堡村北的应梦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建筑遗址9处，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及各类器皿等。

圆满完成2009年元旦春节全市文博系统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文博系统没有发生一起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引发的火灾事故。

对全市2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巡视检查，对1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抽查。接待公、检、法等有关部门涉案文物鉴定15次，鉴定涉案文物100余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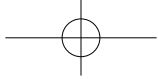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对2008年度区县文物系统及局属单位文物安全和执法工作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因消防安全工作成绩突出，我局被市防火安全委员会评为2008年度消防工作先进系统。

经研究，推荐东城区国子监街、南锣鼓巷，西城区烟袋斜街，崇文区前门大街，延庆县岔道城，密云县古北口镇6处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北京市的参评单位参加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活动。

2009年第一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 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 生	老 人
首都博物馆	308258	7155	301103	32612	46834
大觉寺管理处	29407	24564	4843	130	1618
正阳门管理处	90510	17094	73416	96	44254
徐悲鸿纪念馆	11870	0	11870	1637	2302
北京文博交流馆	4802	1688	3114	596	1111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3.10-5.10 闭馆装修）	2870	0	2870	934	1132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5330	0	5330	1916	680
北京艺术博物馆	107518	105444	2074	941	960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6591	0	6591	171	1813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6045	0	6045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13655	7529	6126	312	2931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8012	3862	4150	2787	2201
白塔寺管理处	15424	2598	12826	475	5391
老舍纪念馆	4115	0	4115	1083	1545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15310	13557	1753	374	1379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13400	10300	3100	1021	3111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69855	40560	29295	10981	102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陈晓苏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402-0680-2

I.北… II.陈… III.①文物工作-北京市-文集②博物馆工作-

北京市-文集 IV.G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1933号

北京文博 (2009 *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邮箱)

中国印刷总公司

889×1194 毫米 16 开本 6.5 印张 193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 元